



潮汕的起义应当等到惠阳和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等地起义准备也成熟时一起发动,互相配合,但是许雪秋控制不了他已经号召起来的会党力量。四月十一日,黄冈的以余丑等人为首的会党自行行动,占领了这个小城。黄冈属于潮州府的饶平县,地当广东、福建间的孔道。在会党占领黄冈后,清朝地方当局派兵来争,十四日双方在黄冈以西进行了一次激战,互有杀伤。会党力量退回到黄冈后,认为自己方面“械劣弹乏,粮食不足,久守无益”,也并不作打出去的打算,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在汕头的许雪秋等人得到这个消息,也就停止了在附近各地组织响应的工作。许雪秋在这里经营了几年的联络会党力量组织起义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孙中山又命曾在香港、新加坡营旅馆业的商人邓子瑜在惠州依靠当地会党力量组织起义。起义部队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在归善(今惠阳县境)和博罗二县之间,同惠州官方的巡防营交战了十天后自行解散。据说这是因为同盟会接济的军械未能按计划运到,而清方用来进攻黄冈的军队正在转移到惠州这边来的原故。——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三、第四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有一个记载说:许雪秋失败后向孙中山说:“土炮不敌洋枪,为黄冈一役失败之主因”^①。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说来,要总结失败的经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同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七月(1907年8、9月间),孙中山在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地区(现在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孙中山给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头衔。王和顺是1903年到1905年的广西的会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那是一次单纯的会党起义,另一个领导人陆亚发已死,王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02页。



和顺则于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和越南的西贡。孙中山在1907年初到越南，吸收他参加同盟会，并委以军事行动的责任，想利用他在会党中的号召力量。这年夏天，钦州、廉州的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反抗苛征糖捐并反对在灾荒时高抬粮价。钦州的那黎、那彭、那思这三墟农民以刘思裕为首组织了一个万人会。两广总督派统领郭人漳和标统赵声率兵前来，会同地方部队对农民实行了血腥的镇压。郭、赵二人都和同盟会有联系，孙中山派人到他们的军中，说服他们打起革命的旗帜。他们表示在革命军起来后，可以响应。但是等到王和顺率部发动后，他们却借故推诿，不采取任何行动。王和顺在七月下旬率所部二百余人袭取了钦州的防城县。这一行动虽然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但他并没有把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包括刘思裕的万人会组织起来，而只是一心企望郭人漳和赵声的“反正”。这种企望既然落空，王和顺孤军奋战，进攻钦州以北的灵山，没有成功。八月十日左右他解散了他的部队，自己跑入越南境内。这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五次失败。

在钦州、廉州方面遭到失败后，孙中山又向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称友谊关）进行活动。受孙中山的指派，曾在清朝军队中混过的黄明堂、关仁甫等人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的一些守兵。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他们一举占领了镇南关的三座炮台。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领袖曾到过炮台上面。他们回到越南境内正在张罗筹款购买枪械，以便加强兵力，从镇南关向北进攻的时候，炮台失守的消息已经到来了。这是第六次的失败。

镇南关之役后，清朝官方向法国交涉，不让孙中山再留在越南。孙中山离开越南时，又布置了在广东钦州和云南河口的两次行动，这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七次、第八次的失败。

第七次军事行动由黄兴领头。他从参加前一年的防城之役和



镇南关之役的会党分子和越南的华侨中集合二百余人，用孙中山派人设法买来的枪械武装了起来。二月二十六日（3月28日）这支部队越过中越边界，向钦州方面出发。一路上遭遇到清朝的一些零星的地方部队，打赢了几仗。这时，郭人漳的部队仍驻钦州，他前一年曾在王和顺起事时约定“反正”而悔约，那时黄兴是作为同盟会的代表到郭人漳那里去联系的人。这回，郭人漳又和黄兴事前讲好，要接济他弹药并相机反正。但是等到黄兴的队伍进入钦州后，郭人漳又一次违背诺言，而且凭他的优势兵力围攻黄兴的部队。黄兴的部队在四十天里转战数十乡镇，打不开局面，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黄兴自己重入越南，其部下则多数散入十万大山。

第八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是原来的会党头头，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他们也是上述第五次、第六次军事行动中的主要角色。他们这次行动是在云南的河口，这里和越南老街相邻。三月二十九日（4月29日）他们率部百余人偷袭河口，因为事先已买通清方守军中的一些官兵内应，所以一举占领了河口城。清军仍驻守着当地的四个炮台，也被起义的部队战胜。由于招收了一些投降的兵士，起义部队数目大增，但组织性和作战能力很差。他们虽然分兵沿铁路向蒙自方向和经新街、蛮耗向个旧方向进攻，但都在中途停止下来，没有多少进展。清方除由云南总督锡良派出军队外，还从广西方面调兵来围攻。在四月下旬，清军各路军队都开到，起义队伍中有些降兵又反水过去，余众退集河口。他们曾想向东转移入广西，没有成功，都退入了越南。法国人缴了他们的械，并把他们遣送出境。此役先后历时一个月。同盟会方面认为此役的失败，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没有能干的军事领导者。黄兴在同盟会中是被认为最擅长军事的人，他曾到河口企图指挥起义军队迅速实行进攻。由于



几个会党头头领导的部队都不听从他的指挥，他返回越南境内，另组部队。但是他没有重到河口，却跑到新加坡去了。第二个原因是经费没有筹足。胡汉民这时在越南担任河口方面的支援工作。他给孙中山写信报告占领河口后的情形，极力申说，由于有哥老会的力量可用，又有许多投降官兵，云南的形势十分乐观，但是一定要有大笔款项以保证供应粮饷和补充弹药，否则军心不能维持^①。他所认为必需的款项没有能够筹足。

1908年这两次起义，在钦州寄希望于早已靠不住的清朝将领，在河口靠花钱来收买会党和清朝投降官兵，这都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的行动。

（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

1904年成立的光复会（见第二十章第六节）的多数会员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他们实际上仍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907年光复会会员策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人物是浙江的秋瑾和安徽的徐锡麟。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出身于地主家庭，因父母之命而同一个富绅家的纨绔子弟结婚。在她的丈夫花钱买得个小京官的职务后，她虽随他入京住了几年，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和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于是下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她后来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吾自庚子（1900年）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217—218页。



也”^①。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非常行动。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成为在日本留学生界中的活跃分子。她还参加了洪门组织。1906年初回国，先在上海和一些光复会会员一起活动，参加办学校，并创办《中国女报》杂志。她在这个杂志的发刊词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②。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是“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她写道：“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③

由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的介绍，秋瑾和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不少联系。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发生后，在上海的光复会会员们集议如何起兵响应。秋瑾回到她的故乡浙江绍兴，企图以浙江为据点发动军事行动。在绍兴有个大通学堂，是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1905年创办的，他们利用这个学校交结浙江各地的会党，还在学校里暗藏了一些枪支弹药。秋瑾这时成为大通学堂的主持人。由于湘赣边界的起义已经失败，她决定独立地发动起义。她奔走浙西各地使许多会党组织答应参加起义，并接受她的指挥。秋瑾规定了“光复军”的组织系统。光复军的统领由那时还在安庆的徐锡麟担任，她自己任副统领。其军事行动计划是首先在金华发难，并以绍兴方面的会党配合，袭攻杭州。如果杭州打不下来，就把浙江的各

①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② 《秋瑾集》，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14—15页。



路军队集合起来，由浙西打出去到江西、安徽。秋瑾最初是想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间起兵，因为准备不及，改为五月初，再改为五月二十六日。但是许多地方的会党跃跃欲试，放出了就要发动的空气。五月中旬，绍兴府的嵊县已有一部分会党部队集合起来，树起了革命军旗帜，遭到清朝官兵的进攻。五月二十六日起兵的命令下来时，武义、金华等地社会上谣风更甚，愈加引起官方警惕，在这些地方都有预定参加光复军的会党分子被捕杀，这种情形使起义很难如期举行。秋瑾派人去安庆把这种情形通知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少年时由自学而精通数学，曾任绍兴府学校算术讲师。1904年去了一次日本，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参加了光复会，仍在绍兴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曾集议花钱买官职，以求深入清朝官场，掌握军权，从官场内部闹革命。徐锡麟实行了这个计划，筹款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并经过他的姻亲、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关系进行活动，竟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在安庆成了巡警学校的主持人，继又被任为警察会办。他在巡警学校中虽然受到许多学生爱戴，但并没有组织起足以发动起义的力量。1907年得到秋瑾的消息后，他决定实行一个冒险的计划。五月二十六日巡警学校有一班学生毕业。巡抚恩铭和其他省里的官员照例要到学校来进行检阅。徐锡麟在靠近恩铭案前作报告时，拔出手枪打倒了恩铭。和他合作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陈伯平和二十四岁的马宗汉二人，他们是在秋瑾和徐锡麟之间来往联络的人。他们这时也持枪在现场，和徐锡麟一起动手。除恩铭外，还有几个官员被打死。其他在厅堂内的官员们都逃散了。集队在厅堂外的学生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徐锡麟号召他们随他一起革命，但跟从他的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徐锡麟原来设想，在杀死所有主要官员后，他就能掌握安徽政权。这个设想没有能实现。徐锡麟、陈伯平、马



宗汉率领少数学生到军械局，虽然加以占领，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可用的枪支弹药。他们凭借军械局的房子同进攻的巡防营官兵，抗击了几小时，终于被攻破。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他们都被处极刑。

清朝官方从徐锡麟住处搜出了光复军告示，知道这次行动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做背景，并很快就发现了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秋瑾这时仍在绍兴大通学校，知道了安庆的事件后，她还在学校中与前来联系的会党分子相约重订起义日期，改在六月十日发动。四日省里派到绍兴的军队已来包围大通学校，有少数学生开枪抗拒。和秋瑾一起被捕的有教员和学生六人。在敌人刑讯前，秋瑾坚定地拒绝答复任何问题；第二天就被处斩。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在杭州的有名绅士汤寿潜当时曾怂恿清朝官方杀死秋瑾。汤寿潜是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见本章第二节），浙江巡抚向他征询如何对待秋瑾时，他说：“这等人，不杀何待？”^①在这个立宪派绅士看来，这个出身官宦人家的妇人，居然昌言革命，同江湖上的强盗来往，是理应杀死的。

牵连到这次光复军起义计划而被官方杀死的革命党人和会党分子有百余人。在秋瑾死后的几个月内，在绍兴、丽水、金华等地有些预定参加光复军起义的会党分子，自发地零星地发动暴乱，但都只是闪烁的火花了。

徐锡麟和秋瑾被害后的第二年（1908年），受他们的影响，熊成基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

熊成基（1887—1910），江苏甘泉（今邗江）人。十九岁参加新军（当时清朝编练的新式军队），在安徽的武备学堂和南京的南洋炮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第41页。



兵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江南炮兵排长，不久调任安徽炮营队官（连长）。他在新军中，接受革命思想，立志要推翻清朝政府，改革腐败的政治。徐锡麟在安庆牺牲后，他不胜悲愤，决心继承徐锡麟的事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他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人心惶惶的时机，率马炮营新军一千多人起义，进攻安庆。革命军同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得手，不得不向集贤关退却，改变战略，拟取庐州为根据地。在清军追击下，熊成基率部抵抗，但部队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其中还有通敌企图谋害熊成基的。年轻的熊成基（这时只有二十一岁）缺乏经验，掌握不了局势，只身逃走，起义失败。参加这次起义的军士学生被官方拿获杀害的不下三百人。1910年，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遇害。

徐锡麟、秋瑾的光复军起义，主要靠会党力量。熊成基所依靠的却是新军中的士兵。当时的革命派渐渐感到以旧式的会党作革命的主力是不可靠的，于是转而从新军中寻找革命力量。熊成基是第一个依靠新军士兵来发动起义的人。

（七）个人暗杀行动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

孙中山说：“由黄岗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



入北京，与虜酋拚命。”^① 军事起义的多次失败至少在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中造成了悲观绝望的情绪。以在《民报》上写政论而著名的汪精卫就是抱着这种情绪转而采取个人的暗杀手段。他到北京意图进行暗杀，被官方抓住后可耻地投降了。——那是 1910 年的事。

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有些人以为暗杀是最好的手段。1905 年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留下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文章，文中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② 这是以为还没有足以发动革命的群众力量，所以只能使用个人暗杀手段，并且以为可以靠暗杀引导出革命来。《民报》有一个作者在 1907 年说：“若乃事之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者，今世惟爆裂之弹而已。”这个作者以为，无须劳师动众，只要准备几颗炸弹，就能成功，所以是最简易可行的^③。

1900 年，二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他是广州格致书院学生），在广州暗设炸弹炸毁巡抚衙门，企图杀死巡抚兼署总督德寿，他被捕就义。他是想用这一行动来配合孙中山、郑士良在惠州发动的起义。以后在 1904 年，上海有万福华枪击舆论指斥为卖国贼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又有王汉在河南彰德车站枪击朝廷派出的专员、户部侍郎铁良。他们都没有成功，万福华被捕，王汉自杀。虽然万福华是黄兴、刘揆一的朋友，王汉同武汉的革命

^① 《孙中山选集》，第 205 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下册，第 715 页。

^③ 运璧（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十七期，第 22 页。



分子有联系,但他们的暗杀行动都是独立地自发地进行的。这几次暗杀行动都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最著名的暗杀者吴樾也是个独立行动的人,他的炸弹是在同盟会刚成立时响起来的。

同盟会成立后,会员刘师复 1907 年在广州计划施放炸弹暗杀水师提督李准。这个计划得到同盟会组织的支持。当时正在准备发动潮州、惠州的起义,他们以为杀死李准可以有助于起义的成功。但刘师复的计划没有实现。他在寓所装配炸弹时发生爆炸,他自己受伤,并因而被捕。两年后,他的朋友把他营救出狱。他到香港,约集了若干人成立了个支那暗杀团。这时,他的思想已沉溺在无政府主义中。这个暗杀团成为同盟会以外的小组织,在它存在的两年期间,参加者先后一共只有十二人,他们策划过几次暗杀的行动。

可以看到,进行暗杀的,主要是这两种人:一种是游离于革命团体以外的人,刘师复的暗杀团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情形;另一种是经受不住革命的失败,铤而走险的人,汪精卫是个代表。总之,对个人暗杀手段的崇拜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找不到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

崇拜个人暗杀的人对于俄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产生的民意党很感兴趣。以暗杀沙皇为宗旨的民意党人的活动,在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版物中受到歌颂。例如《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苏菲亚·皮罗夫斯卡雅是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 1881 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第二。她成了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青年所膜拜的偶像。他们不知道,民意党人的活动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并不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

同盟会,作为一个革命组织,是不把个人暗杀作为主要手段的。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没有产生像民意党这样的组织。这



是同中国长期的农民革命的传统有关系的。在农民群众中，暗杀从来只用于个人报仇，例如在同治九年（1870年）张文祥用一把短刀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当时轰动社会的案件。张文祥是个江湖好汉，他因为某种原因而和马新贻有深仇大恨，所以才蓄谋暗杀。当农民群众起来夺天下时，却从来不指望靠个人暗杀手段，而总是聚众结盟，揭竿而起的。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 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撼动了 清朝统治的基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皇帝的上谕说:“现值时势多艰,人心浮动”,“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①。十月的一个上谕又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②。这里说的“乱党”、“匪徒”,除了革命党的活动以外,还包括到处蜂起的群众的自发性的反抗斗争。高高在上的朝廷也感到“人心浮动”,“人心不靖”,可见的确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了。

义和团式的反对外国人的教会的斗争仍然继续发生。三十三年八月的一个上谕说:“近年来各省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仍复在所不免”。^③例如1905年广东廉州(今广西合浦)有美国人办的教堂被焚毁,教士五人被杀。同年西藏人民在巴塘(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焚毁法国人的教堂。1906年和1907年在江西的南昌、饶州(鄱阳)、南康,河南的西平,福建的漳浦,四川的开县等地都发生

①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748、5770页。

③ 同上书,总第5743页。



了教案,有的且带有群众起义的性质。饶州的群众倡立“洪莲会”的名义,进行仇视洋教的活动,并越出江西,进入安徽的徽州(今歙县)境内活动。河南西平的群众,树起反对洋教的旗帜,进入崆峒山,受到河南、湖北两省的官军围攻,被杀死了几百人。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处于自发阶段的、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称为“野蛮的排外”,例如,陈天华的很有影响的宣传小册子《警世钟》中说:“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陈天华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外人的长处”,但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也并不排斥必要时的战争,他说:“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杀害。”^①陈天华称自己的主张为“文明排外”,这虽然不是个准确的概念,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想把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到较高的水平上。当时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卖国的清朝政府手里,革命派认为,首先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清朝统治,不要采取“野蛮排外”的手段,是有理由的。

立宪派资产阶级对这问题抱另一种态度。严复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撰文说,当年发生的南昌教案和前一年发生的廉州教案,虽然有外国教士被杀,教会房屋被毁,但因官方事先“保护甚力”,事后处理得当,没有酿成大乱,由此他看出了“黑暗中渐露光明之意”。他承认这些教案的发生,“教中人皆有激变自取之道”,但仍认为主要是“吾国小民之失教而愚顽”。因此,他要求“今日聚众昌言爱国之演说家”,“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普及,则

^① 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第134页。



吾国庶有豸乎”^①。在严复看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文明排外”也是谈不得的。

就全国来说,1907年以后,单纯的打击外国人的教会的斗争是大大减少了。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饥饿的农民聚众抗租抗赋,抗纳漕粮,向地主大户抢米,以至进城抢米的风潮,连年不断地在许多地方发生。这是最显著地表明,群众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不得不为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例如宣统元年(1909年),杭嘉湖地区农民因灾荒要求免征漕粮,官方拒绝,因而引起了群众的暴动。浙江巡抚奏报十一月间乌程、归安二县(今吴兴县)和德清、桐乡等县的情形说:农民们“胆敢鸣锣聚众抗漕,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拒伤官兵,实属形同倡乱”^②。宣统二年(1910年),在湖北、安徽、江苏、奉天等省的许多地方发生抢米抗漕暴动,风潮闹得最大的是湖南长沙。

湖南各地在宣统元年已闹灾荒,洞庭湖滨各县水灾尤其严重,当时人描写说:“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湖南的粮食本来还运销外省,这时,湖南巡抚岑春蓂不顾灾荒缺粮的情况,接受了英、美、日本商人的贿赂,允许他们继续运粮出省,还和在长沙的

① 《论南昌教案》,载《外交报》第137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63页。

② 《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第442页。



一些洋行订立了经北京外务部批准的合同。有些买办商人给外国洋行深入产米地区进行搜购。大量粮食经过湘江公开地和偷偷地络绎运走。长沙一带粮价由常时每升二三十文飞涨到七十文以上。长沙四乡农民“吃排家饭”(也就是吃地主大户)的一天天增多,饥饿的群众不断地涌入长沙城里。到了宣统二年三月初,粮价涨到八十文一升。岑春蓂派官员分赴城郊弹压群众,反而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斥责。四乡进城的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泥木工人”)和其他贫民拥到巡抚衙门前面。泥木工人带头捣毁了衙门前的辕门、照壁,并且冲向内堂。岑春蓂下令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百姓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但也不能吓倒群众。这是三月初四日的事。当晚,城厢内外的碓坊、堆栈中的粮食,都被饥民抢劫一空。第二天,群众放火烧毁了巡抚衙门,官兵又开枪打死打伤二十多人。群众的愤怒迅速地转移到了外国帝国主义身上,因为他们知道洋商勾结清朝官方运米是这次米荒的主要原因,而且看到了停泊在湘江的外国兵舰的炮口对准城内威胁群众。群众分散到城郊各处焚烧捣毁了英商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美商的美孚洋行,德商的瑞记洋行,日商的三井、东信等洋行的办事机构和码头、趸船、堆栈等设施及法、英、美等国的教会房屋。这场乱子使岑春蓂不得不下台,由原任布政使的庄庚良继任巡抚。他上任后,整顿了本省军队,并得到从湖北调来的两营巡防营的支援,在长沙城内实行严厉的镇压,并派出兵勇分赴各乡,对“吃排家饭”的饥民“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有英国兵舰两艘,美国兵舰一艘,日本兵舰四艘开到湘江中,和清朝官方相配合^①。

^① 关于这次长沙抢米风潮详情,参阅《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第501—516页;《辛亥革命前湖南史事》(杨世骥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0—148页。



长沙的群众暴动还影响到省内其他各县，如宁乡有群众三百余人焚毁了警察局和英、美教堂各一所，平江的教堂也被群众焚毁。益阳的农民进城，捣毁官钱分局，并把一家大地主所设米店抢掠一空。

湖南虽然有同盟会组织，但并没有参与这次群众性的自发斗争。新军四十九标管带陈强和排长陈作新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的部队在巡抚衙门被群众围攻时，奉命开到长沙警戒。陈作新主张乘机起义，陈强不但不敢有所作为，反而借故把陈作新撤职。

现在再说一下群众起来反对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的斗争。

清朝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宣布实行“新政”，本意是粉饰门面，欺骗群众，但是每办一件“新政”，就要筹经费，就要加捐派税，也就不能不激起群众的反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出使意大利回国的许珏有个奏折说：“近年因创办学堂巡警诸新政，官吏之急于自见者，但求上司之称扬，不顾百姓之憔悴，甚或假公苛派，激变地方之事时有所闻。……中国仿行宪法，本属不易，若再以多欲之吏，驭无告之民，又值财殫力匮之时，习闻革命自由之说，后患何堪设想！”^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给事中王金镛也有一个奏折，说到直隶省的情形：“自举行新政就地筹款以来，若烟酒、若盐斤，加价之大宗无论矣。其余捐项，有由地方官劝办者，有由委员经理者。旧有之捐增其额数，新设之捐极力扩充。而不肖之土人(这就是土豪劣绅——引者)，见官家之志在筹款也，每假地方办公之名，以济其渔肉乡里之私。于是争赴本处及上宪各衙门呈请创设某项捐税而包办之，每年交款若干。现在民间之物，向之无捐者，官家从而添设之；官家未及议及者，土人出而包办之。彼捐米豆则此捐

^① 许珏：《复庵遗集》1922年刊本，奏议第3卷，第3页。



菜果，彼捐鱼虾则此捐猪羊，彼捐木石则此捐柴草，彼捐房屋则此捐车马。不但无物不捐，且多捐上加捐……”。这个奏折还指出，这样苛重的捐税不可能不惹出事端：“观近来各处抗捐滋事之案，亦可以鉴矣。”^①

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

光绪三十二年（1906—1907年）间，陕西扶风的群众因反对铁路亩捐（亩捐就是在向例的田赋以外，为实行“新政”，这里是为修铁路，每亩加征的捐项）起来抗争。他们包围了扶风城，遭到官兵的屠杀。他们中有些人跑到西安以东，沿途群众纷纷参加。根据陕西巡抚奏报说：群众“指学堂为洋教，指电线为洋人所设，指统税为洋税”。这实际上是说，官方办的一切事都是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群众在华阴打毁了学堂和税局，又进入同州府（大荔），打毁了两座教堂和官钱局、官盐局。

以查户口一事而言，这是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间朝廷下令要办的事。这件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遭到了激烈的反抗。例如，广东的潮州、廉州发生了农民武装起来抗钉门牌的事件，廉州的群众为此还焚毁了一些地主绅士的房屋和美国的教会房屋。云南昭通府因调查户口，编钉门牌要抽果捐来充经费，农民集众数千人把倡议收捐的几个地主绅士的房屋拆毁。据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载，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份，“江苏调查户口之风潮，层见迭出，……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804页。



计八府三直隶州，以滋事闻者几居其半”^①。

办“地方自治”也算一种“新政”。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各地成立由地主绅士把持的“自治局”，官绅结合，更多地向群众勒索。例如，《东方杂志》载河南叶县在宣统二年的情形说：“叶县因新政无款，自治亟宜兴办，初时议定由各乡集款，绅士赴乡劝导，并演说自治之利益。愚民不知，群起反对。”群众中有人宣称：“自治乃害百姓之举。从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从前牛马差使，连正项每亩钱百三十文，今则每亩加至三百二十文。现在又要百姓花钱。花钱事小，将来自治办好，国家洋债，无一不在百姓身上归还，此事万不可答应。官绅串通来迫民反”^②。这就是被认为“愚民”的群众对所谓“新政”、“自治”的一针见血的看法。叶县集合了二万人，倡言造反，以至省里派兵前往弹压。这年在直隶省的易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东方杂志》记载说：“直隶易州近年来办理学堂、警务、自治等事，加捐筹款，民情久已愤恨”。“该州自治局开办后，局绅张某、祖某，竟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共得金钱三万余吊，又陆续勒捐二万余吊，借口措充自治经费，实则分饱私囊。五月初旬，局绅张某等又借调查户口为名，按户敛钱”。这时正值春旱，愤怒的农民群众，冲进城内，“蜂拥至自治局哄闹，局绅均闻风逃窜。乡民怒不可遏，遂焚烧自治局并该州中学堂等”。应州官的要求，省里连忙派兵下去。恰好这时下了透雨，进城的农民纷纷回乡抢季节种地，官方才松下一口气来。朝廷还为此下令直隶总督说：“着即随时妥为防范，毋令再生事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第395页。

^② 同上书，第435页。



端。此次滋闹，有无莠民创首，并着查明，酌量惩办”^①。同年五六月间，山东莱阳的县官以办理调查户口，筹办“地方自治研究所”和实行其他“新政”的名义，勒收亩捐、房捐、人口捐等，激起了农民群众的暴动。群众夺得了下乡骚扰的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由于领导者并不是有志于造反的人，这次自发的暴动以群众的大量死伤而告终。

还值得一说的是自发地起来抗争的群众对待学堂的态度。办学堂算是清朝的一个重要的维新措施。但是各地的学堂多半是在地主绅士的控制下，并不真讲“新学”，即使讲些“新学”，也与贫苦群众无关。在群众眼中，学堂也不过是官绅敛钱的一种手段。所以许多地方如上述的陕西华阴、直隶易州都发生群众打毁学堂的事件。据记载，浙江这方面的情形比较突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巡抚向上报告说：“海宁、海盐、桐乡等处”都有群众“滋事情形甚重，并毁教堂、学堂”^②。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绍兴、严州（建德）、处州（丽水）等府的许多州县的学堂都曾为农民群众打毁，一起被打毁的还有自治事务所、巡警局等。

总之，所谓新政激起的群众反抗斗争，最足以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腐朽的、卖国的、只能带给人民以灾难的形象。

史料工作者曾经根据《东方杂志》上的《中国大事记》和故宫档案，汇编清朝的末日快要来到的几年间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的材料^③。从这些不完全的材料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抗粮抢米的斗争还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第527—529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814页。

③ 《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中的《人民反清斗争资料》，参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是反抗各种新政的斗争，在宣统二年（1910年）发生的次数最多，地区也最普遍。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咨议局、资政院和袁世凯

清朝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为了想把资产阶级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作出了奖励资本家的进一步的规定。三十三年六月的上谕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①根据这个精神，农工商部提出了十条章程，其中具体规定了按照“个人资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寡”，给予商人以不同等级的“爵赏”，例如：资本二千万元以上的，“特赏一等子爵”，资本七百万元的，“特赏三品卿”等等，最低的是资本十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奏奖五品衔”^②。在颁布这个章程后，由于还没有照顾到资本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709页。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45—646页。



较小的人,农工商部又补充规定,“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的,分别发给七品至九品的“奖牌顶戴”^①。与此同时,又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定的《奖励公司章程》修订颁布,那是对于集资开办公司的人的奖励。这次修订放宽了奖励的标准,例如原定集股五千万以上的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改为二千万以上;原定“集股三百万元以上”(不到五百万)的,授予商部的“头等议员,加五品衔”改为集股“一百万元以上”(不到二百万)^②。

这类所谓爵赏和顾问官之类的头衔,虽然提高了资本家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权与相当的官员平起平坐,但是,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的种种妨害,包括捐税繁重,关卡林立,以至外国商品倾销,外国资本在中国享有特权等等,一切依然如故。

作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清朝当局又宣布要建立资政院和各省的咨议局。资产阶级不是主张设立议院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上谕说:“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③。一个月后,又下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咨议局,并筹划在各府州县设立议事会^④。后一年六月,宣布了咨议局的章程,规定各省都要在一年内把咨议局成立起来。为了表示正式成立议会之期不会因为资政院和咨议局之设立而无限地拖延下去,八月里又宣布要在九年内完成立宪的筹备工作。上谕如此说:“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 5738 页。

② 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 640—644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 5736 页。

④ 同上书,总第 5749 页。



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①

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病死了。这个妇人统治中国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日益加深地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她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国做尽了一切坏事。在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她为应付革命的危机，还安排好了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把戏。大地主阶级已经是一个如此没落和腐朽的阶级，以至它只能把慈禧太后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最适当的代表者。

就在慈禧病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死去。两天前，慈禧把光绪的侄子溥仪接入宫内，作为皇帝的继承者，并以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于是这个年仅三岁的溥仪就成了清朝的末代皇帝，他的年号是宣统。实际上执政的是载沣。

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在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各省的咨议局成立。而北京的资政院则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虽然被说成是为议会奠基础，但它们只是咨询机关的性质，当然说不上是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过这种机构毕竟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政体中从未有过的东西，而且在不久后的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咨议局是起了特殊作用的。

各省咨议局的议员的数目多少不等。最多的是顺直（包括顺天府和直隶省），有一百四十人。最少的如吉林、黑龙江、新疆，只有三十人。议员算是选举产生的。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按规定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984页。



是“凡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公益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曾在中学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生，或有举贡生员之出身者，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或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以及“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①由此可见，妇女是全部排斥在外的，农民（贫农、中农以及至少一大部分富农）、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直至小商贩，小业主也是全部排斥在外的。只有地主、绅士、大商人、学界的头面人物，才有成为议员的资格。

官方控制下的这次选举出现了种种舞弊行贿的现象。老式的地主阶级富于保守性，他们中多数习惯于按照向来的规矩去谋求进入仕途或在本乡当豪绅，他们还看不惯咨议局这种新东西。属于立宪派资产阶级这种政治倾向的绅士们在这次选举中特别活跃；在大多数省分的咨议局中，他们占据了多数席位。拿各省的咨议局的议长来看，江苏省的张謇、湖北省的汤化龙，湖南省的谭延闿，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积极进行立宪派政治活动的人物。此外，如四川省的蒲殿俊、山东省的丁世峰、浙江省的陈黼宸、陕西省的郭希仁等也都是这一类人物。他们都是当地著名的新派绅士，也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倾向的绅士。

各省咨议局虽然并不是有实际权力的机构，但是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有了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据点。他们先是利用这据点向清朝当局争立宪，但随后当旧政权被革命浪潮冲倒的时候，他们就凭仗这据点去夺取革命的果实。

在各省咨议局成立以前，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进行过向朝廷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第69页。



请愿的运动。这完全符合于梁启超所说的政治运动只能以向上要求的方法来进行的主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联络了湖南、湖北、广东及其他省份的类似团体,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清朝政府提出早日召开议会的要求。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时规定九年的预备期限是同这次请愿有关系的。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以张謇为首的江苏咨议局发起,十六省的议员代表在上海集会,大家认为九年的筹备时间太长,主张在两年内就应该召集国会。这年十二月,十六省代表一起到了北京,向朝廷提出这个要求,遭到拒绝。第二年四月和九月,各省咨议局加上各地的一些商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又在北京进行了两次请愿。在九月的请愿时,资政院已经成立。

资政院是由二百个“议员”组成的一个机构。这二百人中有一半是“钦定议员”,也就是由皇帝指定的,另一半是“互选议员”,也就是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督抚核定的。钦定议员中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四十八人,“各部院衙门官”三十二人,其余是所谓“硕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这是指学界和商界中的重要人物。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资政院规定在每年九月起开会。宣统二年(1910年)开第一次会。到下一年开会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了。

在宣统二年,由于各省咨议局的发起,要求早开国会的呼声很高,资政院也同意这种主张。于是清廷宣布把原定九年的预备期缩短为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会,并且答应立即成立新的内阁,同时令民政部将各省进京请愿的代表即日解散。

所谓新的内阁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果然成立了。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的名义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



大臣和各部大臣。组成新内阁的十三个大臣中有八个是满族人，其中五个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他是在位的小皇帝的叔祖父，他曾多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一起进行辛丑和约的谈判，是个办理卖国外交的老手，又以收敛贿赂、卖官鬻爵而著名。这个内阁当时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这个内阁显然没有任何欺骗作用，甚至不能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感到是向他们所企求的政治方向前进一步。为什么成立这个内阁？其原因主要的是要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中去看。

反动统治阵营内部的各种势力，在他们共同乘坐的船面临覆没的危机时，一方面要协力挽救危机，一方面他们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形成的倾轧和争夺免不了更加激化。以满族皇室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势力，在为革命的风潮闹得惶惶不安的时候，又感到必须提防统治阵营内部发生动乱。他们担心各省督抚在危机到来时另打主义，另立门户。最使他们忌恨的是实力雄厚，而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不受光绪皇帝的拉拢，出卖了维新派，因而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他在庚子事变中同刘坤一、张之洞站在一边，完全按照帝国主义者利益行事，因而又为帝国主义者所中意。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七年死后，他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训练和指挥的北洋军队六镇（一镇约有一万三千人，相当于师），是当时最强的兵力，分驻在山海关、天津、北京、保定以至东北的锦州和山东济南至潍县一带。他除本职外还有许多兼差，包括会办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和外国会议商约等等。他的衙门设在天津，俨然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第一个步骤就是所谓厘定官制。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把权力，首先是军权集中到中



央来是厘定官制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袁世凯在这种压力下，只好奏请免掉他的各项兼差，并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交给新成立的陆军部（满族官员铁良任尚书），而只保留驻在山海关和天津附近的两镇仍归自己指挥。差不多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把他所辖的军队交给了陆军部。张之洞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人物。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被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这就使他离开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实力地位。与此同时，张之洞也被解除湖广总督职，调入军机，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病死于北京。

袁世凯虽然在形式上被剥夺了军权，但是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以外的军官都是忠于他的僚属，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驻北京的第六镇的统制段祺瑞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被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他曾依靠日本顾问来训练他的军队，他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最后几年中已使自己成为提倡新政的积极带头人。前面说过，废除科举是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提出的。他单独或和别的督抚联名几次奏请实行立宪，他编印《立宪纲要》这样的书，分发各地。他还说是为了试行“地方自治”，在天津县成立了“议事会”，并要以天津为模范推行到全省各地。这个参与戊戌政变，手上沾着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鲜血的军阀，现在正在改变其面貌，以便时机到来的时候，攫取更大的权力。

慈禧太后在安排后事时，把段祺瑞的第六镇调出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得动的第一镇进驻北京。可见她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慈禧死后，朝廷权贵更感到必须防范袁世凯。据说，摄政王载沣曾设计把他杀掉。这种打算虽未实行，但在新皇帝上台后两个月，袁世凯的一切职务都被免掉了。



被赶出朝廷的袁世凯住在河南彰德的洹上村，名曰退隐，其实是在窥测时机，准备卷土重来。北洋军的将领经常悄悄地前来同他商量，而且四方奔走的官绅往往到洹上去拜访他。例如张謇在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到北京去见摄政王，路过彰德，就特意看望了袁世凯。张謇当时记下了对于他在二十八年前会晤过的袁世凯的印象说：“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①。张謇曾和汤寿潜等人联合写信给摄政王，信中“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②，也就是要求像当年一样，重用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属望的是什么人，是明显的。

所以，在朝廷中掌权的亲贵们的心目中，如何对付由各省咨议局掀起的请愿风潮，并不只是如何对付立宪派绅士们的问题。他们担心，在这些绅士后面有地方督抚的支持，而在这些督抚后面，又隐藏着他们仍然需要提防的袁世凯的影子。宣统二年，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十八个督抚两次联名打电报给朝廷，主张内阁与国会同时设立。这些督抚的电报是同咨议局的绅士们的呼声相配合的。急急忙忙地成立那个“皇族内阁”，就是朝廷亲贵们为了防止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乘立宪的机会起来夺权的一个措施。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后的几年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①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46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它的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已经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德国资本家渴望得到更多的殖民地,为此,德皇威廉第二和他的大臣们极力扩张陆军和海军,准备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其锋芒主要是针对英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结束时,欧洲已经笼罩着以英国同德国的对立为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由此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重新组合,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它们在远东的相互关系。

沙皇俄国在被日本打败后,虽然仍不失为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强国之一,但是至少在远东,它已经暂时不再是同英国争霸的对手。为了准备与德国的战争,英国已经同与俄国有同盟关系的法国靠拢,并且也需要把俄国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在日俄战争的和约尚未订立时,1905年8月,英国和日本又一次订立了同盟条约。这是因为,英国仍然需要日本作为它在远东利益的看门狗,而在日本方面,继续保持英日同盟,就可以在英国和俄国接近时,不必担心俄国会对自己发动报复战争。

1907年6月,日本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协定。在这个协定中,日本和法国互相承认它们在中国和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接着,在同年7月,日本又和俄国订立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划分两国在中国的满洲(即中国的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满洲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俄国承认满洲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继这两个协定之后,同年8月,英国和俄国也订立了一个在东方划分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条约,条约的内容既涉及中国,也涉及波斯(伊朗)、阿富汗。在短短三个月中成立的这三个协定,把原来对立的英、日和俄、法这两个同盟结合了起来。这样,英、俄、日、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形成了携手合作,共同宰割中国的形势。七年以后爆发的欧洲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三国联盟也就



在这时开始形成。

对于英、俄、日、法四国协作共同支配中国的形势，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美国当初倡议“门户开放政策”，并在订立“辛丑和约”的过程中争取领导地位，目的是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它支持日本打败俄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进入原来被俄国独霸的满洲。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大资本家、号称铁路大王的哈里曼，立即进行活动，企图收买日本刚从俄国得到的南满铁路，包括沿线的各项有关企业和矿业公司。日本政府虽然先是同意了，并已签定了初步的协议书，但随即反悔，取消了协议书。美国资本家还想从俄国手中收买中东铁路，也没有成功。

沙皇俄国虽然退出了满洲南部，但仍牢牢地控制着东清铁路，占有“铁路用地”十三万余垧，相当于铁路实际用地的三倍。它把铁路沿线看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并且把黑龙江省的全部和吉林省的一大半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也看做是它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这点也反映在1907年的日俄协定中。日本取代俄国而成为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主人以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前者名义上是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一个经济侵略机构。关东都督府不但对所谓关东州（指旅顺大连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而且以“保护南满洲铁路”的名义用它所统辖的关东军控制了被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的满洲南部各地。从此，一个关东军、一个满铁，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地侵略和支配中国的东北三省的武器，一直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日本和沙皇俄国的势力分据满洲的南北部，一方面仍不能不互相防范，一方面又共同排斥对满洲有野心的第三国，在当时主要是美国。1907年日、俄间成立协定，也就因为它们间有这种共同利



害关系的原故。

清朝向来把东三省看作它的“发祥之地”，定为特别地区，禁止汉族人民自由移住，因而从关内各地，主要是从山东，历来有许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下关东”，都只能是偷偷地违反禁例而去的。但是清朝政府无法制止它的“发祥之地”为帝国主义铁骑所践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清朝政府决定把东三省改成和关内各省同样的体制，设制总督和巡抚。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把东三省开放给日、俄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当局看来，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是抵制日、俄两国势力的唯一办法。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都是属于袁世凯系统的人，唐绍仪又是最早的美国留学生之一。美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斯屈拉特立即利用机会向徐世昌、唐绍仪提出了由美国资本修筑一条由新民到法库的铁路，按照计划这条铁路将来还要延长到辽源（今双辽县）、齐齐哈尔，直到黑龙江北境瑷珲。斯屈拉特的后台仍是那个铁路大王哈里曼。但由于当时美国正发生一次金融风潮，哈里曼无力承担，于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权利落到了英国资本家手里。这时，日本政府出来提出异议，它表示不能忍受这样一条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英国不愿意得罪日本，这个计划也就作罢。

由于日本已成为美国扩张它在远东的势力的最大的阻力，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迅速地激化起来。从此，在环绕着半殖民地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争夺中，日美矛盾成为一个中心的环节。1907年左右，在太平洋上甚至浮起了日、美间可能发生战争的阴云。在1908年11月，以美国国务卿罗特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太郎以换文形式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即罗特—高平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暂时使两国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的争夺仍然继续进行。



美国不放弃在中国的东北修筑一条铁路,同日本、俄国控制下的铁路竞争的想法。1909年,还是那个斯屈拉特,作为美国几家大公司合组的银行团的代表,同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省巡抚程德全协议,由美国资本,加上英国资本的参与,修筑由锦州经齐齐哈尔到瑷珲的铁路。这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向列强提出一个所谓“满洲铁路中立”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点是由包括日、俄在内的列强各国共同贷款给中国政府,赎回日、俄两国分别经营的铁路,使这些铁路归投资各国共同经营,而“以中国为地主”。设想中的锦瑷铁路也将由列强共同投资。这是一个打破日、俄两国垄断而由美国领头,列强共管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日、俄的反对,已同日、俄建立合作关系的英、法也不积极响应。美国的诺克斯计划没有实现,连同锦瑷铁路也流产了。为了共同排斥美国,日本同俄国又在1910年7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

在全国其他地区,各帝国主义国家也继续为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互相争夺。英国向来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也不能完全制止强盗伙伴们染指。1905年,英国和法国资本联合组成所谓华中铁路公司,主要是企图获得修筑从湖北到四川的铁路的权利,而这条铁路如果建成,将使他们的势力能够更深入地侵入四川这个大省。1909年,德国银行团也参加了进去。三国银行团协议共同贷款给清朝政府,作为修筑湖广铁路之用;所谓湖广铁路,包括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北段。日本和俄国也想参加,但未能成功。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曾为美国取得,但于1905年由清政府备款赎回(见第十四章第三节)。美国资本家认为,他们不应该被排斥在湖广铁路之外。美国政府支持这种主张,并极力加以促成。由于美国的资本家的参加而在1910年形成了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这个银行团在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间和清朝政府签订了



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美国还想利用这个四国银行团，在财政上全面地控制清朝政府，并且重新实行其进入东北三省的计划。在美国的策动下，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四国银行团同清朝政府订定了一个“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的贷款合同，合同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万镑，并给四国银行团以东三省投资的优先权。成立这个合同是美国对于日本、俄国的一大胜利。但是这时已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四国银行团的一千万镑的贷款没有能实现，而它的铁路贷款则成为引起革命的一个导火线。

1911年7月，英国与日本缔结第三次同盟条约。中国问题是先后三次英日同盟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次同盟条约和1905年的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一样，写上了这样的条款：“保证清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保证列强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以维持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

事实上，在上述几年中，帝国主义列强间订立的其他各有关中国的协定，也都有类似的条文。例如1907年的日法协定，说的是：“……尊重中国之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在华的商业与臣民同等待遇的原则”。日法协定在公开的协定外以秘密的换文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是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日本是福建和东北。同年的日俄协定，关于两国瓜分在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也是规定在秘密的条文中，在其公开的协定中则说：“两缔约国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并相约各用其所有之和平方法，以扶助及防护现状之存续及对上述主义之尊重”。1908年日美间的罗特—高平协定所用的语言也大致相同，那是说：“两国政府决意，依其权限内之一切和平手段，维持中国之独立



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内列强商工业之机会均等主义，以保列国在该国之共同利益”。

这些帝国主义的协约，很明显的，无非是相约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在实际上使中国成为受列强共同宰割和控制的半殖民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在日法协定成立后发表评论说：列强推行“机会均等”、“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其结果必将导致“中国之一草一木无非在各国同盟协约势力之下，然则所谓保全中国者，亦不过瓜分之一变相而已”。这篇文章结论说：“各国所标榜之主义，曰领土保全，曰机会均等，其实可一言以蔽之曰，维持东亚之现状而已。各国在东亚之地位势力，其既确定者日谋保存，其未确定者，使之巩固，则汲汲于维持现状亦无足怪。独是各国维持现状之主义，利用中国之黑暗以遂其蚕食鲸吞之野心，诚各国之利矣。若中国而亦以现状自安，长此不已，日复一日，宁能免于亡乎”。这个立宪派评论者要求“吾国民慎勿乐于居保全之空名而遂以自逸”^①。但其实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采取这种政策感到高兴和满意的并不是“国民”，而是清朝统治者，他们之所以高兴和满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并不公开地采取瓜分中国的步骤，那就势必要“保全”这个腐朽而卖国的统治政权。

在清朝官员中也有人在知道了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的内容后感到愤慨的。江苏道监察御史史履晋奏陈其见解说：“夫中国之自主、土地之完全，谁不知之，岂待日本之保护者”？“以中国之疆域，竟成为各国互相赠遗之物，岂真谓秦无人耶？倘竟默而不言，我将

^① 与之：《论日法协约与中国之关系》。《新民丛报》第九十四号（1907年6月），第2、14—15页。



自居于何等乎”^①！但这只是品级较低的官员的看法，大官僚张之洞就不这样看，他说，列强协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过是“恃强得意，逞笔妄谈，无足深求”，因此不必为此“过于张皇纷扰”^②。清朝的外务部虽然向日、法两国发出照会，表示“中国领土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乃中国之事，与他国无干”^③，但这不过是个装门面、走过场的抗议而已。对于其后几个类似的协定，就连这样的抗议也没有了。

清朝当权派早已经不但不以列强相约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原则为可耻，而且倒是十分欢迎列强这样做的（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在外事方面颇有发言权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根据日本人的提议，向朝廷奏请把东三省主动向一切国家“开放”^④。那时东北三省为俄国势力一家所支配，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又向朝廷提出，在东北的“善后之法”是“遍地开放”，并且实行“变法”，把“东西洋人”都请来当“顾问官”^⑤。前面已经说过，在东北三省为日、俄两国势力盘踞的时候，清朝当局认为可以采取的唯一对付办法就是把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宣统三年（1910年）朝廷谕告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说，在东三省的方针是“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⑥。正因此，美国提出的锦瓌铁路计划和诺克斯计划得到了清朝当局的欢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71卷，第2—3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第200卷，《电牍》七九，第13—14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70页。

④ 《张文襄公全集》第55卷，《奏议》五五，第3页。

⑤ 同上书，第85卷，《电奏》十三，第21—22页。

⑥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9卷，第33页。



迎。当时，清朝外务部对于美国主张把“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义”实行于东三省，表示完全同意。外务部在把诺克斯计划提交邮传、度支二部征求意见的信上说：“美国倡议联合各国，共办东省铁路，此事果底于成，不特中国行政权不致再有障碍，且各国利益既平，则日、俄固无从争雄，英、美亦不致垄断。以现在东省情形而论，计亦无有逾于此者。”^①美国的计划虽然由于日、俄的阻力而未能实现，但是清朝这种方针是不仅想用于东北，而且在实际上是用于全国一切地方的。

帝国主义各国基本上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中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以为自己所要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走过的路，因此可以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情。他们天真地希望，帝国主义国会抛弃腐朽黑暗的清朝政权而来赞助和支持中国革命。其实，帝国主义国家有时作出一些同情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表示，其实质却不过是以为这也是它在侵略中国中所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

日本的黑龙会是成立于1900年的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宗旨，广泛地进行间谍活动。与黑龙会性质相似并与它相联系的，还有一个玄洋社，其成立时间更早。这两个组织的头子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都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同孙中山相结识，同盟会的领导者们也把他们看做是朋友和支持者。黑龙会供给同盟会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内田良平参与了同盟会的成立会。在同盟会的历次起义中，他们的徒众帮助购置和运输军械。日本政府在公开的场合扶持清朝政府，而在暗地里让这些浪人组织插手到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中来。1907年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2卷，第20页。



朝官方的请求不准孙中山再留住在日本；后一年九月，又禁止《民报》出版。但是那些浪人组织仍不放弃和同盟会保持一定的关系。

法国官方也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兴趣。孙中山这样叙述发生于1905年冬天的事：“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这些法国武官中有一人到了武汉，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分子组织的会议，被清朝官方所察知。“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回回国”^①。孙中山在1907年能够身居越南而发动在中国境内的起义，是法国殖民当局所默许的。镇南关之役中，还有法国的“退伍军官”参加。经此役后，法国人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请求而把孙中山逐出越南，不过仍允许同盟会的其他干部留在越南进行活动。

从1902年以后，香港的英政府不再允许孙中山到香港。孙中山虽然有一些英国朋友和美国朋友，但他的革命活动较少得到同英国、美国官方接近的人的赞助。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觉得，保持在清朝统治下的统一中国的外貌，是对它们最有利的，也就最不愿意看到这种统治秩序为革命所打乱。

总之，在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策是维持清朝政府，暂时保持各国在中国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02页。



的均势。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决不是独立的、民主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有时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和赞助，只是增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第二十章第四节已说到，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铁路和矿山，在各有关省分里展开了收回利权的运动。这多半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为首的一个运动。在清朝覆灭前最后几年间，争路权的运动在有的省份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促进清朝统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1905—1906年），浙江省和江苏省的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各自开工兴筑在江苏境内从上海到嘉兴和在浙江境内从嘉兴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英帝国主义出来干涉。它以1898年清朝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曾与英商怡和洋行议订过一个苏杭甬铁路的草合同为根据，认为这条铁路的权利已经让给了英国，因此要求制止商办公司修筑这条铁路。虽然盛宣怀所订的草合同内容极为含糊，而且事隔七八年，早已说不上有什么合法的效力，但是英国公使坚持要照这个草合同办，清朝当局不敢说个不字。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外务部大臣们在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谈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百姓多半醒悟，时势不同，今非昔比，如何能概用压力？只有遇事设法劝导，总期入和平一路，若操之过促，设或激成变故，亦岂各国之益？”^① 清朝大臣

^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48页。



们用这种婉转陈词来使英国同意把办法稍稍改变一下，就是由英国资本家借款给邮传部，而由邮传部转借给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这样，“商办”的名义还算保持，英国资本却能通过清朝政府而操纵这条铁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为此发出的上谕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上谕还说，已经同英国公司商量好，“仍许江浙绅商分购股票，用示体恤。”^①这就分明是说，以英国资本为主，而“江浙绅商”只是被允许搭股而已。

清朝政府轻易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激起了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的抗议。他们纷纷集会，宣言反对。浙江省还成立国民拒款公会，召开全省联合大会，号召群众踊跃投资，坚持商办铁路。浙江的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致电军机处，斥责盛宣怀，要求罢他的官。朝廷反而下令，“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浙江铁路公司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宣称，汤寿潜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并且说：公司经理是由全体股东推举出来的，朝廷无权把他革职^②。可见路权问题造成了资产阶级和代表封建买办势力的清朝当权派之间的尖锐的对立。

清朝政府这时已很懂得铁路的重要性，它不愿意看到在它控制以外的“商办”的铁路，因为这将使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地方势力有所增长。帝国主义者愿意通过清朝政府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点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当时的《民报》有个作者说：修铁路、开矿，“民间要求自办，政府则有驳无准，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开办而先定制限，既开办而多方留难，深恐民间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则写条约、盖御印，直顷刻间事耳，一切利害，皆

①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56页。

② 同上书，第844—846、885、886页等处。



不甚顾。”^①沪杭甬铁路的上述情形，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要集合足够的资金来办铁路这样的事业是很困难的，而且上层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社会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所主持的铁路公司也摆脱不了腐朽的衙门习气，免不了浮支浪费、贪污中饱种种现象。从督抚以下层层地方官员也总是要插手到这些商办的公司中来，更使这些公司难以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江、浙的铁路公司虽然经过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商办的性质，但铁路却迟迟不能建成。其他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形。因此清朝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②。一方面，清朝官方以商办公司不得力为借口要加以吞并，一方面，资产阶级则有力地回击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是出卖主权给洋人。这样，在铁路问题上的斗争就愈演愈烈。

如果仅仅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争权，在清朝当局看来，还是不难对付的。在上述江浙争路风潮高涨时，朝廷通知两江总督端方和江浙两省巡抚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徒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借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③。而端方等人也向朝廷报告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和，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屢

① 《民报》第十八期，第103—104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930页。

③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74页。



在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① 在革命危机严重的时候，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很可能激起广大下层群众的骚动，那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害怕的。这种情形在江浙两省争路风潮中虽没有严重地出现，但稍晚一点在四川是发生了。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湖北也发生争路权的运动。湖南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了一个商办的铁路公司，集股准备修筑粤汉铁路在湖南省境内的一段。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交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1909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洲间的一百一十里的铁路。湖北省也在光绪三十二年为修筑本省境内的粤汉路和川汉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下进行过招股。当时的张之洞表示赞成由各省的绅商投资办铁路。到了宣统元年，张之洞已调任军机大臣，并受任为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他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在湖南，除主持铁路公司的绅商外，新产生的咨议局的议员谭延闿等也积极参与这运动。在湖北，咨议局的议员、教育会、宪政筹备会，武昌和汉口的总商会等机构的代表，还加上留日学生为此事派回的代表，一起开会，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专以拒借外债，集股自办为目的”。他们又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进行招股。当时有人说：“湖北人之拒债，虽在湖南人之后，然其慷慨激昂，则百倍加于湖南人”^②。这时革命党人詹大悲(1888—

①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77页。

② 铸铁：《湘路纪事》。《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第547页。



1927)在汉口办《大江报》，在报上著论反对铁路国有，并且认为中国和平改革已不可能；他发表了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目的文章，号召革命。湖广总督瑞澂查封报纸，逮捕詹大悲和协助他办报的何海鸣，激起了各界人士集会抗议。各界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还进行绝食斗争，但是没有结果。招股办铁路的成效也很少。所以，虽有湖南、湖北两省的绅商反对，清朝政府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仍按照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的意愿签订了关于借款筑路的合同。

就在这个合同订立的前十天，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宣布确定铁路国有政策。这道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这几年来毫无成效，因此“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①。这显然是直接为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扫清道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绅商学界中都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而特别在四川形成了巨大的风潮。

四川这个大省虽然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寸铁路都没有，但是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已经有了个铁路公司。这个公司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开始是官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成了商办的公司。公司的计划是要修建东起宜昌，经万县、重庆而西达成都的铁路，但从官办时期到商办时期，始终只是纸上的计划。公司的资金先后募集到大约一千六百多万元。它的资金主要来自所谓“抽租之股”，就是“凡业田之家，……收租

^① 《愚斋存稿》第17卷，《奏疏》十七，第4页。



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①。这种强制性质的募股，当然不靠官方势力是做不到的。公司成为商办时仍然沿袭这办法。反对这办法的人认为这无异增加田赋，公司的主持人则说这不是捐税，因为是给股票的。由于采用这样的集股方法，所以四川全省的大小地主形式上都成了公司的股东，但把持着公司的则只是少数与官方有联系的绅士。

按照宣统三年的所谓铁路国有的政策，四川的铁路公司必须清理结束。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向北京政府报告说，公司现存的款子只有六百三十多万元，历年支出约一千万元，收支情况一时无法算清。他说：“公司开办八年，账卷山积”，现在要全部结算，“愈理愈莽，不特精密难得，即约数亦猝不易举”^②。这实际上是说，公司的收支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王人文的态度是偏向于公司的，但是清朝政府坚持一定要执行铁路国有的政策。这就同把持着铁路公司的绅士们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这些绅士们不甘心失去公司这个财源，并且害怕因清理账目而暴露出公司财政中的一切弊端。清朝政府的所谓国有其实是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他们有了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的充分理由。

在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后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城里铁路公司举行股东会议，实际上是有关的绅、商、学界头面人物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保路同

① 《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②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1页。



志会利用铁路局的经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出讲演员，还派人到外省和进京进行联络请愿。

保路同志会发出宣言说：“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十年内，购一铁钉，用一厮役，亦不许国人置喙”^①。它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就是说，要求废除和四国订立的合同，使铁路不致落到外国人手里。所以保路会又特别申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②这样，他们就赋予这个运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

发起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蒲殿俊、罗纶这些立宪派的绅士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一开始就竭力想使这个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因而再三要求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③。他们把“卖国贼盛宣怀”（这时任清政府邮传大臣）当作集中攻击的靶子，以示他们并不是反对整个清朝统治。他们抬出了已死的光绪皇帝做护符，大量印发写着光绪皇帝“神位”的长条黄纸，并且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了“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二句话，写在黄纸条的左右两侧。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当时的成都的情形说：“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而且“每条街道

①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①。

保路同志会号召在全省举行讲演，对于讲演会应召集什么人参加，和在什么场所举行都作了很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会所需觅宏厂公所，切不可在空阔坝子”。因为“若在空坝演讲，则无识者杂属其中，不免生意外之事”，而在公所内开会，并且要求入场者都登记姓名、住址，这样虽然“不能十分拒绝”不被邀请而硬要参加的人入场，但是“有此限制，则无识者之入场必少。而被招请者又大半身任地方公事，于生命财产观念甚重，即演讲语涉激烈，不过同生感泣，而急欲得一挽救之力，万不至有暴动”。其所以要有这些清规戒律，同志会的文件中说得很明白：“本会所最重者，一在防暴动，二在有秩序……”^②。

一方面想发动群众的力量来造成声势以对抗清朝政府的压力，一方面又想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不“犯上作乱”的范围内，这是立宪派资产阶级所陷入的矛盾。

七月初一日，成都全城罢市、罢课。省城外各地也都已纷纷成立起保路会来。迫于群众的高昂情绪，以颜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的川汉铁路股东会在七月初九日发出通告说：“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③。绅士们仍然并不是要造反。他们提出的最高口号叫做“川人自保”。七月

① 《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第229、230页。

② 均见《四川保路同志会讲演部“讲演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载《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5—186页。

③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94页。



十三日他们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主张立即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并且要对“乱民”实行“弹压”，但同时主张“由保路同志会会同咨议局”来“维持治安”^①。这却有点像是要由咨议局和保路同志会来做地方政权的中心了。所以朝廷根据新上任不久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报告说：“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道。”^②

七月十五日清晨，赵尔丰突然把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九个他认为是“祸首”的绅士拘捕起来，这是这些绅士们没有料到的。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这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三十多人。从此，在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越出了温和的绅士领导者们所制定的轨道。

当时，同盟会会员虽然有些人在四川活动，但他们没有比较坚强的组织。从1906年以来，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曾多次在川北的江油、川南的叙州（今宜宾）、泸州、川东的广安、川东南的黔江图谋发动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都没有得到什么成效。在四川的城市和乡镇中，会党势力相当大，他们被称为“袍哥”。他们的成分，特别是他们中的头头们的成分极为复杂。参加各地的保路同志会的，很多是会党分子。在赵尔丰制造出成都惨案后，省城附近各县的同志会就以会党分子为主力武装起来，号称同志军，有些同盟会会员参加在内。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是在成都的保路会初期就参加活

①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05页。

② 同上书，第308页。



动的。这时他到荣县，联合会党力量，组成一支同志军。赵尔丰用武力镇压各地向成都进军的同志军，虽然一时做到使成都没有被同志军攻入，但无法平息全省各处的骚动。龙鸣剑领导的那支同志军也没有能够到达成都，他们和赵尔丰的部队在仁寿、成都之间作战失利，转向嘉定（今乐山）方面。龙鸣剑病死，余部由另一个同盟会员王天杰率领回荣县。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吴玉章是同盟会派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他和王天杰等人一起夺取荣县的政权，宣布独立。这是在武昌起义前半个月。

四川以立宪派资产阶级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在七月十五日总督衙门前的枪声中结束，转为全省蜂起的武装斗争。到了武昌起义以后，四川省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又展开了新的局面。这是要留到后面去讲的了。

（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 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行动，是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当革命条件愈益成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没有能立刻看到预期的胜利而感到焦躁和失望。同盟会本来是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原有的小团体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它内部日益出现了意见分歧和派别倾轧，甚至发生了组织的分裂。

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首先和同盟会分裂。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学生界的热烈欢迎。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改由章太炎主编。当时，除孙中山外，黄兴、章太炎也是在同盟会中有声望的领导人



物，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①在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威望。1907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继任。这时，在东京主持同盟会会务的是同黄兴接近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叙述他的革命历史经过时说，正在他进行钦州、廉州的起义时，“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②就是指这件事。这个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从此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再也不能合作。

1908年陶成章和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各地进行活动，他们重新恢复了光复会的组织，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而以仍在日本的章太炎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有的原来不属于光复会的人，如曾接受孙中山的指挥在潮州发动起义的许雪秋也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派遣到荷属东印度各地华侨中筹款的人，和光复会一派互相排斥。章太炎、陶成章作为革命活动家而言，较多地代表小生产者的倾向，他们同孙中山的分裂，既有一些人事纠纷，又是保守的小生产者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的表现。

还有一部分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员，对于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天，他们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会员虽然并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它实际上成为和同盟会并行的组织。它的章程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四句话为宗旨，把同盟会所说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

①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43页。

②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03页。



权”这样的更难以索解的话。共进会发表了一个白话文的和一个文言文的宣言，前者说：“若是守我们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驱逐满人，世界上就称我们为革命的英雄”。后者说：“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①两篇宣言没有提到民主的问题。共进会的组织形式沿袭旧式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它的一些会员虽然在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个组织，总的说来低于同盟会已达到的水平。

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有刘师培（刘申叔）、何震夫妇，他们在1907年办了个名为《天义报》的杂志，刘师培还和曾主编《民报》的张继一起以“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名义宣讲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刊物上大唱高调，以为讲民族主义，讲民主政治都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必须“政府既无，人民共产，无统治被治之分”那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他的高论中已经露出反动的尾巴，他以为中国向来的专制政府其实是种“放任政治”，还比资本主义制度高明，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将是很容易的，而且他竟然说，“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②。刘师培夫妇讲无政府主义是在1907年，第二年他们就由一个姻亲介绍而把自己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甘愿充当清朝官方的暗探。他们回到上海，仍然和革命党人来往，探听消息，报告官方。有人就因刘师培的告发而被捕。张继后来则成为国民党中的反共极右派。也在1907年，在法国出现了个讲无政府主义的《新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共六集，中华书局1961—1963年版，第499、501页。

②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74、969页。



世纪》杂志，一直出到1910年。其主要撰稿人后来多数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极右派，如吴稚晖。出钱办《新世纪》的张静江，曾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中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中国古董生意，发了财。他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又加入同盟会，并不吝投资供应孙中山。他的这种投资果然后来使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元老”。

清朝官方开始对革命党内部实行收买政策。两江总督端方专门派人到日本在留学生中进行这种活动。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还把参加过同盟会的程家桢收为幕僚，派他带了一万元到东京，意图和同盟会联络。汪精卫就是经过善耆而变节投降的。前面说过，汪精卫在几次起义失败后，抱着绝望的情绪去从事暗杀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他和黄复生等几个人，潜入北京，准备了炸弹，计划炸死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官方发觉。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善耆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没有按例杀掉这两个革命党人，而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以优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被释放时成为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

革命党人在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情绪，他们中的思想分歧和组织涣散，使他们不能以强大的统一阵营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清王朝覆灭的大变局。

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迹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①。

^① 《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第205页。



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十四镇，二十协（清朝新军的编制：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一镇含二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经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当过炮兵军官而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新军中的官兵参加革命。预定的计划是在宣统二年正月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还有东、西江和潮、汕方面的会党力量的配合。但是在起义日期还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有一部分新军在阴历新年时因细事和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不得不率领这部分大约一千多人的新军仓卒地宣布起义。他们进攻省城，对抗两广总督袁树勋调集起来的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有的已报名参加同盟会的军官却站到了清朝方面。经过两天的孤军作战，倪映典战死，参加起义的士兵死伤和被捕的共三百余人，其余的溃散，有些逃散到了香港。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九次之失败”。

这时，孙中山在美国的旧金山，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就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他和黄兴等人相会。孙中山描述当时大家的情绪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



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①。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振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为了使这次起义不致再遭失败，他们以为，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筹足经费。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力量和最近一次依靠新军力量都不行，所以这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五百人——后又增加到八百人——作为“选锋”，也就是做起义的基本队伍。

孙中山又到美国向华侨募款，结果从南洋各地和美国的华侨中为此次起义共募集了近二十万元的经费。黄兴等人 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统筹部”，作为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被推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赵声（赵伯先）考中过秀才，又学过点军事，曾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团长），与同盟会有联系。前面说过 1907 年郭人漳同他都奉命率部到钦州、廉州压制当地的民变。孙中山在那时发动起义，曾指望他们响应，他们都没有遵守诺言。在那一事件中，郭人漳固然是玩弄两面派手段，赵声的态度也不是坚决的。后来，由于受到郭人漳的排斥，赵声不能继续在广东军队中立足，离职流亡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他还有一些旧部下听从他指挥，所以他在 1910 到 1911 年间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组织的起义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们的起义计划是由那八百名“选锋”在广州城内首先发动，占领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等重要衙门，取得城内的枪械，然后打开城门，引进驻扎城郊的新军。他们还设想，在占领了广州后，将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虽然为准备这次起义，也进行了在新军和巡防营中的联络工作，进行了广州外围各地的会党力量的联络工作，以至还派人到长江中下游

^① 《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第 206 页。



各省,要那里的同盟会会员们准备接应,但是被视为成败关键的是那八百个“选锋”。黄兴、赵声和其他几个预定在行动中分别担任各路指挥的人,各自召集自己认为最可靠、最勇敢的人充当“选锋”,把他们临时从广东各地和从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从南洋各地召唤到香港。为了使他们能进入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许多机关。起义的经费,主要的是用来在国外各处购置枪械偷运来武装这八百个选锋。

以一群外地来的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这本来已是军事冒险的性质,而事实上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实行了起义计划的又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人。整个起义工作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发难的时间既一再改变,临时担任各路指挥的有些人又主张延期,已经到了广州的几百个“选锋”中大部分退回香港。黄兴这时在广州城内,他认为在这紧要关头,敌方已经有所发觉,戒备越来越严,如再延期,无异解散,又重新决定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香港方面的人接到消息,再赶到广州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在这天下午五时半,就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六十多人突然发动,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袭攻两广总督署。

起义部队攻进了只有少数卫队防守的督署,但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出了衙门,转入水师行台。他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这些起义的英雄。黄兴把他的部下分成三路,企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参加起义的力量相会合。他们在城内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被打散,成为人自为战的局面。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看到形势无望,化装逃走。黄兴本人就是当天晚上受了伤后躲藏起来,逃出广州的。有少数人,在起义的第二天还分别地和敌人进行巷战。

另外有几支“选锋”,如陈炯明、姚雨平所率领的队伍,虽然已



经到了广州，却袖手旁观，从黄兴事后所作的报告书来看，显然不仅是因为指挥联络不灵，而是因为这几个指挥者怯懦动摇的原故^①。赵声所部有一百五十人，起义时绝大部分还在香港，赵声在三十日才到广州，这时黄兴的起义已以失败而告终了。

参加起义行动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很英勇。被俘的人，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喻培伦等，从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材料来看，是坚贞不屈的，他们都被杀害了。事后有人将死于此役的七十二人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但实际上，牺牲的人不止此数。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十次之失败”。由于这次的组织者主观上是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与人力，和敌人作决死的一战，所以他们因失败而遭到的心理打击是极为严重的。黄兴等的报告书中说：“此番以党之全力举事，中外周知，而事机坐误，不能有成。粤省一失，各处都不能发”^②。他们以为，这次广州起义失败，全国各处都没有指望了。

（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在国内的有些地方，革命派进行着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武汉的情形就是这样。

前面（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提到，武汉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过用科学补习所名义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因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没有发动起来的起义的牵连而停止活动。科学补习所的主要成员是当地新军中的士兵，也有一些学界的人参加。湖广总督张

^① 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850页。

^② 同上书，第852页。



之洞这时在湖北省编成了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有些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投入新军,如张难先、胡瑛当了第八镇的工兵营士兵,刘静庵到黎元洪部下当文书。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

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后来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日知会本来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教徒阅读报纸的机构。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1875—1911)在1905年当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和他的一些革命同志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传布革命书报,开会讲演。他们的秘密组织也用日知会的名义。他们仍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1906年孙中山派了几个同盟会会员和一个法国军官到武汉,日知会会员们集合欢迎,因此引起了官方的警觉。这年秋天,湘赣边境萍乡、浏阳的起义发生后,同盟会派到湖北策划响应的人同日知会联系。因此刘静庵被捕,死于狱中。还有几个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捕。日知会的活动就此中止了,但它在新军中散播的革命种子仍在暗暗地发芽成长。

到了1908年夏天,一些有革命要求的兵士发起组织“军队同盟会”,虽然开了会,但没有正式成立。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整个局势发生动荡。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就在这时成立了一个名为群治学社的组织。1910年,这个组织又改组称为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只写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讲求武学”为宗旨,但实际上是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从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历时两年的活动中,可以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同盟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广东虽然也抓新军的力量,但一般只满足于把几个军官吸收到



革命组织中来,以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能把士兵们带起来了。而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却是直接组织兵士。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被推为振武学社社长的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他是湖南人,先在湖南当兵,因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而被军队革除,1908年到了武汉,又在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中当兵。群治学社成立时特别做了一条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①。杨王鹏由士兵升任一营左队司书生,因而和队官潘康时接近,潘康时成为破例吸收入社的军官,而他不过是个排长。第二,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都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所以当时有人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②。群治学社在1910年曾作过发动起义的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这个消息在湖北被误传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长沙的原故。当他们发觉消息不确时,立即停止行动计划。虽然有几个领导人仍因此在部队中站不住脚,但整个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改组为振武学社后,他们更加强了组织的严密性。振武学社的主要人员是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黎元洪渐渐有所察觉。杨王鹏在1910年冬天被革除出军队,他离开了武汉。但整个组织也仍能保存着。第二年阴历的新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蒋翊武(1885—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的《群治学社之始末》,第147页。

② 同上书中的《胡瑛传》,第63页。



1913年)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同他的同志刘尧激一起到湖北,与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并一起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参加了振武学社的工作。王宪章(1885—1914年)是贵州人,初时曾想花钱捐个县官,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国家办好事,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听说武汉新军中颇有些志士,便投入张彪所属的第三十标当兵。文学社继承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传统,在军队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社员。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了它的成员。参加文学社的也有军队以外的人,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在争路风潮中捕没有影响到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后他才得到自由。

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他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1908年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停顿了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这时,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参加并在各地同会党联系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它把有些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至现在还参加文学社的人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新军各标营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为此它们之间虽然互通声气,但也发生了些磨擦和争吵。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觉得,要发动起义,还是需要同文学社合作。

1911年初,同盟会在准备发动广州的起义时,派人到长江流



域各省策动响应。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也跃跃欲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它派人到武汉,既同那里的共进会联系,也同文学社联系。但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提出一般号召,并没有比较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下发动起来的。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一) 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们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统治敲响了丧钟。

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为了发动起义而商谈合作，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他们“首先比力量，争领导”^①，很难谈得拢。共进会方面，打着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人的招牌，又有较多的经费，实际上是以合作为名想吃掉文学社。文学社方面，对此显然有许多顾虑，社长蒋翊武曾向同社的人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②。

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这两个组织在宣统三年七月里（1911年8月）决定合并起来。八月初三日（9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一说其名义是临时总司令），孙武被推为

^①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页。

^② 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同上书，第一辑，第71页。



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在共进会单独准备起义时，曾预定刘公担任湖北省都督。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家庭富有，共进会在武汉的活动经费就是靠他提供的五千两银子。孙武，湖北省武备学堂出身，当过军官，参加过1900年唐才常的起义，又到过日本。他原名葆仁，在湖北从事活动后，改名为武。

实际的起义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也不是在预定的领导机构率领下进行的。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官方加强了戒备。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位于汉口俄国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起火。俄国巡捕闻声来搜查，炸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的人逃走了，机关内的文件都被巡捕搜去。同这个机关相邻的刘公住的房子也连带遭到搜查，刘公自己逃掉，他的妻子、弟弟和其他若干人被捕。俄租界捕房立即把搜查到的东西和被捕者送交清朝官方。在武昌的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负责军事的人当天知道了这个情形，十分紧张。他们感到如果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各标、各营的同志，在当天夜里十二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时发动起义。但是给中和门外炮队的命令没有传达到。炮声未响，起义也就没有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蒋翊武所在的机关遭到军警的袭击。蒋翊武和其他若干人逃脱，但又有多人被捕。

在被捕者中间，刘尧澂（和蒋翊武一起投军的一个知识分子，



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骨干，在这以前，他曾到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彭楚藩(也是知识青年，进过宪兵学校，因而当了宪兵，他先后参加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并为共进会吸收为会员)、杨宏胜(出身农民家庭，由绿营兵士而进入新军第三十标，是文学社社员)这三个人当夜受到审讯，坚贞不屈，在十九日早晨被杀。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澂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三十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澂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瑞澂在十九日向朝廷报告这次事件，说是“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即时扑灭”^①。他没有敢报告新军中的情况，他以为起义的行动及其领导机关已经粉碎，新军中的兵士们的问题不难逐步解决。

清朝官方没有料到，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里，武昌城内外的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兵士们自己发动起来了。

张彪统率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一万八千多人。这时已有一部分兵力被调到四川(为镇压四川的保路军起义，清廷派端方入川，第八镇所属的第十六协大半为端方带走)，又有一部分兵力分驻在湖北省外县和汉口、汉阳等地。在武昌的兵力有十四个营，分驻城内外，约七千人。其中参加文学社等组织的约有三分之一；有的营，如第八镇所属的第三十标的两个营，多半是满洲兵，革命力量很小。十九日白天，各营中纷纷传说，瑞澂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第290页。



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张。就是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

到了这天晚上，驻在中和门内的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首先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较多，他们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其他军官不敢拦阻。士兵们夺取了营房中的弹药，一哄而出，到了附近的楚望台，这里设有储藏枪炮子弹的军械库。驻防楚望台的本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逃走了，因此军械库轻易地为起义士兵所占领。起义的士兵有三百多人，其中多数本未参加革命组织，在占领楚望台后，他们议论纷纷，秩序很乱。熊秉坤虽然在革命组织中有营代表的名义，但是掌握不了局面。有人把事变发生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了出来。兵士们，特别是临时参加的兵士们要求吴兆麟当总指挥。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的干事，但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熊秉坤等人只得顺应多数兵士要求有一个军官来指挥的情绪。这样，吴兆麟就成了起义军的指挥。他命令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驻扎的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去同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联系。这时，在城外的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兵营和辎重兵营中也有一部分兵士发动起来，他们有七十多人设法进了城来到楚望台。接着，属于第八镇的城外的三个炮兵营的几乎全体兵士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各一百多个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近百人，知道了起义的消息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了楚望台。特别是炮兵营的兵士们拖了三门大炮进城，参加起义，更使军心大振^①。

^① 关于工程兵第八营起义的具体情节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主要根据熊秉坤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一文，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



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在楚望台的炮声响起来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更多的士兵参加起义了。新军的营级以上的绝大部分军官都感到自己部队内部不稳,为保全性命,各自离营躲避。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开始时还企图组织镇压,并且亲手杀死了一个进行联系的革命士兵。到了楚望台炮声响起来时,他看到自己在武昌的部队有的已经起义,其余他也控制不了,就躲到一个参谋的家里去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军部队都参加了起义,有一部分仍在反动军官控制下,有一部分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直到天明时,参加起义的部队为数共约二千人。湖广总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制兼巡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等官员听到兵变后,立即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且组织可靠的兵力保卫督署,会剿造反的士兵。

起义军队由于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吴兆麟实际上只能指挥工程兵第八营),进攻督署开始时遇到挫折。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炮击中督署。吓破了胆的瑞澂和铁忠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上了长江上的一只兵舰。张彪仍然在他的司令部里继续顽抗(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相邻)。起义士兵经过三次反复进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渡江逃到了汉口。藩台的衙门也差不多同时被士兵占领。

这样,经过一夜,到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的士兵们掌握中了。

但是,这些取得了胜利的士兵们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的人都不在现场。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在十八日脱险后离开武昌往西向京山、天门方面跑走了,“参谋



长”孙武负伤后在汉口的一家日本医院里。还有刘公，这个预定担任都督、总理的人也躲藏在汉口。蒋翊武是在武昌起义的士兵们取得胜利后的第五天回到武昌，刘公和孙武甚至更晚一点才出头露面。

没有多年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斗争，不会有10月10日^①的武昌起义；但这一夜间的胜利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取得的。他们独立地取得了胜利。为了保持这个胜利，他们面临着更严重的考验。

（二）“谋略处”的领导及其演变

在当时的革命士兵们的心目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革命就是要以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清朝统治。既然已经夺得了湖北的省会武昌，就应当建立一个向清朝宣布“独立”的湖北省的政权，以促进其他各省的响应，而达到全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目的。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来建立这个政权。

躲在一个参谋家里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在11日早晨被起义的兵士们发觉了。兵士们强迫他到楚望台。在楚望台担任指挥的吴兆麟以对待长官的礼仪迎接他。当天下午，革命士兵中的骨干分子们发起在咨议局召开会议，来解决建立新政府的问题。黎元洪在士兵们的枪口的威胁下来到了会场。革命士兵们所以选择咨议局做会场，是因为他们把咨议局看做是一个能代表“民意”的“新”的机关。咨议局的绅士们这时还不敢出头，在士兵们几次催请下，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和

^① 这以后记月日，都以阳历为主。



其他几个议员才不得不到会。汤化龙被推为会议的主席。这个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绅士面对着刚从战场下来的兵士们，不能不表示赞成革命，但他说，清廷一定会继续用兵，他不是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大家筹划，他是一定尽力帮忙的。在这次会议上，吴兆麟提议，由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他的建议得到了咨议局的绅士们的赞成，也得到了到场的士兵们的赞成。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早年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中供职。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之战中覆灭后，他成了张之洞的部下。张之洞很赏识他，曾派他到日本学习，逐步把他提拔起来，在1905年成立第二十一混成协时任他为协统。他是一个和革命毫无关系，而且从来敌视革命的旧军人。

当时参加起义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说，在参加起义的部队中，“非革命分子而临时同情革命的占多数”，“在咨议局开会推举都督的时候，新参加的人数超过革命党人”^①，这的确是给了黎元洪上台的机会。多数的兵士们，由于习惯势力，总认为要成立政府，就要有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来带头才像个样子。就是革命党人也没有能摆脱这种习惯势力，他们想依靠黎元洪、汤化龙的“声望”来号召群众，因此至少并不反对。而且共进会和文学社虽说是合并了，但门户之见仍然存在，他们并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原来商定的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负责人蒋翊武、孙武、刘公都没有在起义的过程中露面，他们中任何一个即使被提名，也不可能得到一致赞成。

在产生了都督的后一天，10月12日，又在咨议局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府下所属四个部的人选，汤化龙被邀请担任民政部

^①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59页。



长。

那末,是不是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政权立即就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呢?事情却也不是这样简单。这是因为,至少在武昌起义后最初几天里,黎元洪和汤化龙还不相信革命真能胜利,他们还不敢马上来享受奉送给他们的政权。

据汤化龙后来说,他最初有过出任都督的打算,但其他立宪派绅士认为,“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所以劝阻了他^①。在起义者给了他民政部长的名义后,他没有推辞,但也不就任。他和他的朋友们还要观望一下。

如果汤化龙可以暂时采取超然态度的话,黎元洪在被安上都督头衔的时候,感到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实际上是被士兵们软禁在咨议局里,——当时,都督府就设在咨议局。他担心他的脑袋可能搬家;或者由于附和造反的罪名而被清朝政府砍掉,或者被认为不顺从革命而被士兵们砍掉。他在咨议局里采取不言不语的办法,既不敢拒绝担任都督,但也不出任何主意,对于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告不发表任何意见。

在把黎元洪推举为都督的那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十五人^②,为首的是蔡济民(1887—1919),新军中的一个排长,是日知会、文学社的成员。在10月10日夜里的起义中,他是二十九标中的革命士兵的带头人。其余我们所知道的人,除几个排长外,都是士兵。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的成员,并且大多是在第一夜起

① 李廉方编,《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出版,第103页。

② 当时人的记载和回忆录中所记谋略处的组成人名单大体相同,惟有一二人有出入。综合各种较可靠记载,共得十二人,即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好几种记载说,一共是十五人,但都未提供完全的名单。



义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几天里军政府的一切大事都由谋略处决定。虽然军政府还成立了四个部,但都有名无实。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可以说,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谋略处手里。革命幼苗刚刚出土,它是否真能成长起来,不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官,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甚至连革命派中的那些原来的领袖人物都还觉得没有把握。在这时候,扶育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轻人手里。组成谋略处的十几个人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不自觉地掌握着革命的政权。他们在最困难的阶段把革命幼苗扶育起来,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果实立刻就会为反革命和假革命所吞噬。

武昌虽然说是光复了,许多在起义的夜里没有参与行动的新军战士们也来参加革命了,但是长江上还泊着三艘清朝的兵舰(逃走了的湖广总督瑞澂就在兵舰上面),汉口方面还有张彪及其残部,武昌城内外也还有潜伏的反革命兵力。就在11日下午,逃匿蛇山上的原第三十标的百余满洲兵,在反对革命的军官率领下,突然偷袭咨议局,虽然他们立即被革命士兵所歼灭,但足见武昌的局势并不稳定。第二天,盛传清军即将大举反攻的谣言,满城风雨,军政府内有些办事人员悄悄地跑开了。在这种情势下,谋略处这个核心的存在,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分散在武昌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实行了镇压,并且在13日布置炮兵阵地,对长江上的三艘清朝兵船进行了炮战。革命的炮兵打得很好,清朝兵船受了伤,不得不远远撤退。这时,汉口和汉阳,由于驻扎在那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发动起义,也光复了。汉阳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亚东担任知府,李亚东是日知会会员,1906年被捕,已经坐了五年牢了。汉口在光复后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由詹大悲和何海鸣分任正副主任,他们两人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张彪手里只剩下两个营,退到汉



口郊区的刘家庙。

武汉以外，湖北各地也动起来了。10月13日共进会的刘英等人在鄂中的京山、天门间起兵，占领了这一带地方。刘英是共进会预定做湖北省副都督的，他所依靠的是会党的力量。同一天，群众武装占领汉川，推举从汉川狱中出来的日知会会员梁锺汉为总司令。16日，黄州、蕲春一带也由革命党人宣布光复。到了18日，驻宜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起义，迅速地获得了胜利，属于文学社的年轻的士兵唐牺支被推为司令官。这样，武汉的两翼，长江的上下游都有了保障。

谋略处决定扩充军队，成立四个协。武汉城乡群众报名参军的人极为踊跃，五天就已足额。新军的兵士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四个协的各级军官。四个协统是吴兆麟、杜锡钧（原三十标的一个营长，是起义胜利后投诚的）、林翼支（原四十二标的一个兵士，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原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社员）。在这四个协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五协，协统由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代表熊秉坤担任。

旧的衙门打倒了，群众是高兴的。新产生的政府和军队一开始确也有些新的气象。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军官和军政府办事人员一律每月“仅支车马费二十元”，兵士的待遇则有些提高，“兵士每月支十元，头目十二元”^①。军队的纪律很好，兵士们意识到自己应当和旧军队有所不同。社会上有了讲平等的空气，不许唤“老爷”、“大人”，不许坐轿。汉阳兵工厂正常地开工，工人们积极地生产枪械，供应民军。商会为军政府代筹经费。

军政府没有能在军事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他们本来可以

^① 曹亚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第157页。



占领汉口往北直到武胜关的铁路线，把武汉北方的大门守起来，但是没有这样做。清朝政府派出的讨伐造反者的部队的前锋，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开到汉口附近。谋略处部署民军阻击。新编成的军队虽然缺乏训练，但是他们一般地打得很勇猛，并且得到了农民和铁路工人的支持。10月19日把敌人逐退到离汉口四十里的滢口以北。初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军民。

看到武汉的军政府有可能站住，有些原来新军中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出来投效革命了。由于民军中缺乏军官，他们受到录用。其中有的人不但是投机，而且起破坏作用。还有些和黎元洪有关系的官僚政客也跑出来了，他们包围着黎元洪，给他出坏主意。

革命党方面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出来了，但他们一般地没有起好作用。蒋翊武从逃亡途中回到武汉后，据当时和他接触的张难先回忆说，他所担心的不是黎元洪当都督，而是黎元洪不肯承担这个职务^①。从上海来了居正，他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共进会的领袖人物，还来了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们都是革命党中的知名人士。他们一到武汉，就和汤化龙一流人相结合。刘公、孙武也相继到了武昌。所有这些都认为黎元洪当都督是适当的，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把黎元洪是否真正愿意当都督看成似乎是成败的关键。

黎元洪逐渐变得“积极”起来了。在居正等人推动下，10月16日演出了由黎元洪登坛祭告黄帝并誓师阅兵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革命人物开始放下心来，黎元洪到底真正当起都督来了。这时，居正和汤化龙一起编制了一个《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②。根据这个条例在17日产生了各部部长，算是正式成立了湖北军政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74页。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10—14页。



府。

根据组织条例成立的军政府称为都督府。都督是军政府的首长，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都督府设四个部，司令部总长由都督兼任。另外三个部是军务部、参谋部、政务部。被任为军务部长的是孙武，副部长是蒋翊武和张振武（共进会的一个会员）。参谋部长是杨开甲（原新军第三十标标统），副部长是吴兆麟、杨玺章（新军中的一个营长，起义胜利后投效的）。政务部部长是汤化龙，政务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个局，都由原咨议局的议员们主持。由此可见，这个新政府的政务部完全归立宪派的地方绅士控制，参谋部交给了旧军官，只有军务部是在革命党人手里。

立宪派绅士们也积极起来了，一切混入革命的旧势力都积极起来了。由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谋略处从10月17日起不再存在了，由谋略处实际上当政的短暂的时日（一个星期）过去了。组成谋略处的成员们一般地不再在武昌军政府中起什么重要作用。他们中有些仍在军界活动的人，在民国初年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被袁世凯、黎元洪杀死。

湖北省军政府到了10月26日又作了一次改组。根据这一天颁布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①，司令部改称军令部，原来的政务部下所属七个局，除文书局外，都改成部（内务、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编制），再加上原有的军务、参谋二部，共为九个部。由政务部分化出来的六个部仍由立宪派绅士们把持。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是黎元洪所亲信的原新军的一个营长。参谋部也仍由旧军官担任。这样，革命党人所掌握的仍只是军务部一个部。这个条例中还有一点

^①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年刊本，第46页。



值得注意,那就是规定了军政府的都督的“僚属”中有秘书、顾问和稽查员这三种人,并且规定:秘书和顾问“由都督自行任用”,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命”。就在这个稽查员制度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了一个总监察处。总监察处设总监察一人,下分稽查、参议二部。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①中规定:“总监察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选,呈请大总统亲任。稽查、参议二部人员,亦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举,会同总监察呈请大总统加扎委任”。这个总监察处是干什么的呢?“本处系奉全国大总统之令,监察鄂军政府各部用人行政而设”;“本处有监察军政府全体之责,虽都督有负职等事,亦得禀请大总统核办”。这里提到的大总统,是指全国的大总统,但当时还没有全国的政权,简章中的这种规定,显然是为了表明,总监察处的地位很高,它不由都督任命而是有权干涉都督的。简章还规定,湖北军政府的各部正副部长都要由监察处“公议推举”,然后“商请都督委任。”

其所以在《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规定了稽查员的制度,并且进一步成立了总监察处,看来是因为革命党人发觉作为都督的黎元洪的权力太大的原故。他们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资格而取得对都督和以都督为首的军政府实行监察的地位。总监察处是成立起来了,共进会的领袖之一的刘公担任总监察。但是总监察处显然并没有能起它的简章所规定的作用。这只要看参与当时军政府的人的回忆录极少提到这个机关就可知道了。不少人把它的名称误为总监察部,以为它是同军政府各部相并列的。事实上,总监察处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机关,丝毫不能扭转政权、军权逐步完全落到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的手上的趋势。

^①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年刊本,第74—76页。



(三) 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十二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起义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在一个月內,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这些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朝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方面。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复杂情况将在下一章内叙述),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不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存在了。

为了应付武昌起义所造成的局势,北京的朝廷紧急地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发出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后一个措施往往否定了前一个措施,后一道谕令往往同前一道谕令相矛盾。这种情形充分表明面临末日的清皇朝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下令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①。只隔了两天,即14日,又有一道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②。

武昌新军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叛变对于清朝说来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在各省的新军都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形。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是它最可以指望的兵力,但是在这六镇的官兵中袁世凯的潜

^{①②} 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293、294页。



势力很大。而且袁世凯在各省的督抚和立宪派绅士中也很有影响。因此在朝廷中立刻就出现了起用袁世凯的呼声。摄政王载沣在两年前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赶出朝廷,是不甘心看到他东山再起的。但是皇族内阁的总理奕劻,多年来已为袁世凯用贿赂买通,竭力为袁世凯说话。奕劻还有一条重要论据:“东交民巷(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区——引者)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①。这就是说,只有袁世凯,才是帝国主义信得过的人。

“隐居”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以“足疾”尚未痊愈为理由拒绝出任湖广总督。这时荫昌带领南下的军队以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由荫昌自己兼任第一军统领,而由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根据袁世凯暗中的指示有意放慢军事行动。袁世凯的计划是要让清朝朝廷更多地受到革命火焰的熬煎以至不得不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朝廷在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派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这就是: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六个条件的基本内容是要清皇朝向他交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从这六条中,又可看出,袁世凯是想用武力以外的办法来对付革命势力。

清朝朝廷不得不逐步地接受袁世凯的这些条件。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另一个亲信大将,这时担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奉令到湖北,冯国璋改任第一军统领,段祺瑞任第二军统领。接着在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而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由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出版,第108页。



他统率水陆各军。

袁世凯这时仍然留在彰德不出来。但是按照他的指示，冯国璋的第一军向汉口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民军方面错误地任用了一个旧军官，原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前敌总指挥。由于这个总指挥怯战通敌，冯国璋在10月28日迅速占领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大悲即时处决了张景良。黄兴于29日到了武昌，担任起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挽回民军失利的形势。11月1日（九月十一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民军退到了汉阳。袁世凯之所以发动进攻，既是为了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也是为了向革命阵营显示一下他的力量。

北京朝廷想以立即实行宪政来逃脱革命危机。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以六岁的小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书责备自己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金壬^①，则动拂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政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②同一天，又根据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的请求，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构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要求他们“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③。这是向

① “路事蒙于金壬”是说在铁路政策问题上受了奸佞的人蒙蔽。这里是指盛宣怀，九月初五日清廷革除盛宣怀邮传大臣的职。

②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36页。

③ 同上书，第338页。



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一切君主立宪派人士，以及一切看到清皇朝的船即将沉没而转上了革命的船的黎元洪之类的人所发出的求助的呼吁。资政院按规定于阴历九月初开会，它奉命急忙制定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法。但是等不到宪法条文制定出来，11月1日（九月十一日），朝廷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命令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但湖北前方的军队仍归袁世凯节制^①。

袁世凯提出的六个条件实际上完全实行了。他在10月31日从彰德到信阳督师，然后又到了汉口。但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立即回京，而且对总理大臣的任命表示“谦辞”。他要先向革命阵营进行一些试探。像黎元洪在武昌的革命政府中当权并受到革命派拥戴这样的事实，当然是袁世凯满意的，这使他相信既可以利用革命来迫使清政府向他交权，又可以从革命阵营中找到他自己的人，从而由他来摆布革命。他向朝廷奏请停止用兵，同时派人和黎元洪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代表他写信给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承认君主立宪。黎元洪11月11日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于黎元洪周围有着认为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实行民主共和的力量，由于革命已经得到各省的响应，声势愈来愈大，黎元洪表示不能同意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但是黎元洪又表示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要他相信这样做比继续支持清皇朝是对他更为有利的。在黎元洪以他自己和“同志人等”的名义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② 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39页。

② 这封信的日期不详，见张国焘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81页。



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①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说，只要他参加起义，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②

黄兴之所以这样推崇袁世凯，是和汪精卫有关系的。已经为清朝的肃王善耆所收买的汪精卫在武昌起义时仍在狱中受着优待。不久他被释放。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活动，很懂得这个有名的“革命家”的用处，立即为他的父亲加以收买。这时，汪精卫写信到武昌，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朝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革命党一致行动的。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工具。袁世凯在到了北京后和他直接联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毫无对于内奸的警惕，汪精卫放肆地在京津间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活动，并且竭力把推戴袁世凯的思想输送到南方去，以后他又带着这种思想到上海、南京活动^③。

袁世凯对武昌政府的和平试探虽然没有立即收到成效，但是他开始摸清了革命阵营中的政治脉搏。

根据资政院的奏请，朝廷在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当时资政院的奏文中说：“伏查革命举动，业已四方响应，逐渐蔓延四川、广东、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湖北等省。

① 这封信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日，即阳历11月12日。《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第72页，载有据原件的文本。该刊编者说，“经几位老先生按笔迹判断”，原件是汤化龙手书。

② 《黄兴致袁世凯书》（九月十九日即阳历11月9日）。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第71页。

③ 李书城的《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说到汪精卫这时期的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200页。参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2、87页等处。



全国糜烂,时势日非。欲济时艰而平国乱,只有改良立宪之一法”。但是因为时间匆促,所以只能先提出一个宪法的纲要,这就是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按照这个“十九条”,国号称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十九条》中规定,成立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①。这样的立宪当然不足以消弭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潮流,但是对袁世凯却是有利的,因为这使他出任全权的总理大臣,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内阁,有了合法的根据。“十九条”中还规定在国会没有成立以前,它的职权由资政院代行。资政院在11月9日举行了个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手续。袁世凯不再推辞了,他在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由汉口到达北京。三天后他组成了一个内阁,其中除了他所亲信的旧官僚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君主立宪派的绅士和名流,张謇被任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被任为法部副大臣,不过他们并没有到任。

这时,清皇朝已经把袁世凯看做唯一能够依靠的救星。袁世凯利用革命的形势而使清皇朝逐步地把权力移交给他的目的开始达到。

袁世凯之所以迅速地上升到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12日,武昌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40—341页。



按期如数摊还”。这个照会同时也声明：“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①。这个照会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同盟会预拟的“对外宣言”（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革命派本来以为由革命军政府发出这样的宣言，就可以争取各国来同情革命以至“承认”革命政府。武昌起义后最初的日子的事实就已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

俄国人是最早知道革命派的这种对外政策的，因为武昌起义前在汉口俄国租界破获的革命派机关的文件中就有这个照会的底稿。俄国驻北京公使立即通知在汉口的领事：“如果革命者有任何正式宣言，拒绝答复”^②。英国驻北京公使在接到驻汉口的领事的有关报告后，也立即通知“该总领事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③。在10月18日，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这五国当时在汉口都有“租界”）发出一个布告，其中说：“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④。这个布告使革命阵营方面的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所谓“严守中立”解释为列强已“承认”他们是与清政府有对等地位的“交战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英国公使朱尔典11月8日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就说明，革命军方面“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⑤。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08—309页。

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29页。

③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265页。

④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10页。

⑤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42页。



原来列强把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租界”当成是“国中之国”，它们的所谓“中立”，实际上不过是指租界的地位而言。

在武昌起义后六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兵舰相继驶入长江，停泊到已为革命军占领的武汉江面上的有十三艘，四天后又增加到十六艘，其中有一艘还开往举起了革命旗帜的宜昌。京汉铁路上的法国工程师“命令将所有的机车及车厢预先调到北方”，不让它们“落入革命军之手”^①。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在武昌起义后八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在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形下“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1900年时它所做的一样”^②。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代办也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③。

清皇朝这艘船在革命的风浪中迅速地沉没下去，这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他们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的权益，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中竭力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沙皇俄国认为这是它在东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强自己地位的时机，它和日本约定，如果满洲发生革命，两国共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35页。

② 同上书，第341—342页。

③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489页。



同出兵干涉，它还乘机派兵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勾结那里的王公活佛，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也曾考虑对中国局势实行武装干涉，它向列强探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国，以“保护各国在中国的权益”。英、美等国反对这种做法，它们认为，如果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就应当由列强协商一致，共同行动。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革命。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这些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辛亥革命武装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国内形势方面。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出场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欢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美国推动清皇朝起用袁世凯起了



很大的作用。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凯前往汉口途中时报告他的政府说：“袁此行形式上虽系军务，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① 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欢迎袁世凯，就因为他们企望，他能够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软化的作用。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英国外交大臣致电朱尔典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② 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新”政权。依靠袁世凯来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险形势，甚至为此在必要时可以完全抛开清皇朝那匹老马，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导的政策。

一个美国作者在1912年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中说，当袁世凯到了北京时，“他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③ 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一切内外反革命势力，包括侵略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面临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阵营中的黎元洪这类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18页。

② 同上书，第314页。

③ A. J. Brow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第173页。



（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以黎元洪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内部篡夺武昌政权，袁世凯则从外面来和他配合，给他协助。

当时汉口有一个军政分府，以刚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主任和副主任，其余的负责人也多半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称为“军政分府”，表现了他们对于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武昌军政府的不信任。^①面对着袁世凯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军政分府首当其冲，它支援前方战争，守卫汉口，起了很大作用。黎元洪出于忌恨，曾想取消这个军政分府，而只给以“驻汉鄂军支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义^②。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自己手里没有军队的詹大悲、何海鸣离开汉口，逃到九江方面去了。据汉口军政分府的成员之一的温楚珩说：黎元洪与詹大悲矛盾很深，詹如不走，必被杀^③。北洋军的攻占汉口，起了帮助黎元洪消灭对他不利的汉口军政分府的作用。

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来到武昌的黄兴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物，在湖南湖北尤其有很高的声望。武昌起义后，曾有人提议请黄兴来当都督。他到了武昌，立即过江到汉口，指挥仍坚守市中心区的民军，组织反攻。民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但没有能突破具有优势兵力的北洋军的包围。北洋军的统领冯国璋下令放火焚烧汉口街市，使残余的民军无法立足。这样，汉口终于完全被北洋军占领。

① 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说：“各同志见都督（指黎元洪）态度不明，议组汉口军政分府”。见该书，第272页。

②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53页。

③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3页。



但是汉阳仍为民军所防守。黄兴作为总司令继续在汉阳同北洋军作战。

革命派中有人主张，黄兴的名义应该是“南方民军总司令”，对湖北省都督黎元洪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削弱黎元洪的地位的主张为立宪派绅士汤化龙等极力反对。他们说，为了团结一致，黄兴只能是黎元洪委任的“民军战时总司令”。加上“战时”二字，带有暂时的含意。已经和立宪派一鼻孔出气的有些革命党人如居正，完全赞成这种主张。居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志有不以委任为然者。余曰：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①于是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搭起了“拜将台”，举行由都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总司令的仪式，据说这是仿照汉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这种可笑的仪式好像是推崇黄兴，其实是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

黄兴率领下的民军，其中包括从湖南开来援助的两个协的军队，在汉阳同北洋军隔河对峙。黄兴的计划是以全力渡过襄河（即汉水）收复汉口。11月17日，汉阳的民军按照黄兴的命令发动进攻，但因各路部队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没有得到预期的战果，在敌军的反攻下全线溃退。这时袁世凯已经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屈服，汉口的北洋军从11月21日起向民军发动猛烈的攻势。黄兴率领全军死守汉阳，经过七天的激战，汉阳终于被北洋军占领。11月27日，民军残部和总司令黄兴本人都过江到了武昌。

退到武昌的黄兴在军政府集议时宣布战败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官兵不用命，第二是军队未经训练，第三是缺乏机关枪和野

^① 居正：《梅川日记》。转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225页。



炮。他主张放弃武昌，到长江下游去攻打南京（那时江苏、浙江等省都已经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防守），以后再回来收复武汉。他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黄兴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有些亲身参与当时的汉口和汉阳战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指出：武昌军政府方面应以必要的兵力沿京汉铁路线和汉水上游扰乱敌军的后方，这样至少可以使敌军不能全力进攻汉口和汉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武汉外围，还有不少自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武装力量，武昌军政府方面也没有很好地领导和组织这些力量来从各方面扰乱和打击敌军。北洋军是久经训练的兵士所组成，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也比民军强。包括黄兴在内的军政府方面的指挥员，眼中只看到武汉三镇，只知道在狭窄的地区内用阵地战来抗御优势的敌人，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是他们战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回忆录的作者还指出，军政府内部有许多矛盾，当黄兴担任总司令时，不但黎元洪不给予支持，而且军政府内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和由旧军官组成的参谋部也同黄兴有矛盾。这些矛盾使民军方面不能有真正统一的指挥。这些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回忆录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经验，所以他们还指出，当年的革命党人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说，“武汉人民拥护和支援革命的事情，我们是熟视无睹的。既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就不能依靠群众发掘他们的潜力。”群众在战争中只能从旁呐喊助威，而“革命党人……不知进一步组织民众从多方面来支持战争，以致使人民拥护革命军、反对清朝的热情无从变为强大的力量。”^① 他们对于战争失败的

^① 李作栋和辜仁发的回忆录。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5页，第一辑，第192页。



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黄兴当日的看法要深刻得多。

北洋军打败了黄兴,使他灰心失望地离开了武汉,这实际上是又一次帮了黎元洪的忙。

由于汉口和汉阳失陷,武昌城里谣言纷起,好像北洋军就要打过江来。11月30日(即在黄兴撤出汉阳的第四天),北洋军从汉阳的龟山炮轰武昌城,进行威胁。军政府各机关中的投机分子大多逃散。12月1日,龟山打来的炮弹落到了作为都督府的咨议局里。黎元洪这时已看清楚大势,是一定要“革命”的了。但是为了躲避风险,保全性命,他仓皇地带领少数亲信,溜出武昌城,跑到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立宪派绅士的头子汤化龙则已在汉阳失守时跑到上海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局面的是革命党人。原来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继黄兴之后,出任护理总司令(代总司令)。他们又以总监察刘公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宣布由刘公代行都督职权。在危难中,他们的表现同混进了革命队伍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

袁世凯不想损害黎元洪在武昌的地位。一个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府是对他有利的。北洋军虽然隔江炮轰武昌,但并没有发动过江进占武昌的攻势。11月26日,即汉阳为北洋军攻占的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表示愿意同武昌方面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求得停战,并要求英国人把这意思设法转达黎元洪。朱尔典立即电告英国驻汉口的领事葛福^①。葛福在同冯国璋商议后,派了个英国商人带了停战条件在12月1日晚上来到武昌,黎元洪已经不在武昌。刘公、孙武、蒋翊武等人认为停战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就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也就是袁世凯方面的要求,

^① 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328页。



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在停战条约上面盖章。这个条约规定停战三天,在这三天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而且规定在此期间,民军方面的兵船“不得行驶,并将机关卸交驻汉英水师官收存”,北洋军方面的火车,“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运动,由驻汉英水师官监视”^①。

黎元洪对于这个停战的协议,是十分满意的。英国人和袁世凯方面都认定他是成立和议的对手,这就大大加强了他不仅在武昌政府中,而且在整个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武昌的革命派中虽然有人认为黎元洪在紧急时擅离职守,应加以谴责,但是这种意见被否决了。革命党人没有勇气不要黎元洪,因为失掉黎元洪就意味着必须和袁世凯继续作战。他们重新把黎元洪请进了武昌城。由于不少立宪派人士跑掉了,军政府人员作了一次改组。内务部长、财政部长等换上了革命党人在起义前预定的人选。但是这并不表明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地位加强。

三天的停战期满后,仍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又继续停战三天,接着又停战十五天。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包括全国各省。袁世凯承认黎元洪有权代表所有起义各省成立这样的协议,是进一步提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事实上,从此,在武汉和武汉外围再没有战争了。随着黎元洪的地位的巩固和革命派内部的涣散,在武昌政权中,革命派的力量当然不能有所增强,而且他们只能毫无抵抗地被黎元洪逐一地收拾掉。

这里应该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虽然如前所述,从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可以看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86—387页。



到,革命派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名义把自己结合起来,在政权中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他们有时也以这种名义集会,共商大计,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纲,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反的,他们中不少人在开始感到胜利在握的时候就各自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同旧势力沆瀣一气,并且在自己内部互相倾轧,互相排挤。当战事实上已经停止的时候,旧官僚、旧军人以及君主立宪派的绅士们,以黎元洪为中心加倍地积极起来了,而革命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紧张起来了。这样就决定了革命派的涣散瓦解。

武昌军政府中一直由革命派掌握的机关是军务部。军务部的三个部长,就是原来的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原来的文学社的蒋翊武,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武。三武之间互争雄长,各不相下,“如委一军官,三人都要委派,平均势力。”^① 共进会的刘公主持下的总监察处和三武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蒋翊武在汉口、汉阳失守的情形下担任总司令,对稳定局势起过一定作用,但在和局已定时,刘公的总监察处召集会议,决定蒋翊武不应再任此职。黎元洪当然接受这个意见。从此蒋翊武连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也失去了。后来在1913年,由于参与反袁世凯的斗争,蒋翊武在广西被杀。另一个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也因和孙武相互倾轧而不能立足,由黎元洪以购置军火的名义派到上海去了,到了1912年8月,黎元洪在北京借端把他杀死。军务部部长孙武则同黎元洪的亲信相勾结,巴结黎元洪而擅权跋扈,引起了革命派中许多人对他的愤恨,1912年2月,一些军官,其中主要是原来的文学社社员,为反对孙武发动了一次武装政变,当时人们甚至称之为湖北的“第二次革命”。但是这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87页。



其实说不上是革命，不过是一部分新的当权者中的内部冲突。利用这次政变，黎元洪杀死和赶走了在军队中的一些文学社社员，同时也解除了孙武的职务。孙武此人，一往不返地堕落下去，后来，袁世凯在准备做皇帝时，他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义勇侯”的封号。至于刘公，1912年初黎元洪任他为驻襄阳的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这样就把这个似乎很有权力的总监察赶出了武昌。当时所谓“北伐”不过是空谈，在这左翼军总司令官麾下，“兵不满千，官多械少”^①。刘公虽然还想在襄阳招兵买马，但是不久，黎元洪就以他并不是“军事专门人员”而是“政法专家”的理由要他交出了军队。他被遣送到北京成了袁世凯门下的“高等顾问”^②。

革命派的人们虽然拥戴黎元洪，至少不反对他，但是这些人以革命首义有功的资格在他座位前指手画脚，仍是他所厌恶的。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的地位终于在起义后不到半年间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跑开，剩下的也同反动势力同化了。革命派没有能力保持住经过他们的奋斗而夺得的政权，只能听凭由他们自己扶上宝座的黎元洪来摆布他们的命运。

这时，黎元洪反过来摆出了民国栋梁的功架，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而大肆攻讦说：“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

① 《武昌开国实录》下册，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①。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革命党消”，第二步应当是“革命军消”。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是不足怪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果实落到他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手里。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办事的。

^① 《致中央及各省消除私念》电，见《黎副总统书牍汇编》第1卷，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35页。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除湖北以外其他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

由于各地方的群众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由于革命力量以外的各个社会势力(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势力)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革命,所以在各个省份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说来,一个省的省会的情况可以代表、或起影响于全省各地,但实际上,许多省在省会以外的各地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复杂情况。这里,主要根据各省在革命浪潮中省政权的演变情形,把它们分成几种类型。

湖南和贵州是一种类型。在这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群众性的起义,推倒了旧政权,建立了以自己为主的政权。但是他们的政权不能保持下去,不久就被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革命政变所篡夺。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声中表示和革命派合作,但随即就充当了扼杀革命派的凶手。

先说湖南。长沙起义的领导者是焦达峰(1887—1911)。他是湖南浏阳人,出身地主家庭,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并在长沙高等普通学堂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1906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



并且是共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共进会原来指望湖南、湖北同时发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焦达峰开始在长沙建立机关,主要从事联络会党,也做学界和军界中的工作。

湖南的争路权的运动,像四川一样,立宪派的绅士们起了领导的作用。以谭延闿为议长的省咨议局成为争路权的中心机关。宣统三年(1911年)春,湖南的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坚持粤汉铁路商办的主张,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这年四、五月间,为了抗议清朝的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长沙举行万余人的集会,修筑长沙到株洲段铁路的工人停工进城,参与到巡抚衙门的请愿,各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罢课。由于清政府坚持卖国政策,立宪派中的有些人和在立宪派影响下的群众趋向于同革命派合作,接受革命的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革命派立即策划响应。这时,驻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协中,已有不少士兵参加革命。协助焦达峰做军队工作的,主要是曾在湖南新军中任排长,因有革命倾向而被开革的陈作新。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同省咨议局的议员董镁、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发难的办法。这些立宪派人士赞成发动新军起义,但认为一定不要“扰乱秩序”,反对运用会党力量,而且主张以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为起义后的都督。这种主张是焦达峰等人所反对的^①。湖南巡抚余诚格感到新军内部不稳,把黄忠浩的巡防营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决定把全部新军限期撤离省城。这使得革命派不能不在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力量尚未应召赶到长沙来的时候,马上发动起义。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即在武昌起义后十二天,焦达峰、

^① 《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8页。



陈作新领导长沙城外的新军几个营的士兵武装进城，占领了巡抚衙门。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听长官的指挥，不发一枪阻拦。因此，起义迅速地取得胜利。黄忠浩和其他几个坚持反对革命的官员被起义兵士杀死，巡抚余诚格逃走。立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这些年轻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们在能够取得胜利的时候是敢于取得胜利的。在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应当拒绝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绅士们来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同这些并不真正主张民主革命的人们合作中保持革命果实。

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宣称：“文明革命与革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①。在革命派的都督府旁边成立了一个以谭延闿为院长的参议院。这个参议院的规章中说：“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② 根据这个规章，凡是都督府的命令必须先经参议院决定，然后都督盖印，由参议院发交各部执行；如果遇到都督和参议院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只要参议院坚持自己的意见，都督就必须让步。这个参议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咨议局，规章中并没有“议员”如何产生的规定，却写上了一条：“参议院须增加议员时必经本院之认可”，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巨家世族”以外的人参加进来。焦达峰等人承认谭延闿的参议院自己规定的章程，也丝毫没有想到改变参议院的组成。由武汉到达长沙的谭人凤叙述当时长沙的情形说：“都督府组织一参事会，总揽全权，都督欲拍一电，亦必经该会盖戳，始得发行。为会长者，即谭延闿也。参谋部

①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第148页。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12年5月版，第8—9页。



亦与该会联，不归都督节制。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①。

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都把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理想，他们以为只要建立一个有权的议会，使行政机关向议会负责，那么不论黎元洪或袁世凯当政都不要紧。本着这种想法，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宋教仁曾到起义后的武昌，写了一部《鄂州约法》，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但只是一个省的）。这部《鄂州约法》并没有施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只是在湖南，出现过一個有权有势的议会。但是这个议会并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倒是反对这个革命的！

焦达峰、陈作新虽然没有物色一个湖南的黎元洪来当都督，但是不敢反对谭延闿的参议院，为了取得有名望的绅士们来和自己合作，甚至宁愿削弱自己的领导权，结果使自己成了“笼中之鸟”。到底还是谭延闿这样的角色厉害，他们在焦达峰当都督的时候，利用议会来控制革命派，到了焦达峰被杀掉而由谭延闿任都督的时候，就把参议院取消掉了。有位历史学家在1935年所著的书中评论这段历史事实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治”精神。他说：“湖南初奉焦达峰为都督，咨议局以其举措乖谬，谋削其权，公举谭延闿为军政部长（开始时谭有过军政部长的名义——引者），继设参议院，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概须经其议决，方得施行，而焦达峰无如之何。此种精神惜未充分发展，政府后亦不肯奖进，以致今日人民尚无切实参政之机会，惜哉？”^② 这种看法完全背离了事情的实质，把反革命的湖南参议院当成了“民治”的模范。

①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第53页。

②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617—618页。



焦达峰、陈作新的政权只维持了十天。谭延闿勾结了新军第五十标的一个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闿立即出任湖南都督。他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面把焦陈被杀归罪于“乱兵”，下令厚葬死者，亲往灵前致哀，一面又出布告说：“照得焦陈都督，实为土匪巨魁。误入该贼圈套，湘省大事几危。业经就地正法，并择妥人挽回。所有都督事务，谭绅组安施为（谭延闿，字组安——引者）。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①。在这次兵变以前，绅士们已经散布流言说，焦达峰是个土匪头子，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说，留学生焦达峰早已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光绪三十一年参加萍乡、醴陵暴动的会党头子姜守旦冒充的。

焦达峰、陈作新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他们幼稚、缺乏经验，看不透谭延闿这类人的阴谋，而最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虽然依靠一部分新军发动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立即以原有的新军为基础招募新兵，扩编军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住军队。他们所有的最大的群众力量是旧式的会党组织。湖南各地的会党组织在知道与他们有联系的焦达峰作都督后，以为哥老会已经当权，他们纷纷攘攘地拥进长沙，跑到都督府里来。当时人描写说：“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②革命派得到会党力量的支持，这使立宪派资产阶级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旧式会党毕竟是落后的靠不住的力量。在看到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后，许多会党分子跑出长沙城，散归各地。各地虽然还有些不服谭延闿的会党力量，但他们或者被谭延闿以武力压服，或者只是在当地按照他们向来的做法进行些无关大局的活动。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第6页。

② 同上书第二编，第5页。



湖北的汤化龙听到谭延闿就任湖南省都督，打电给他：“闻公出，钦喜无量”^①。谭延闿和汤化龙一样，本来是站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立场上的，他的手上还染着革命党人的血。以后，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被尊为“元老”。

在贵州，革命派同立宪派间发生了更加复杂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已经有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这两个带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们在教育界、新闻界，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互相对立，互相攻击。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它的骨干，也有一些官员、地主绅士、资本家参加在内，主要领袖是张百麟。它同贵州各地的哥老会组织有广泛的联系，但它本身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宪政预备会则是由地方上有声势的与官场互通声气的绅士们组成的，它的主要人物任可澄、戴戡出于梁启超门下，有不少会员曾在日本参加过以梁启超为灵魂的政闻社。一个回忆录的作者说：“两派成员，自治学社中寒士和青年学生居多，而宪政预备会则是官绅居多”^②。两派的政治倾向，一派接近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派属于康、梁的君主立宪派。不过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们只是与同盟会有联系，并不是明确地抱着革命目的进行学社的活动。他们参加了贵州省咨议局，并且经过竞争，在咨议局中取得了比宪政预备会更多的席位。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是他们预期的步骤。上引回忆录的作者指出：“细按贵州辛亥革命的真实动力，与其说是领导者的发纵指使，无宁说是群众推动领导，还符合事实些”^③。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第154页。

② 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44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45页。



贵州省城的起义，发生在11月3日，上距武昌起义二十四天。这期间，已有几省宣告独立，尤其是邻省湖南（10月22日）和云南（10月30日）的独立，震动了贵州。自治学社本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这时加紧在官方的军队（新军、巡防营、陆军小学堂等）中进行联络工作。宪政预备会的绅士们向贵州巡抚沈瑜庆密报可能发生事变，主张捕杀自治学社的领袖们。沈瑜庆不敢立即这样办。下层群众情绪激昂，官方可能采取镇压措施，这种情势迫使自治学社的领袖们不能不采取行动。正在他们议论何时和如何发动起义的时候，陆军小学堂学生自动宣布起义。这些学生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一共有二百多人。新军第一标是当地最强的兵力，兵士们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们的行动。甚至巡抚衙门的卫队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拒绝把枪口朝向起义者。巡抚沈瑜庆发觉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可靠的兵力，只好宣布把军政大权交给咨议局。这样，在一个夜里，起义就轻易地取得了胜利。

11月4日，自治学社的领袖者召集各方人士在咨议局讨论成立新的政府。他们提出了建立“联立内阁”的原则，由各党派团体，包括立宪派在内，推代表参加政府。正副都督由杨蔭诚和赵德全担任。杨蔭诚原是新军第一标的副标统（副团长）。原标统（团长）一直坚持与革命对立的态度。这个副标统虽然事先也和革命没有关系，但在起义开始后表示站到革命方面来。赵德全是新军中的一个队官（连长），和自治学社的关系较深。军队归正副都督统领，而另设枢密院总揽政务。由自治学社的领袖张百麟担任枢密院院长，而以立宪派领袖任可澄为副院长。自治学社的另一领袖黄泽霖任巡防总统。在起义成功后，全省各地和自治学社有联系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武装起来，他们编成巡防军，所谓巡防总统就是统率这些队伍的。原来的咨议局改称为立法院，议员和议长都是原班人马，在这



中间,自治学社是占有优势的。这样,在贵州,就出现了在自治学社领导下,也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新的政权。

但是革命派领导的政权是不巩固的。第一,在起义前夕,自治学社在全省拥有社员一万四千人之多,但是在起义胜利后,它和群众的联系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当权的领导者没有执行什么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政治措施,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谋取私利的宗派集团。第二,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根据当时流行于革命派中的所谓“军民分治”的想法,把军队交给旧军官去统领,自己放弃了军权。虽然他们以哥老会组织为底子组成巡防军,企图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武力,但是哥老会组织不经过真正的改组,是不能成为可靠的革命武力的。许多哥老会分子利用革命给他们的合法地位进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更加败坏了革命派的信誉。而且立宪派绅士们也大肆联络哥老会,公开提倡成立“公口”(当时贵州的哥老会的组织称为“公”,如“皇汉公”、“斌汉公”等),一时造成了在省城和外县“公口林立”的现象。立宪派这样做是为了搞乱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这种情形更证明哥老会这种落后组织是可以为反革命所利用的。第三,如何对待立宪派,在自治学社里开始时有两种主张:有人主张排斥立宪派,有人主张合作,张百麟支持后一主张。但是所谓合作,实际上成了纵容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在起义以前,清朝巡抚曾根据立宪派的建议,为镇压革命而组织了一个保安营,又从兴义调来地方豪绅刘显世所率领的民团。由于起义迅速发动,保安营和刚开到贵阳的刘显世的队伍都还来不及武装起来。自治学社的领导人竟容许刘显世和保安营的组织者郭重光都参加到新政府中来,而且以充分的枪械发给这两支队伍。郭重光是个退职的官僚,他纠合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耆老会”的组织,表面上酒食征逐,实际上进行政治阴谋活动。革命派也有人主张取



绅耆老会，而张百麟却说：“民主国家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区区一会，即怀异志，亦何足患”^①。郭重光为立宪派出谋画策，鼓动他们起来推翻自治学社的政权，耆老会实际上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核心。

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维持了三个月。根据郭重光的主意，立宪派花钱收买了黄泽霖所统巡防军中的一些官兵，他们在1912年2月2日袭击张百麟和黄泽霖的住宅，黄被惨杀，张侥幸逃脱。这时都督杨蔭诚已带兵出省，代行都督职权的副都督赵德全却和立宪派相勾结。于是张百麟只好只身逃离贵州。自治学社的主要领袖一死一逃，自治学社的政权就开始瓦解。

也是根据郭重光出的主意，立宪派派人到云南求援兵。云南独立后，当权的是立宪派。在杀死黄泽霖的事变的一个月后，唐继尧率领的云南军队以假道入川进行北伐的名义开进了贵阳，并且立即实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把所有还在贵州军政府中求苟安的自治学社的人以及接近自治学社的人都赶下台来，连已经背叛自治学社的赵德全，不但也失去了代行都督的地位，而且还被捕杀。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耆老会的郭重光、宪政预备会的任何澄等人都担任要职。和自治学社有关系的军队全部相继被解散，属于自治学社的人，许多逃亡出省。在省城和各县，当局按名册逮捕自治学社社员，许多人被杀害。

贵州自治学社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虎虎有生气的一个组织，但是掌握政权三个月后却一败涂地，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前面毫无一点招架之功，这里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

^①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5页。



弱点。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期间，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因此他们显出巨大的声势，但是到了民主共和在形式已经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再没有什么足以引起群众热情的口号和行动，这时，君主立宪派也表示可以承认民主共和的形式。所以，究竟是革命派当权还是立宪派当权，群众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漠然置之了。

资产阶级立宪派从革命派手里夺取了权力以后，是否由自己独占呢？并不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面站着封建地主阶级。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立宪派来篡夺革命派的政权。贵州的耆老会和立宪派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湖南的谭延闿以立宪派的身份混入革命，在他以狡诈的手段登上都督的宝座以后，他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立宪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

（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 保持自己的政权

云南、浙江、四川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力量，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二者间没有像湖南、贵州那样发生流血的冲突，而是合作地进行了起义和独立运动。因为立宪派愿意参加推翻清朝的统治，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合作是有基础的。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领导权。虽然在省内局部地区建立了以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就全省来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中产



生的政权也就直接落到了立宪派的手里；而且由于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这是第二种类型。

在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先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袖张文光是当地的巨富，曾在缅甸经商，1908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联合当地驻军中营以下的一些低级军官，在10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了清朝的腾越镇总兵等官员。起义胜利后正式建立政权，张文光称为滇西军都督。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不是全省的政权。三天后，10月30日在云南省城里也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昆明的起义是由新军中的军官们发动的。云南有新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协驻昆明，第三十八协驻大理、腾越一带。第三十七协协统是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蔡锷（1882—1916）。他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一个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同他的老师一致的。和他合作组织起义的有一群团营级的军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在云南新军中进行活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五百多人中，早已秘密传阅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并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要求革命的风气也感染到新军的士兵群众中。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说：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前，有个新军中当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向蔡锷“直说革命情形，望蔡锷同情”，蔡锷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这个回忆录的作者认为，“由此可见，蔡锷当时对同盟会会员进行的革命活动，内心虽然拥护，但仍留有余地”^①。到了武昌起义后，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同盟会组织支持蔡锷

^① 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第432页。



的领导。

讲武堂的教官和新军的军官有不少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士官生。1905年后，在学军事的留学生中，参加革命组织成为风气，第四期以后各期士官生有很多人随大流地加入同盟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都是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立场，在回国后一般地与同盟会脱离关系。他们中有些在革命后掌握军权的人，成了代表反动势力的军阀。由于他们曾和革命党有过关系，因此他们懂得在革命浪潮起来时要抓住时机。在云南参加起义的军官多半就是这样的人。例如上述率军到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的唐继尧就是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第六期士官生，他在云南起义前是蔡锷的新军第三十七协中的一个营长。

昆明新军的起义很顺利地取得了胜利。第十九镇镇统(师长)锺麟同抵抗失败，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来被礼送出境。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这时，腾越的政权和昆明的政权形成对立的局面，双方在大理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经过协商，张文光承认昆明的省政权，由昆明方面委派张文光为腾越地区的军政长官。

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寄很大希望于他的学生蔡锷，以为他既夺得云南，就有可能开辟一个立宪派的天下来，他授意蔡锷“运用滇军，兼并川鄂，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①。蔡锷的军政府虽然在省内并吞了革命派的滇西军政府，在省外还派兵到贵州消灭了那里的革命派势力，又派兵到四川，在川西南扫荡下层群众的“同志军”的力量，但是梁启超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蔡锷渐渐控制不

^① 陈恒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电稿摘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71页。



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军人。贵州的唐继尧固然已不受他节制，他在云南也受到部下的两个师长的挟持。所以人们说：“蔡锷形同傀儡，而当权者为李鸿祥、谢汝翼”^①。李、谢二人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辛亥革命起义时是营长，起义后迅速升任为师长。滇西的张文光因为李、谢二人的排挤，不安于位，在1913年5月自请解职，在他快要离开腾越时，唐继尧、谢汝翼派人把他杀死在澡塘里。这年冬天，蔡锷也被迫离开云南，他只当了两年云南都督，一些新起的封建军阀代替了他的位置。

浙江省也是由革命产生了以立宪派为都督的新政府。革命派的光复会在浙江影响较大，但自经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失败后消沉下来了。1909年后，有些老光复会员又在浙江活动起来，他们除了像过去一样联络会党分子外，又加强了同军界的联系。新军第二十一镇所属第四十一协驻在杭州，在辛亥革命前夕，它的团、营级军官都表示赞成革命。11月4日，即在武昌起义后二十多天，这些军官领导全协士兵发动了起义。浙江巡抚增韞被俘，镇统、协统逃跑。这次起义并不是光复会有组织地准备的，参加起义的军官们也只是看到大势所趋，想从革命中找个人的出路。起义的第二天，就由地方士绅们把当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请来，当了都督，宣告革命的胜利和军政府的成立。

汤寿潜原来是浙江省咨议局的议长，又是正在修建的沪杭甬铁路的总理。他是请愿立宪运动中的一个知名人士。在一些光复会会员和参加起义的军官们的会议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和秋瑾合作过的会党头子认为汤寿潜曾赞同杀害秋瑾，不应当推他当都督。

^① 新加坡《国民日报》，《记云南张君文光死事》。转引自《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26页。



一个在起义前夕参加光复会的知识分子坚持推汤寿潜，他说：“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其实是十天——引者）即被推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进行”^①。这是说，如果浙江由类似焦达峰的人当都督，将难免“再演倒督恶剧”，也就是说，从湖南的立宪派人篡夺革命果实的悲剧所取得的教训，是本来应当把政权交给立宪党人。但是手里没有军权的汤寿潜上台后两个多月就自动辞职了。都督的位置辗转落到了朱瑞的手里。此人在起义前是新军第四十一协的一个标统（团长），他利用参加起义而使自已上升为实力人物。

在浙江省省城起义后，全省十一个府相继成立军政分府。把持各军政分府的，有的是旧军官，如宁波是原第四十一协的协统（旅长），有的是当地的地主绅士，也有原来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会党头头。鲁迅那时正在绍兴，他描写绍兴光复时的情形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② 绍兴先是本地士绅成立军政府，然后从省里来了王金发的军队。王金发是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一个会党头子，所以鲁迅文章中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他当上了“王都督”以后，完全溶化在旧势

①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资料》第七册，第156页。

② 《朝华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2页。



力中间,说不上是革命派了。但他仍不容于省里的当权势力,不久后他被朱瑞所杀死。

在四川,情形复杂得多。

前面说过(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在武昌起义前,四川已发生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争路权的运动,这是进步的爱国群众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拘捕了为首的九个绅士,并在省城内造成了屠杀群众的惨案,这样就激起了全省各地的“袍哥”为主力的群众性骚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乘机进行活动。

分散在省城和各地的同盟会会员虽然不少,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成都的新军第十七镇有一个排长叫夏之时,在日本留学时加入过同盟会,回国后仍和同盟会有联系。11月5日,他在成都东南约五十里的龙泉驿鼓动了几个排的士兵宣布革命,夏之时被推为革命总指挥。他们往东经简阳、乐至、安岳、潼南而奔向重庆。有一些参加同盟会的知识分子在重庆城里活动,里应外合,把夏之时的部队迎入城里。这样就在11月22日光复了川东的这个重要城市。在这里成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军政府都督是同盟会会员,原任中学堂监学的张培爵,副都督是夏之时。蜀军政府的宣言文告完全是用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军政府虽然渐次把统治权扩展到了附近若干州县,但还不是一个全省的政权。

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五天,省城里也出现了政权的更替,但这里一点也没有革命气息。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0月30日已把扣押起来的立宪派绅士们释放出来。这些绅士们得到自由后立即发表《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他们说,由于政治局面已发生很大变动,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当然作废,所以保路同志会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



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① 在群众的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保路”的范围的时候，立宪派绅士想以这种呼吁来熄灭革命的火焰，当然没有任何效果。各路保路军继续紧紧围困着成都城。赵尔丰看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方法控制四川的局面，就和立宪派绅士们进行谈判，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把政权转让给这些绅士们。11月27日，赵尔丰发出文告，说是“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② 就在这一天，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文告中说：“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③。既说是“共和”，又说是“帝国”，这是最明显的君主立宪派的口吻。军政府的都督由蒲殿俊担任，而副都督是赵尔丰的亲信，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这实际上是立宪派绅士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政府。为了使赵尔丰愿意出让政权，蒲殿俊等绅士还同意赵尔丰带兵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去“办理边务事宜”，并承担给以兵饷和行政经费。不但如此，他们还同意，在宣布四川独立后，赵尔丰可暂不离开成都，“以便（新政府）遇事商求援助指导”^④。赵尔丰的这一着是很狡猾的，他把烫手的栗子交给立宪派绅士，而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还可以根据局势发展，在可能时重新取回出让的政权。他的这一着又有对付奉朝廷之命率军入川的端方的作用。端方的军队这时已到达重庆、成都之间的资州（今资中），朝廷默许他到达成都时接替赵尔丰的职位。不过在成都宣告独立的后一天，资州发生兵变，端方的脑

①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89—490页。

② 同上书，第509页。

③ 同上书，第511—512页。

④ 同上书，第504页。



袋被士兵们砍掉了。

蒲殿俊只当了十天都督。12月8日蒲殿俊检阅巡防军，在赵尔丰唆使下，士兵当场哗变，散到全城各处抢劫。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说：“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①驻扎在城外凤凰山的新军，有一部分被调进城弹压，但他们一进城也跟着一起抢劫。城里“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了所谓“自卫团”，既参与抢劫，又自称“保卫街邻”，捉拿满身载着赃物分散的士兵。接着各县的“保路同志军”也成群结队地拥入成都。

郭沫若这样描写“同志军”的军容：“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铜、铜铜，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以至“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②。这些同志军本来是由于立宪派绅士们倡导保路运动而唤起来的，但它起了远远超过绅士们预期的作用。郭沫若指出：同志军手里的可笑的武器事实上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葬送了清廷的原动力”^③。但是这时没有人能够领导这种自发的力量。立宪派的绅士固然不能，在四川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领导不了，不能赋予这种自发的力量以明确的斗争目标。自发的群众无秩序地拥进成都城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蒲殿俊的政权垮了台，朱庆澜因为指

① 《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页。

② 同上书，第252页。

③ 同上书，第253页。



挥不动新军，跑掉了。赵尔丰虽想乘机复辟，也做不到。

成都有一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员，在蒲殿俊的政权成立时就开会发宣言反对，现在是他们上台的好机会来了。问题是他们依靠什么力量。立宪派的失败的经验使他们看到必须有实力，但也使们不敢号召群众力量。他们投身到了一个拥有实力的叫做尹昌衡的当权者的身旁。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在日本时参加过同盟会，因此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实力派”，“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① 尹昌衡乘此时机攫取了都督的宝座，而以立宪派绅士的领袖人物之一，原咨议局的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同盟会会员董脩武、杨莘友等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个政府形式上好像是实力派军人和立宪派、革命派的联合政府，但它其实是从革命风潮中产生的反革命政权。在这个政府中的立宪派已不成其为立宪派，革命派也不成其为革命派，他们一致拥戴尹昌衡这个实力人物，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秩序，镇压那些使地主、资产阶级如此恐惶不安的自发的群众力量。尹昌衡的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杀掉了赵尔丰，一方面发出了“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②。它用镇压和收编的双重方法把在成都和省内的各地同志军平息了下去。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重庆军政府。当时在四川也像其他有些省一样，群雄蜂起，同时并列着许多都督，但在省城外最重要的是重庆的军政府。成都方面用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

^① 《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6卷，第256页。

^②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13页。



方面让步。1912年3月，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都督张培爵到成都取得了个副都督的名义，副都督夏之时卸任出洋。于是四川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后终于统一到了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尹昌衡的手里。不久后，尹昌衡为另一军人胡景伊所排挤，那是实力派互斗，同辛亥革命无关了。

在最早换旗号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份中，革命派的起义胜利后，立宪派都被邀参加政权，这个事实大大地鼓舞了各省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本来以为，向清朝朝廷请愿、要求，是进入政权的方便道路，现在他们发现，在新的形势下，完全可以利用革命而进入政权。有个历史学家在评论辛亥革命时写道：“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制’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①现象确是如此，但只说出这种现象，并没有表明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真正作用。

中国的地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中，他们不但积累了许多镇压农民革命的经验，也积累了许多篡夺农民革命果实的经验。资产阶级立宪派同地主阶级联系密切，他们很多人是从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他们继承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和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一方面他们又不是那种“初出茅庐”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第188—189页。



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容易得到一切旧社会势力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而成为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在上一节所说的湖南和贵州，立宪派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在这一节所说的云南、浙江、四川，立宪派抢先使革命的果实落到自己手里，甚至抢先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但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毕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立宪派来欺骗革命派，并且利用他们的手来攫取革命的果实。看到革命浪潮汹涌难挡，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就后退一步，让资产阶级立宪派暂时站到第一线去起抵制革命的作用。某些拿到了一省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虽然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权并不能较久地保持，就因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革命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卷土重来，需要更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权也就被他们抛开了。云南的蔡锷虽然有军权，但也免不了这种命运，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就更不用说了。

四川的情形最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开始是因为同封建统治势力有利害冲突而想利用群众的力量，但他们所唤起来的群众运动却使他们吓破了胆。他们被封建统治势力利用来作为结束革命的工具。他们所主持的政权只能是短促的、过渡性的，过渡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反动的、合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需要的军阀政府。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

在陕西和山西，革命后的政权直接落到类似于前面所说的从云南到贵州的唐继尧、浙江的朱瑞和四川的尹昌衡那样的军人手



里。在革命前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沾过革命党的边，靠革命而起家，成为割据一省的当权者。

陕西的新军第三十九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于10月22日在西安起义(和长沙起义同一天)，协统手下的一个参谋官张凤翔成了大统领(以后和别省一样，改称都督)。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虽加入过同盟会，但随即脱离，并没有参与革命活动。在就任都督后，他以原咨议局副议长郭希仁作为谋士。在陕西，有些知识界同盟会会员进行活动，领袖人物是井勿幕，他们对新军的起义，起了推动的作用。但在新成立的省政权中，他们没有什么地位。陕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张奚若有个回忆录写了当时的情形。张奚若是陕西同盟会会员，在起义胜利后从外省回到西安，他写道：“到了西安之后，最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翔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张凤翔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①井勿幕等人原来和哥老会有许多联系，但这时当权了的哥老会头子已不把革命派放在眼里。张奚若说，他在西安待了两三个月，很失望，“同同盟会的人谈，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这些同盟会分子曾利用哥老会群众所具有的革命性，但没有能力领导这些群众，克服由于胜利和当权而在他们身上滋长起来的弱点。井勿幕等人寄希望于黎元洪和黄兴，想“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当然这只是幻想。张凤翔既利用了哥老会的势力，以后又伺机杀死了几个不听他话的哥老会头子，逐渐把哥老会的力量改编成为七个旅又一个独立团，这样他就成了控制陕西的实力派。

陕西省独立后，山西巡抚陆锺琦害怕波及山西，命令新军第八

^①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54页。



十五标从太原出发，去防守河东。这个标的第二营官兵多有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他们领到子弹后，在10月28日夜里首先发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枪杀了陆鍾琦和协统谭振德。城里还驻有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采观望态度，没有让他的部队参与起义。起义胜利后，军界人士和绅士们在咨议局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府。由于立宪派人士、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的提议，阎锡山被推为都督。他是张凤翔同期的日本士官生，也曾在全盟会里挂过名。当时人记载说：“晋省自光复后，军政府一切计画及筹款事宜，阎都督必先商之梁君善济，斟酌再三，然后开议”^①。十月下旬，清朝官军攻入娘子关，占领太原后，梁善济又倒到清朝官方那面去了。阎锡山向进攻的清军求和不成，采取了逃避战斗，保全实力的政策，放弃太原，带领部队仓皇逃往晋北。清朝虽然夺回了山西省会，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革命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在1912年4月回到太原。此后他成为从北洋军阀时期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时期长期统治山西的土皇帝。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人物是很复杂的。有些城市中的流氓头子也混入了革命队伍。在上海、福州、广州，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这种挂着革命招牌的流氓政客做他们的代理人，乘着革命的浪潮，攫夺了权力。

在上海这个敏感的城市，革命的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没有一家报纸敢违反群众的情绪而刊载革命失利的消息，如果刊出这样的消息，报馆立刻就受到群众的包围和责难。在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的“租界”以外，清朝在上海的驻军只有淞沪巡防营等少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第204页。



数部队。这些部队的统领看到大势所趋，也不敢公开采取反对革命的立场。但是革命派向来只是把上海作为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活动的一个据点，并没有在这里做过群众组织工作。11月3日，带有自发性的以帮会力量为主体的群众起义攻占了江南制造局，由此上海就宣布了光复。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即陈英士）是上海帮会集团（所谓“青帮”）的一个头子，他又得到商界的领袖李平书（即李锺珏）等人的支持，一跃而成为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还对江、浙两省抱有野心，但他并不去同已经在革命风潮中控制了这两省的旧势力作斗争，却把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看做眼中钉。陶成章虽然有缺点，然而不失为一个忠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2月，他在上海遭到暗杀。暗杀的主使人是陈其美，执行人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是陈其美的部下，又是租界捕房的包探头目、著名流氓黄金荣的门徒。

在福建，革命的果实也落到了有同盟会会籍的流氓政客手里。福州在光复时，当地的新军和旗兵（满洲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满洲人将军朴寿战死，闽浙总督松寿自杀。12月5日成立的新政权表面上看来完全是由同盟会掌握的。都督府大纲规定：“都督府以都督一人、参事员十人组织之，概由中华同盟会推举”^①。担任都督的孙道仁是驻福建的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他在起义前三天参加了当地同盟会组织。担任参事员的十个同盟会会员中为首的是彭寿松，其人本是缉捕局局长。他既是同盟会福建支部的主持人之一，又另组了一个名为福建军警同盟会组织，这是旧式的帮会组织。彭寿松原来就是个帮会头子，他把城市中的流氓势力组织在自己周围。手里有军队的孙道仁在夺取政权前匆忙地加入同盟会，就

^① 郑祖荫，《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福建建国出版社1942年版，第62页。



是为了要使自己有一点革命的色彩,并取得彭寿松的流氓势力的合作。光复后不久,同盟会福建支部和福建军警同盟会宣布合并,由彭寿松担任会长。政权机关的参事会改组为政务院,政务院的总长仍是彭寿松。以孙道仁和彭寿松为首的政府,除了改变旗帜以外,并没有什么新气味。所以,这个政府刚成立不久,就觉得有必要发布这样的通告:“照得本军政府在闽起义,历经宣布树立共和政体宗旨,想尔等人民均所周知,现在假定设立省政府,(意为设立临时的省政府——引者)一切办理进行方针,仍以蕲达共和目的为准。查有少数之人,妄滋疑虑,散布谬言,甚至胆敢指本军政府办理方针与所宣布树立共和宗旨不合。……此等造谣生事,自示之后,悉应息绝,否则自干咎戾,本军政府决不姑恕。”^①

广州的独立是广州的绅商们在12月9日宣布的。在这天以前,省城以外各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当时通称为民军)纷纷起来,都有奔向省城来夺权的趋势。广州的绅商们十分惊惶,他们在咨议局开会,决定“宣布共和独立”,并且请求两广总督张鸣岐担任都督。张鸣岐拒绝,他和其他一些主要官员都逃跑了。于是绅商们又决定请在香港的同盟会的名人胡汉民来当都督。半年前,同盟会曾经用武力夺取这个城市,遭到惨败,现在却由绅商们打开城门向革命派举起欢迎的旗帜了。胡汉民在10日到广州就任都督。绅商们本来以为有个革命党名人当都督,可以使各路民军安定下来,但他们立刻发现,胡汉民不过是个没有实力的空头革命家。各路民军的头子抱着个人野心,带领所部,纷纷进入广州,他们完全不受胡汉民的控制。其中最强的是陈炯明。他曾是广东省咨议局的议员,加入同盟会后,参与黄花岗起义之役,临阵脱逃。以后他到惠州一

^①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第89—90页。



带联络帮会组织，自成一军。在广州，他和其他民军头子组成军团协会，他当会长。广州绅商看到陈炯明是个实力派，就把他推举为广东省的副都督。胡汉民在都督位置上只坐了一个多月，就辞职跑了。陈炯明继任都督。他利用军团协会的力量排挤胡汉民，而在他当了都督后立即解散了军团协会，并运用各种权术使各路民军的头子互相猜忌，逐一地解散了这些民军。陈炯明固然算是列名同盟会内的革命派，但实际上他的政权不过是广东绅商利用来结束革命形势，稳定原有的社会秩序的工具。

以上这几个省都是套上革命派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这是各省风云中的第三种类型。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还有第四种类型，那就是原来的当权者，即清朝的地方的军政长官，在当地的地主绅士的拥戴下，摇身一变，变成了新政权的首脑。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江西九江的新军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和兵士企图响应起义，但他们没有领袖，就请五十三标标统（团长）本来同革命毫无关系的马毓宝当领袖。有了湖北的黎元洪的先例，马毓宝同意了。于是他就成了宣布独立的九江军政府的都督。这是在10月23日，武昌起义后十三天。江西省城南昌的绅士们看到形势紧张，为了防止发生革命，劝告清朝巡抚冯汝骥宣布独立，但他不敢做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10月31日驻南昌的新军兵士和陆军小学、测绘学堂的学生们宣布起义。于是绅商兵学各界代表人士开会集议，推举新军第二十七协协统（旅长），也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军人吴介璋为大都督，成立江西军政府。他们把原巡抚冯汝骥



恭恭敬敬地送出了南昌。军政府通令全省说：“各道府厅州县所属各官，仍著照旧视事。……所有民事、刑事暨习艺所、监狱、学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办理。”^①也就是说，行政制度、官员、社会秩序一切照旧。

在这个军政府成立十天之后，由于军界内部的倾轧，吴介璋的都督位置坐不稳了。测绘学堂教员彭程万当了都督。拥戴他的人声称是黄兴在武昌委派他当江西都督的。但他没有军队，所以他只在都督宝座上坐了九天。九江的马毓宝率兵到省城，受到绅商的欢迎，彭程万只好辞职，马毓宝成了全省的都督。

属于这一类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和广西两省，这两省都是由清朝的巡抚，本省最高的军政长官宣布光复。

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 10 月 26 日报告北京清朝政府说：“自武昌失陷，苏省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既虑革党之构煽，又防伏莽之窃发”^②。他接受当地绅商领袖的要求，11 月 5 日在巡抚衙门前挂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革命算是完成。既然巡抚已经革了命，就不准别人革命了，所以这个新都督第一批发出的告示中说：“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干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③。程德全是个善于投机的官僚。1900 年义和团战争时，他以候补知县的身份在黑龙江，对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俄国侵略军殷勤接待，侵略军对他很满意并表示信任。他在官场上由此发迹，一步步升到江苏省的巡抚。在辛亥革命中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创立时的一个要人。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第 21 页。

②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9 页。

③ 同上书，第 63 页。



广西各地会党力量很多，在革命风潮中，他们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活动。巡抚沈秉坤同其他官员和咨议局的绅士们商议，决定抢先宣告独立。11月6日夜里，他们在桂林城里竖起几百面黄旗，上写“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第二天，这个清朝的巡抚就成了咨议局公推的都督，他宣布：“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改咨议局为议院”^①。但沈秉坤没有掌握军权，三天之后都督职位被广西提督陆荣廷夺去，陆是一个地方实力派。

安徽和山东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局势的发展有一些曲折。

在安徽的省城安庆，11月8日，由咨议局的绅士们宣告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当都督，咨议局议长窦以珏当民政部长。安庆的军界和知识界中有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他们不承认这个军政府，推出了留日士官学生王天培当都督。朱家宝表面上退让，但迅速地组织力量赶走了王天培。革命派在安庆没有实力，就去江西请求援助。从九江来的军队和本地的军队在安庆互争雄长，造成了混乱的局面。朱家宝的都督也做不成了。绅士们一时甚至找不出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来，他们组织了一个“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作为临时行政机关。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那就是在上海的孙毓筠。此人是安徽人，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南京被端方逮捕，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虽然如此，革命派仍然承认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这样的“革命家”当然是地主绅士们所可以接受的。12月下旬孙毓筠到安庆，以他为首的政权其实还是旧军人和地主绅士的政权。当时安徽省城以外各地已成立了好几个军政分府和类似的机关，它们都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第185页。



拥有武力，以革命的名义各自割据一方。它们的头领有真革命党，也有假革命党。为了发号施令，造成统一局面，在省城里有一个以假革命党为首的政权对于旧官绅来说，自然是有利的。

济南绅商学各界人士，11月5日在咨议局开会，讨论“预备独立”。山东虽然有些同盟会员在活动，但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他们也有人参加咨议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决定是请求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向北京政府报告说：“闻咨议局集会时，激烈党已形暴动，昌言即日宣布独立。经和平党劝解，改为劝告政府，以冀转圜。”^①所谓“和平党”就是指上层的立宪派绅士。孙宝琦决定接受“和平党”的请求，11月13日宣布：“山东全省人民，自今对于清朝，断绝一切之关系”，“以山东全省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②。他在同一天电告北京朝廷诉述他的苦衷：他已被推为“总统”，“坚辞不获，且恐别滋事端，权宜俯允，冀保一时治安。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③。袁世凯当时已控制北京政权，正竭力保持他在北京的势力，所以除了直隶、河南二省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以外，又出兵山西占领太原，对于山东的即使形式上的独立也是不甘心的。他派了官员去协助孙宝琦，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因此，山东又回到了清朝的旗帜下。

（五）“不准革命”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

① 《孙宝琦九月十六日致清内阁电》。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第125页。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第231页。

③ 《孙宝琦九月二十三日致清内阁电》。《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第128页。



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散布的革命思想，他们所发起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社会最基层的被压迫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革命动乱的时间越是延长，在广大基层群众中都积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性就会愈加迸发出来，以至完全搞乱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各地方的地主绅商所最害怕的。许多地方的起义的枪声一响，甚至起义的枪声还没有打响，原来的君主立宪派绅士们就表示赞成革命，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清朝的军政官员也摇身一变主张民主共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为了制止下层群众的真刀真枪的革命，不这样做是不行的。鲁迅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而写的《阿Q正传》这部小说中，特别写了“不准革命”一章，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都不准下层群众革命，并为此迅速地设法弄了一个表示革命的“银桃子”挂在自己身上。

为了发动革命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从下层群众中找力量，但是在他们感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不再理会这种力量，甚至也加入了不准下层群众革命的行列。

从河南省的情形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下层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并不能深入地、持久地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工作。

开封、洛阳等地的知识界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们主要通过办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他们也曾想依托新军军官的力量举行起义，但没有成功。当时的一个同盟会



会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河南的同盟会组织在辛亥年前本已在新军中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在袁世凯重揽大权后,“倾向革命的带兵官多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们以为袁世凯当权就是汉族人当权,而且“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封建观念也就从中作祟”的原故。由于新军军官们不愿参加起义,同盟会组织“不得不转而依靠绿林力量和地主武装”^①。

11月下旬,同盟会河南组织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洛阳的行动,主要想依靠在嵩县的羊山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力量,他们为首的叫王天纵。嵩县的一个小学堂堂长石言是同盟会会员,他在豫西绿林中颇有声望,经过他的关系,同盟会组织派了在河南府中学堂当教员的刘春仁上羊山。刘春仁向王天纵和他的弟兄们宣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武昌起义的情形,以及这次攻取洛阳的计划。和刘春仁一起上羊山的吴沧洲回忆说:“听了刘的讲话。他们都欢天喜地谈开了。有人说:‘先杀洛阳知府,再杀河南巡抚,赶走北京皇帝,孙文坐了天下,我们都要当官,没有人敢说我们是土匪啦!’有人说:‘六哥(指王天纵)当了都督,我们就可以出头啦!’”^②他们从这种认识出发,同意和同盟会合作进攻洛阳。由于清朝官方已经增兵防范,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发动起来。

在洛阳地区有一个名为“在园”的农民组织^③。建立这个组织的是住在洛阳东关下园的南大定,他是个菜农,并以染布为副业。他的住处同河南府中学堂相近,这个中学堂的教员和学生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因此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染。他在下园创立的

① 吴沧洲,《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369页。

② 同上书,第363页。

③ 杨依平,《略谈“在园”活动》。同上书,第375—381页。



这个组织渐渐扩展开去，不但在洛阳城四关，而且在洛阳以外，直到伊川、孟津等县境内都有了这个组织。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下园农民参加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会员也参加了它的活动。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影响下，南大定领导的这个农民组织确定以推翻清朝为奋斗目标。但是这个组织的性质基本上仍是一个旧式的江湖会党，所以它也叫大刀会或小刀会。接受新成员时采取“摆堂”的仪式，饮血酒宣誓入盟。首领是“大哥”，以下依次排下去，直到“老十”。各地组织，每月逢三、六、九或二、五、八等日集会，练习武功。“在园”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清朝官方警觉。1911年洛阳知府察知“在园”组织有在洛阳发动起义的苗头时，立刻向省里告急。从开封派来了军队实行镇压。南大定被捕，英勇不屈地就义。许多参加“在园”活动的积极分子或者被捕，或者逃亡，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事发生在武昌起义的前夕。

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约定王天纵的部队进攻洛阳时，也同时发动了参加过“在园”组织的农民群众。但是没有任何同盟会会员继承南大定把这里的农民运动坚持下去。这次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以后，“在园”这个农民组织消失了，这里的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系也断绝了。

至于王天纵的那支部队，它以后活动在豫西一带，曾同陕西军政府所派一度打出潼关的张钊部队合作。在全国政权被袁世凯篡夺以后，羊山下来的大部分力量被编入分驻豫西各地的地方武装，称为镇嵩军。原来在河南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刘镇华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他利用这些武力作为资本，投靠和效忠袁世凯，成了一个封建军阀。王天纵的几个大弟兄当了 this 军阀的爪牙。王天纵本人被召到北京，当了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这种情况表明，资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用革命呼声唤起了由破产的游民而变成的绿林好汉们，却不可能引导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河南是在袁世凯控制下一直没有宣告独立的一个省。至于那些宣告独立的各省，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下层群众所遇到的也是“不准革命”的禁令，这种禁令甚至是伴以武力镇压的。

在动乱程度最大、历时较久的四川，下层群众的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最明显，遭到革命后的新当权者的镇压也最厉害。在其他各省，都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的不同形式的革命骚动。对于这些大量出现的、分散的、小规模革命骚动，要一一加以叙述是不可能的。这里举几个典型事例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江苏省城是和平光复的。但江苏各地却并不那么和平。

在扬州发生了以孙天生为首的城市贫民和兵士的武装起义^①。孙天生本是扬州的手工业工匠，失业后流亡到上海，接触到革命党。他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回到扬州，利用江湖会党关系，把驻防当地的旧式绿营军中的一些士兵鼓动了起来。在11月7日（苏州光复后两天）他率领域外的士兵们，杀官起义，鼓噪入城。许多城市贫民和游民聚集到他的周围。几个小时内，起义者摧毁了城内的全部统治机构。他们打开盐运使的库房和大清银行，让群众来分取银钱，又打开监狱放出了狱囚。第二天，孙天生以扬州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宣布三年不完粮，诸捐杂税全免，还禁止商人抬高米价肉价。没有知识界的人参加他领导的革命，为他写告示

^①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中有《孙天生起义调查记》一篇，这篇调查是访问了五十余位当年亲历扬州光复的老人后写成的，执笔者是祁龙威。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几篇有关的记载。



的是个做古董买卖的小商人。新都督孙天生身缠白绸，骑马巡街，并且传见巨商富户。

封建性的盐商在扬州势力很大。恶霸、豪绅多半同盐商相勾结。他们本已准备像苏州一样地实行和平光复，孙天生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他们一面假意同孙天生商谈合作，一面散布孙天生是“冒充革命党”的流言。同时，由商会会长周树年出面邀请在镇江的徐宝山带兵来扬州。徐宝山本是盐枭头目，受清朝招安为缉私营营长。由于他凶狠残暴，绰号“徐老虎”。这时镇江已经光复，原新军第十八协的一个营长当了镇江的都督。徐宝山的部队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但已算参加了革命。他很想乘革命之机捞个地盘称雄一方，周树年的邀请正合他的意。扬州有些地主和商人不信任他，责问周树年说：“孙天生是假革命，徐宝山是否真革命？”但是周树年和其他巨绅豪富觉得孙天生比徐老虎更可怕一些，宁愿承认后者是“真革命”。徐宝山的军队进入扬州后，杀死起义军民七十余人，孙天生也被捕杀。徐宝山成为扬州军政分府的都督，周树年等人筹饷供养他。

苏南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边界地区在1911年发生“千人会”的农民起义^①。这年七月里这个地区大雨成灾，被剥削的饥饿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绅商囤积的粮食。在抢米风潮中产生了千人会这个秘密组织。武昌起义的风声传来，农民中间传说：“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可以不交了”，千人会渐渐公开活动。三县交界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宰猪喝血酒结盟，

^①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有《千人会调查记》一文及其他几篇有关资料。这篇调查记是1960年扬州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乡土资料调查队进行调查后写的，执笔者是祁龙威。



盟辞的主要内容是：“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在江苏省城和平光复后，这三县也迅速成立了由地主、资本家、旧官员组成的新政府，无锡军政分府的首脑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同盟会会员。这些新政府都采取保护地主阶级、反对造反的农民的立场，它们催迫农民照常交租。12月间，常熟的军警下乡到王庄逮捕了千人会领袖人物周天宝。千人会以锣声号召群众集中到王庄，捣毁了王庄的几个恶霸地主的住屋和他们所开设的商铺，并且在王庄城隍庙里成立司令部，张贴出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的布告。孙二、孙三都是兼做裁缝的贫苦农民，樊文涛是穷苦塾师。

这时，江苏省境内自称都督的到处都有，但千人会产生的贫苦农民的都督是不被承认的。无锡、江阴、常熟三县的新政权，在苏州和上海的军政府的支持下派兵围剿千人会。手中只有锄头、钉耙、鱼叉、鸟枪的农民群众遭到了惨酷的镇压。千人会失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孙二、孙三、樊文涛始终没有被捕，但是他们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还可以拿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为例^①。干草会是当地农民自发的组织。“群众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为干草会。武昌起义、太原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两县的各乡干草会“用鸡毛传信，沿村传送”，号召会众，集合起来，要求免粮免税，并且放火烧毁了许多大地主的家。这时两县还是清朝的旧县官。不久，民国的新县官上任，地主们向县里、省里控告干草会。官方根据他们的控告进行镇压。各乡被认为是干草会头头的人，很多被捕，受到酷刑，被判罚款，有的还被杀头。

^① 据1962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



(六) 交战与议和

前面已经说过(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在袁世凯的军队占领汉口和汉阳以后,武昌军政府接受了袁世凯的停战建议,先是两个三天的武汉地区停战(12月3日晨到9日晨),接着是包括全国各省的十五天的停战(12月9日到24日)。

除武汉以外,发生战争的地区,主要是北方的山西、陕西,南方的皖北和南京。

清朝的两江总督驻南京。在江西、江苏、安徽三省都已宣告对清朝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剩下南京一个城。这时南京城里有江防营、缉私营、巡防营共四十多个营的兵力,其中主要的是江南提督张勋所统的江防兵二十营。由于张勋坚决主张效忠清朝,张人骏不敢接受南京绅士们提出的宣告独立的请求。南京本来还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张人骏担心新军中官兵有革命倾向,在武昌起义后,把第九镇全部调离南京城。第九镇的司令部移驻到南京城以南四十多里的秣陵关。徐绍桢本不是个主张革命的人,但看到大势所趋,决定站到革命方面来。11月8日他指挥所部进攻南京,失败了。他的部队退集镇江一带。驻镇江的第九镇第三十五标的兵士们已先一日(11月7日)宣布起义,成立了军政府,营长林述庆当了镇江都督。徐绍桢到上海和各方面联系,决定成立江浙联军,再次攻打南京。

江浙联军的总司令由徐绍桢担任。参加联军的除徐绍桢的部队外,有镇江的林述庆的部队、苏州程德全派出的刘之洁统带的部队、从浙江来的朱瑞统带的部队,还有从上海吴淞来的黎天才的数量很少的部队。他们参加作战各有自己的打算。清朝朝廷曾指派



当过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以宣抚使名义到四川去，岑春煊从广东把黎天才部调到上海准备做随他入川的卫队。武昌起义发生，岑春煊放弃了入川的打算，这支部队在上海无所依归。黎天才参加进军南京不过是想乘机捞一把，找个出路。江浙两省派出的军队也都是为了扩充势力。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并不能很好地协同合作。就是原来属于第九镇的军官林述庆，现在也自立门户，不愿受徐绍桢的节制。但是南京已是一座孤城，进攻的联军兵力大于守军，优势是在联军这方面。从11月22日起经过十天的战争，联军分路占领了南京城外各个据点。张勋无力抵抗，南京的美国领事为他出面求和。在议和的条件尚未商定时，张勋率所部逃出了南京城，渡江到浦口往北走了。两江总督张人骏和城内其他主要官员也都逃走。这一天12月2日，是武昌宣布停火的前一天。

在皖北有一支由一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领导的淮上军。在安徽省城宣布独立后几天，淮河南岸的寿州（今寿县）发生了起义，为首的是同盟会会员，曾经留学日本的张汇滔和省咨议局议员王庆云。在占领寿州后，他们以原来组织的民团和一些会党力量，再加上收编了当地的部分清朝官军，组成淮上军，分路进兵皖北各地。张勋逃出南京北走的途中，遭到占领了凤阳、蚌埠等地的淮上军的截击。淮上军企图消灭张勋的部队，没有成功。张勋到达徐州，在袁世凯的支援下扩编队伍，盘踞在那里。由张汇滔率领的一支淮上军向皖西北地区推进，先后占领了颍上（阜阳）、太和、蒙城、涡阳、亳县等地，他们还准备乘胜进军河南省，由豫东的沈丘、淮阳等地攻向京汉铁路中段地区，以扰乱湖北清军的后路。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就命令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倪嗣冲进攻皖西北。12月10日倪嗣冲夺占太和。虽然武汉方面已和袁世凯商定从12月9日起全国停战十五天，但倪嗣冲仍继续进兵阜阳，这里是颍州府



城。淮上军据城坚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攻进城内，张汇滔率军突围。淮上军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被俘三百人。倪嗣冲除把这三三百被俘人员枪杀外，还把阜阳城内所有不是本地口音的人一律当“乱党”杀死。倪嗣冲自己是阜阳人。在攻占阜阳后，倪嗣冲接着又从淮上军手里夺取了皖北其他许多地方。在1912年以后，倪嗣冲成为统治安徽的军阀。淮上军领袖张汇滔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的指使者就是倪嗣冲。

北方的陕西省和山西省，在宣布全国停战以前和以后都有战争。袁世凯在提出全国停战时表示，陕西和山西是不算在内的。

陕西省的军政府组织了东路军，由张钫统率，在11月中旬夺占潼关，进入豫西地区。袁世凯派赵倜率领名为毅军的部队在豫、陕边境同张钫部反复交战。张钫还得到了豫西的王天纵的部队配合。12月中旬，全国已经停战的消息传来，张钫派代表到敌营去议和，代表们都被杀。战争仍然继续进行。终于在1912年1月20日，赵倜的毅军占领了潼关。张钫的陕西军队被击溃，因而西安以东的通道完全向敌人敞开了。同时，西安还受到从西面来的威胁。在陕西宣告独立后，清朝朝廷任命在甘肃平凉的满洲官员升允为陕西巡抚，驻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拨给他一部分精兵，并且派陕甘提督张行志率兵和他配合，分路攻入陕西境内。不顾外边的停战协议，升允攻到乾州，张行志攻到凤翔。陕西军政府在作战中主要靠哥老会的力量。由于哥老会的弟兄们死守硬拚，使敌人没有能占领乾州和凤翔。但是在1912年2月上旬敌人占领了礼泉，并进逼咸阳。在东西两面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以张凤翔为首的陕西军政府有过放弃西安，退到陕南的打算。最后，由于全国政权已经落到袁世凯手里，张凤翔在陕西的地位为袁世凯所承认，升允和张行志的部队才退出了陕西。



太原在10月30日成立了军政府后，清朝朝廷派新军第六镇的统制吴禄贞率部由石家庄向西攻打太原。吴禄贞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中国学生。他虽没有参加同盟会，但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倾向。由于他花钱贿通了庆亲王奕劻，所以能够挤进为袁世凯的亲信所把持的北洋六镇。但是第六镇的军官们几乎都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吴禄贞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他的部队。第六镇下辖两个协，第十一协在武昌起义后拨给了荫昌，随着他南下。吴禄贞带到石家庄的只有第十二协。他派人同山西军政府暗中联系，11月4日他同阎锡山在娘子关秘密会晤，商定合作，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还同驻冀东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一向互通声气，他的计划是以燕晋联军和冀东的军队一起进兵北京。袁世凯对吴禄贞早已抱有戒心，把他看做是必须铲除的异己分子。为此，他派人以重金贿买了吴禄贞所亲信的卫队长。11月6日的夜间，吴禄贞被这个卫队长杀死。接着，滦州的张绍曾也被清廷调离军职。

吴禄贞死后，袁世凯改派北洋新军第三镇统制曹錕及所属第五协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12月中旬，曹錕、卢永祥的军队攻陷娘子关，并且进占太原。与此同时，晋北的大同也发生战争。在大同的同盟会支部领导下，11月30日发动起义，成立了大同军政府。清廷从直隶派出部队围攻大同。以续桐溪为首的革命派分子坚守大同四十多天，弹尽援绝，放弃了大同。清军占领太原和大同，都是在全国停战的协议成立以后。曹錕、卢永祥的军队在占领太原后，还北到忻县，南到临汾，以“剿匪”名义镇压各地的革命力量。

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到，袁世凯提议停战议和，是为了麻痹对方、束缚对方的手脚，但并不妨碍他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动用武力。当时，在南方已经宣告独立、主张共和的十二个省内反对议和，



要求北伐的呼声很高，有的省还出动了北伐的军队。虽然有些呼声不过是空喊，有些所谓北伐军并不真是打算北伐（例如云南唐继尧就是以北伐军的名义进入贵州，霸占贵州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状态继续保持，从南方各省总会有些军队由各种不同动机出发而侵入到仍在袁世凯控制下的北方几个省来。用停战议和的空气冲淡北伐的呼声，这对于袁世凯是极为有利的。

在独立的各省中当权的，除了虽不能彻底进行民主革命但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派以外，是些穿起革命外衣的君主立宪派绅士、旧官僚、旧军阀、流氓政客。他们都已经把宝押在民主共和上，因此他们也坚持清王朝必须下台，国家必须得到民主共和的形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作为建立民国的功臣和元勋而保证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对于他们说来，革命和战争状态愈早结束愈好。如果能不经过战争，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一个民主共和国，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所以袁世凯抛出来的停战议和的诱饵对他们是十分可口的。

11月9日，湖北的黎元洪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汉来举行会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也在11月11日共同发出号召，要各省代表到上海集会。结果，有几个省的代表到了武汉，多数省的代表集中在上海。在上海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湖北军政府方面以首义的资格力争以武汉为中心，上海的联合会在11月23日决定搬到武汉。11月30日，代表们在武汉开始集会。这时，冯国璋的军队已经占领汉口和汉阳，正在炮轰武昌，所以会议躲到了汉口英租界，在一家洋行里举行。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并没有根据这个组织大纲产生临时大总统，组成临时政府。会议只是重申了在上海已经作出的决定，说是各省“公认湖北军政



府为中央军政府”，要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①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适应于袁世凯的要求而作出的。在袁世凯通过汉口英国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三天的同时，也提出了长期停战的问题。英领事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在汉口英租界内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并且说，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能议及长期停战。因此，使黎元洪具有“执行中央政务”的身份，正是为进行和议创设前提。

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开到12月7日。会议决定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在第二个三天停战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停战十五天的建议，并同意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同黎元洪或者他的代表“讨论大局”。他们还确定了和平解决的四个条件，这就是：“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②有的记载说，会议还有这样的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③。根据其他记载，会议虽然没有明确地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与会的代表们对这点是有默契的^④。正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定或默契，当然就更急于成立临时政府了。

而且在成立全国政府的问题上，在长江下游三都督和湖北军政府之间还有矛盾。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一个是旧巡抚（江苏程德全），一个是立宪派（浙江汤寿潜），一个是流氓政客（上海陈其美），他们虽然同黎元洪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上的对立，但是他们主张在上海开各省代表会议，是有他们的野心的。会议虽然从上海移到了汉口，但每省仍留下一两个代表在上海。正在汉口会议举行

①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44页。

② 同上书，第246页。

③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91页。

④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页。



期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三个都督的发言权。4日,他们嗾使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这三个都督也参与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并且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他们把黄兴当作一张牌打出来,是利用他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声望来压倒具有“首义”资格的黎元洪。事实上,黄兴在汉阳战败以后到了上海,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以他表示推辞。

由于武昌处于对方的炮口之下,黎元洪无法反对以南京做临时政府所在地。同时,黎元洪还遭到另外一个失败。袁世凯派的议和代表虽然到了武汉,但是和议却没有能在武汉举行。黎元洪所指定、各省一致同意的议和代表是伍廷芳。伍廷芳在上海,表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为这次议和拉线的英国人也主张在上海租界里举行和议。对此,黎元洪也无法反对。但是对于以黄兴为大元帅,他提出了抗议,表示不能承认。

在汉口和在上海的各省代表,12月11日都到了南京。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在最初召集这些代表时,是要求各省的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各省的旧咨议局也各推代表一人。因此,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多半是立宪派的人物和投革命之机的政客。这些代表中也有同盟会会员,但他们在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上并没有独立的主张。例如在汉口开会时担任议长的是老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坚持主张要成立临时政府只能以黎元洪为首脑。

12月14日,各省都督府会议在南京开始举行。会议决定根据在汉口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这时从武昌传来消息,说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武昌向黎元洪表示,袁世凯也主张共和,而且唐绍仪即可到上海同伍廷芳开议,于是会议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暂时担任大总统的职权。黎元



洪一派的人反对把黄兴摆在黎元洪之上，而黄兴自己也力辞，于是12月17日，会议又把这两张牌颠倒了一下，让黎元洪当大元帅，黄兴当副元帅。但是所谓大元帅、副元帅都不过是个名义。各省的代表实际上是在等待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会议的结果，把大总统的职位空下来留给袁世凯。

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局势发生新的变化。



第二十五章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

(一)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遭到失败后,孙中山仍继续在美国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闰六月十七日(8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说:“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①但他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所想望的胜利就在湖北省会开始了。他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

孙中山后来在他的回忆革命经过的文章中说,当时他如果经太平洋回国,二十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②他又认为,外交方面的关键是在英国。因此他从美国到了英国。这时外国报纸上已经有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的说法。他在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对清朝政府的巨额贷款进行交涉,并且想同

^① 《复美国某埠华侨郑泽生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3页。

^②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09页。



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的问题。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朝政府,至于革命政府,那要等正式成立后才能开议借款问题。孙中山又从英国到法国,然后登轮回国。12月25日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

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倡在中国通过革命实行资产阶级理想的人,他为此已经坚持不懈地斗争了十多年。从1895年起,他被清朝政府通缉,从此他不可能回到国内活动。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迅速响应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所结出的果实。孙中山是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而回到国内的。

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就在革命党人中也有人不同意他回国,例如坚持主张黎元洪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就以为孙中山最好还是在海外活动。谭人凤的自传说,他当时的主张是“黎既冒首义功,自应俾之过渡”。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他又认为,“中山不悉国内情形,临时政府初起事艰,决难胜任,不如以全权大使历聘列强,备为异日正式选任。”^①

革命势力由于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一个有力的中心人物,这使反对革命的方面感到震惊。袁世凯派到上海进行和议的代表唐绍仪在12月27日电告北京的内阁说:“默察东南各地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声势愈大。正义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指清政府——引者)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②。

当孙中山快要到达上海的时候,许多报纸说,他带来了“巨

① 谭人凤:《石叻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第59页。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第7页。



资”，支助革命军。孙中山在他自传中这样说：“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①

但是和议已经在12月28日在上海开始。

袁世凯派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留美学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多年，1900年后在清朝先后任外务部、邮传部的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他既是袁世凯所信任的官员，又是个老留学生，因此被派为代表。袁世凯还派了各省籍的官员和名流多人随同唐绍仪南下。唐绍仪谈判的对手伍廷芳，也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留学英国，曾在香港充律师，又做过清朝的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和刑部的侍郎，并且担任过两任驻美国使臣。他第二次出任驻美公使，1910年初回国后，住在上海，和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接近。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伍廷芳有几个参赞，汪精卫是其中的一个。前面已经说过（见第二十三章第三节），汪精卫在北京出狱后已为袁世凯所雇佣，他是随着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一起到上海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却又一变而成了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由于他既同袁世凯关系密切，又被认为是同盟会的革命家，所以他在议和进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急于要求南方，也就是革命方面承认停战状态继续保持下去，虽然事实上在安徽、陕西、山西等地主要由于清朝军队发动进攻，还有战事。南方认为，既要停战，就不应有例外的地区。唐绍仪接受了伍廷芳的建议，双方通知交战地区的军队一律停战。伍廷芳接受了唐绍仪的主张，在预定的停战期满后继续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11页。



停战七天(1911年12月24日到31日)。

唐伍间的上海会议所讨论的并不只是和战问题。袁世凯在会议开始时通电各省说：“此次派唐绍仪赴上海议和，实为商谈改革政治问题。本大臣向来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即英、德、法、俄、日本，亦均赞成君主而反对共和。故此次上海会议之结果，可预料其决无改为民主之理。”^① 维持清朝皇室而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公开表示的政治主张。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想维持清朝，而是要取而代之。他的代表唐绍仪显然摸透了袁世凯的用心，在会议上表示，不但他自己不反对共和立宪，而且似乎袁世凯也并不反对，只要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唐绍仪还表示，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使清廷易于下台，使袁氏易于转移”^②。

12月20日的会议上，唐绍仪提议，由南北各省，加上内外蒙古、西藏，各推代表，举行“国民大会”，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和平解决”善法。伍廷芳表示同意。这两个官员，尽管各自作为一方的代表，但是他们本来气味相投，当然很容易得到一致的意见。清朝朝廷，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后，12月28日发布谕旨，同意上海会议上两个代表的协议。

但是对于上海会议达成的这个协议，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的当权派以及集合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们中间，引起了疑虑和反感。这是因为：第一，袁世凯虽然再三要求停战，却乘机派兵侵入山西、陕西，这使人们认为他是实行“南和北战”的策略，在和平烟幕下争取时间，加强他在北方的地位，以便进一步用武力对付南

① 《中国革命记》第十三册《记事》栏，时事新报馆1912年1月版，第4页。

②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77、79页。



方。如果再要推举代表召开新的会议，那就使他得到更多的时间。第二，袁世凯公开主张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这就使那些愿意袁世凯来担任民国总统的人们怀疑他是否有此决心。第三，如果还要举行一个新的会议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那就是否定了已经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的地位。

孙中山正在这时候回国。在他到达上海后四天，12月2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会的有十七省代表，每一省投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只有浙江省代表没有投他的票。12月31日，孙中山率领一些随员从上海到南京。次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就是1912年1月1日（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

前面说过，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会议已经酝酿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且他们在企待袁世凯来担任总统，因此，他们只是推举了黎元洪和黄兴做为大元帅、副元帅，暂代临时总统的职权，而这两个人又都没有就职。只是因为袁世凯迟迟不作出最后决定，他们才感到有必要迅速把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这固然是他们要成立中央政府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们认为，成立了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承认”。当时参加革命的所有人，包括真正的革命派，更不用说投机分子了，都把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看做是首要的事。第二，他们又用成立中央政府来向袁世凯示威，但并不是同袁世凯决裂，而是企图迫使他早下决心抛弃清皇朝。因此，他们只愿意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孙中山只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然反对用“临时”的名义，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回避他出任大总统所可能遇到的风险，毅然地到南京就职。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①但是他不能不受到弥漫在革命队伍里的那种并不想彻底进行革命，要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思潮的影响。他的就任大总统誓词中说：“至专制政府既例，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②他又致电北京的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组织临时政府，并且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③

这种情形决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命运。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它所担当的任务不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用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

（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

袁世凯在1911年11月16日组成以他为首的内阁以后，迅速地把清朝的全部政权、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的生父）已不起任何作用，12月6日自请退位。载沣的弟弟载涛是军咨府大臣，又是禁卫军训练大臣，也接着请求解除军职。袁世凯立即以他的亲信徐世昌任军咨府大臣，并且以另一亲信冯国璋来统率禁卫军。残余在皇族手里最后一点军权由此而全部丧失。皇族中有些人如庆亲王奕劻早已同袁世凯相勾结，有些人虽然对袁

① 《总理全集》，近芬书屋1944年版，宣言，第4页。

②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世凯不满和猜忌,但也只能坐看大权为他所独揽。从皇太后(光绪皇帝的妻子,称为隆裕太后)到所有亲贵,都已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依仗他来挽救清朝命运。在北京城里的官员们,有些看到形势不妙,弃职离去,留下来的都依附于袁世凯的周围。

袁世凯虽然拥有当时最有训练、最强的北洋军队,但是在全国几乎三分之二的省份已经宣布对清朝独立的情况下,他显然不可能靠兵力来扑灭革命的火焰。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时,全国除内蒙古、外蒙古和西藏以外,二十二个省中只有直隶、河南、山东、甘肃、东三省和新疆还没有改换清朝的旗帜。但在这些省份里也存在着动乱的因素。

山东在清朝巡抚孙宝琦取消了独立(见第二十四章第四节)以后,袁世凯派去的官员对革命实行严厉的镇压。济南城里凡剪了辫子的男子都有被拘留的危险。但是山东巡抚已不能完整地统治全省。革命党人在胶东发动起义,占领了烟台、登州(蓬莱)、荣成、文登等地,并在烟台成立了军政府。在胶济铁路东段沿线地区,也有人组织革命军,先后占领即墨、高密、安丘、诸城等地。清军在即墨和诸城实行了残酷的杀戮。

袁世凯以重兵控制的河南省也总是不太平。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见第二十四章第五节)后,省城开封学界中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又联络了城里的陆军学校学生等力量,准备发动起义。但因为这时正是黎元洪和袁世凯协议停战十五天的期间,他们没有即时发动(由此可见停战协议是起了麻痹革命的作用的)。由于延期,起义计划被官方察觉。在12月23日这个预定起义日前夕,同盟会会员张锺端等十一人被捕杀,他们大多数是留日学生。死于此役的还有不少不知名的劳动群众。河南的清军在西面同陕西的革命军作战,在南面要保障在汉口方面的清军后



路,并防御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的北伐的革命军。陕西的革命军在得到各地民间的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一度攻入豫西。豫南南阳、邓州一带也有许多民间武装力量,等待时机,跃跃欲试。从鄂西北出发的北伐军在1912年1月间攻入河南,占领了新野、邓州、南阳等地。因此如果战事延长,袁世凯对河南的控制是并没有把握的。

统治甘肃的是效忠于清室的陕甘总督长庚,他只能起牵制陕西的革命军的作用。新疆巡抚袁大化仍站在清朝方面。1912年1月7日同盟会会员冯特民等人在伊犁地区联络了当地的新军发动起义,成立了都督府。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蒙古族)被推为都督。因而在新疆形成了两个政权对立和交战的形势。

革命的潮流也激荡到东北三省。早在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为了给人以独立的假象,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由清朝原来的军政长官主持成立了所谓保安会。这三个省,特别是奉天省的不少地方,革命党人联合当地的绿林力量举行起义,都迅速失败了;只有在辽东半岛的庄河、复县一带,起义队伍站住了脚跟,维持了几个月,为首的是在北洋军中担任过协统的蓝天蔚,他号称关外大都督,但他的势力没有能发展到较大地区。虽然如此,关外清军也穷于应付了。

就在北京近畿和直隶省,也埋伏着危机。一些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天津秘密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1912年1月2日,在冀东的滦州,新军第七十九标以营长王金铭、冯玉祥等为首的下级军官和兵士们宣告起义,并向天津进兵。袁世凯派出较强的兵力阻击围攻,起义军遭到歼灭性的失败。北方革命协会还在通州、天津等地图谋发动起义,但没有实现。这些情形都表明袁世凯的脚底下是很不安定的。

拿革命方面全部力量来和袁世凯相比,优势是在革命方面。就



全国人心向背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已经宣告站在共和方面的十四个省的武装力量,在统一的部署下,目标一致地进行战争,那么,还在清朝统治下的地区内部必然发生更大的动乱,清皇朝连同袁世凯的覆灭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

正因此,袁世凯必须用议和来使革命力量踏步不前,以至向他屈服。

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者极力要阻止革命战争的延长,促成有利于袁世凯的议和。上海的议和会议是在英国人的牵线下开始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实际上的导演。英国在上海的一个商人李德立出面做交战双方的调停者。李德立以传教士身份在中国活动多年,又是英商卜内门公司的代理人,他向来同官场交结,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就住在他的家里。他还出席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议和会议。李德立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说:“战延不和,中国前途,不堪设想。”^①在会议刚开始时,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驻上海领事一起到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人住处,代表他们的政府提出了意见书,意见书中表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不特有危于本国,并有危于外人之利益安宁”,因此,“愿两议和使设法将战争早日消灭”^②。袁世凯之所以能在劣势下取得他所需要的停战,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位回忆录作者说:“辛亥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显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一、不赞成革命,二、同意推翻清廷。”^③这个观察是符合事实的。这就是说,袁世凯要的是推倒清朝由自己取而代之,但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11页。

② 《中国革命记》第十四册,《记事》栏,第4页。

③ 汪彭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操纵时局的几点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29页。



决不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袁世凯向人说：他是有“良心”的人，“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①。（孤儿寡妇指小皇帝和皇太后）但谁也不相信他真是要维护清皇朝。他之所以不像革命阵营方面的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把清皇朝搞掉，是因为他不愿因此在北方造成内部冲突，这种冲突将使他在同南方的力量对比中更处于劣势。他宁愿利用革命形势造成清皇朝不得自动让位的局面，同时又利用清皇朝的存亡问题作为他同革命阵营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阵营方面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推倒清朝，迟迟不成立自己的中央政府而把大总统的宝座留给袁世凯，这显然是极大地鼓舞了袁世凯及其党羽们，使他们相信，再等待一下，革命阵营因为要仰赖袁世凯推倒清皇朝而承认他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此，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宝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而要停战议和，争取一段时间，进行各方面的安排，以实现自己的阴谋。

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成立政府，对于袁世凯是一个打击。袁世凯对此立即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袁世凯打断了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进行的会议。这时他们已经在具体商量如何召开所谓国民会议的问题。袁世凯宣称，唐绍仪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达成了他所不能承认的协议。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唐绍仪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即1912年1月1日，辞去代表之职。

1月3日，袁世凯的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将领联名电告伍廷芳，声称他们坚决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所谓反对共和，当然就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政府。这是袁世凯发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131页。



动他的部属对南京政府的一次示威。

1月5日,面对武昌前线的清朝军队从汉阳撤退,接着又从汉口撤退。袁世凯在攻占汉口、汉阳后,已同武昌的黎元洪心照不宣,和平共处。现在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成立后,他又把军队撤退到离汉口约一百里的孝感,并经过英国人通知武昌方面不得进占汉口、汉阳,黎元洪表示照办。黎元洪虽然口口声声讲北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拢到袁世凯方面去了。袁世凯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做分化工作,以求孤立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汉阳、汉口的撤兵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行动。

袁世凯还指使在徐州的张勋的部队向南发动进攻以威胁南京。但张勋的进攻不但没有收效,而且在对方的反攻之下,他被迫放弃徐州,退到了济南。张勋的部队不属于正牌的北洋军,战斗力比较差。但他的迅速败退也可证明,用战争解决问题是对革命阵营有利的。

因此,袁世凯仍然主要采用战场以外的方法来对付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局势。虽然他使唐绍仪和伍廷芳的会议停止下来,但他并不放弃停战议和的旗帜。他自己出面同伍廷芳通过电报继续进行谈判。首先就达成了从1912年1月1日起继续停战的协议。袁世凯和伍廷芳的来往的公开电报中虽然还在谈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但这不过是迷惑人心的烟幕,其实这时谁都不准备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实质性的谈判,他们是经过密电来进行的。继续留在上海的唐绍仪也和伍廷芳秘密联系。他们之间谈判的实质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结束清皇朝,同时取消南京政府,使一切权力都归于袁世凯。同这种谈判相配合,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和他在革命阵营中的朋友们一致动员了起来,从各方面造成南京政府的困难,迫使它只能走到袁世凯所设计的圈套里去。



当袁世凯确实弄清楚了南京政府不可能独立地有所为的时候，他就反过来对清朝施加压力。1月16日，他以内阁总理的名义提出奏折，竭力申说以现有兵力财力，无法作战，“常此牵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而且“彼众若狂，醉心民主……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他说，作为总理大臣，他无权决定“帝位去留”的问题，只能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①。在提出这个奏折的前三天，他让手下的将领们致书朝廷的亲贵们威胁说：“查亲贵王大臣财货寄顿外国银行者数千百万，若不尽买公债以抒危难，非但财不能保，杀身之祸且在目前。”^②

从1月16日起，袁世凯托称生病，不再自己上朝，而由他的内阁中其他成员代表他和朝廷联系。

皇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他们不愿意立即作出使自己退出统治地位的决定。皇族载泽、溥伟等人慷慨激昂地反对袁世凯，斥骂他是“私通革命的奸细”。虽然他们有的只是慷慨激昂的空谈，但毕竟使问题成为僵局。

1月26日，贵族中的少壮派领袖人物良弼在上朝回家时，被人用炸弹杀死。这次暗杀是在京津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的，由革命青年彭家珍执行。彭家珍因此英勇牺牲。良弼是禁卫军中的协统。禁卫军虽已由冯国璋任总统，但军官和士兵中很多是满族人，良弼在这里面还有相当的影响。袁世凯和良弼之间是有矛盾的。良弼的命运使那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王公贵族更不敢出头坚持维持帝制，反对袁世凯。袁世凯利用革命分子的力量除掉良弼，既是清

^① 尚秉和编纂《辛壬春秋》第二十六，《清室禅政记》，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又是借以恐吓那些王公贵族。对于这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寄生虫，这一着是起了一定效力的。

也就在1月26日，跟着袁世凯的指挥棒转的将领们联名奏请，吁请皇帝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列名在这道奏文中的是二十三天前通电反对共和的原班人马，只除了冯国璋一人，因为他统率禁卫军，不便参与这样的吁请。

到这时，袁世凯的态度是很明确了。清皇朝既已经把袁世凯当做唯一的支柱，除了退位，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了。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虽然已经承认以袁世凯使清皇朝下台为条件，推他为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并不打算来当南京政府的大总统。他要求清皇朝和南京政府一起取消，而由他来组织统一南北的全国政府。早在1月16日，他向朝廷提出“帝位去留”问题的时候，他也经过伍廷芳向南京政府提出，在清皇朝退位的时候，南京政府应该立即解散。1月26日袁世凯的将领们的奏文中提出的主张是：“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府，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① 这就是说，在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的内阁还存在，它将是清皇朝合法的继承人，在这样的安排下，南京政府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也就是说，与清皇朝退位同时，南京政府也应该消灭。袁世凯暂时放弃了他当皇帝的想望（他将在三年以后重新谋求实现这个想望），但他要以清皇朝的继承人的身份，而不是靠南方的推戴，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

对此，南京政府表示愤慨。1月27日，孙中山电致各国公使说：“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174页。



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①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制定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政府的成立，就是依据这个组织大纲。这个组织大纲中只规定有大总统，没有副总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三天，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作出了添设临时副总统的决定，把在武昌的黎元洪选做临时副总统。

按照这个组织大纲，临时政府在大总统之下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个部，其人选都由大总统提出。孙中山在组织政府时，为了使各派势力都得到满足，扩大为九部。九个总长中只有两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教育总长蔡元培。担任外交总长的王宠惠是美国耶鲁大学 1905 年的毕业生，他在欧洲时虽曾同孙中山接近，参加了同盟会，但他的政治倾向是属于温和的立宪派的。此外的六个总长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江苏的立宪派大资本家张謇被任为实业总长，浙江的立宪派绅士汤寿潜被任为交通总长。孙中山原来想让同盟会的宋教仁当内务总长，遭到人们反对，结果由旧官僚程德全担任。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锺瑛、司法总长伍廷芳也都是原来清朝的官僚。这些总长，还有次长的名单都在 1 月 3 日确定了下来。

黎元洪欣然接受了副总统的职位，但并不离开湖北的地盘而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 1936 年版，第 19—20 页。



到南京来。那些担任总长的社会名流和旧官僚也一概不来上任。南京临时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们是不愿来分担艰巨的。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是陆军总长黄兴，他还兼任参谋总长。参加南京政府工作的各部次长和其他职员，固然有些是猎取官职的投机政客，但多数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年轻人。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规定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这样的参议院在1月28日成立。这样，这个临时政府的机构就都齐备了。

在1912年初到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担任工作的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主要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①就这个政府的领导者和参加工作的多数人员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里还需要补充说，在这个政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色彩并不多。

在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部分。革命一爆发，立宪派纷纷放弃他们的君主立宪的旗号而主张共和，表示参加革命。但是立宪派还是立宪派，他们的主张是绝对避免用革命的方法，而要用改良主义的方法，用向地主买办阶级妥协迁就的方法来实现共和。立宪派的这种主张在以为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或至少已经在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得到了同情的响应。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差别好像已经不再存在，许多革命派分子已经不认为自己同立宪派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形式上是立宪派顺应了革命潮流，实际上却是革命派在思想与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为立宪派所同化。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以资产阶级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6页。



为主体的政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种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

这时的同盟会,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吴玉章指出:“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①

有些同盟会会员跟在立宪派后面,在同样的乐器上奏同一曲调。例如1911年冬在上海,以伍廷芳、张謇为首发表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②,列名为发起人的有些是当时有名的同盟会会员(其中包括已在暗中投降了袁世凯的汪精卫)。这个意见书虽然表示主张“共和政体”,而且主张“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担心民主自由空气盛行,将难以“恢复秩序”,意见书说:“一紊不复,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意见书又认为战争延长,必然招致列强干涉,“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惟恐革命过头,认为革命如不速胜必有大祸的说法,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谋求早日结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现。

有些原来的同盟会会员另组政党。章太炎在1912年初以一部分光复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久,这个组织同立宪派的名流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和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联合成立“统一党”。湖北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孙武、张振武等人则拥戴黎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45页。

^② 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第76—82页。



元洪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的人，黎元洪非常赞成这个说法，还发展这个说法而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所组织的当然不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他们的党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党。

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过一篇宣言^①。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革命党人）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决不会“傲睨群伦，大执政权，而家天下”。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②，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良恶无从而辨，薰莠同于一器”的状况。它认为，现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所以“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结纳”、“罗致”各方面的力量。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1912年2月间，同盟会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篇，第491—493页。

② 同上书，第一册，第79—81页。



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会章,进行选举。孙中山任总理,而被推为协理的二人,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却是自己根本没有表示要参加而且已另外组党的黎元洪。当时存在着南京和武汉对立的形势,所以同盟会觉得不但要给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地位,还要把他拉到党内来,似乎更好一些。这次改组并没有使同盟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和坚强一点,就是它的领导机构——同盟会本部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①但是也应该指出,当时在还处于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在南京和已脱离清朝统治的各省,都有不少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有志之士,他们怀抱着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善良愿望,进行着斗争和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对于这些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并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他们眼看着现实和愿望不相符合,或者逐渐消沉下去,或者终于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至于在劳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如何发动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同盟会在它的宣言和章程中更是丝毫也没有考虑到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它面临的许多困难,处于极其软弱的地位。

孙中山回国之初,虽然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但是他在就任大总统时只能承认议和的事实。1月2日他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②。在袁世凯让唐绍仪辞职后,南京政府仍承认伍廷芳为议和

^①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84页。

^② 《总理全集》,文电,第26页。



全权代表。袁世凯和伍廷芳通过电报商定继续停战，南京政府也表示承认。

南京政府之所以不能不承认停战议和，是因为它没有作战的能力。各省的军队都在各省的当权派手里。虽然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军队由于本省内部矛盾而跑出省来，以北伐的名义来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索要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是一个空头司令。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六路进军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会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之后，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①。议和局面既然始终没有破裂，这个看起来很宏伟的计划也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和议破裂，能否实行这个计划呢？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的回忆录中说：“黎元洪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②

但是湖北的黎元洪、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

①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第12页。

②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201页。



荣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辱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

南京政府一经成立，就不得不呼吁说：“中央财政匮乏已极”^①。它不可能从各省得到财政上的任何支援。当时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②。在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好向外国借债。但外国的银行并不认为南京政府有借债的资格。为了供应军队的粮饷（这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出），陆军总长黄兴“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③。经过上海的资本家，南京政府才向日本大仓洋行借到了二百五十万元。到了1912年2月底（这时清朝皇帝已经退位，南京政府即将结束），袁世凯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得到了五百万两的借款，而将其中的二百万两交给南京政府，作为维持费用。南京政府为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只能求救于张謇等人，甚至弄到只好分润袁世凯从外国借来的钱这种地步，这样，它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南京政府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称呼，还宣布学校中一律废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

①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第12页。

② 南京政府在一月八日发行一万万元的“军需公债”，所得无几。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198页。



的科目,小学中废除“读经科”,又发出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中说:“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①。承认雇佣关系而废除主奴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另一通告有关“人权”的命令中说:“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蹙斯民,而张其毒焰,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情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癯发者及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②解放这几种人,承认他们享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当然是种进步,但以为这样就算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平等理想,这不过表现了这些文件的起草者对于在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罢了。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命令中有关农村的只有一条:“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③。这道命令,如同其他有些命令一样,并没有能实行,但即使实行,也并不能触动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革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历史大大地跨前了一步。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说来,没有能把千百万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积极性发动起来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这件事是太平天国在有限的程度内做到了的。

①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七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第216页。

②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四十一号,同上书,第302页。

③ 同上书,第308页。



（四）清皇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由此不但结束了清皇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这是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这个胜利中包含着失败。固然，没有革命浪潮的冲击，清皇朝不可能下台，但是，革命阵营并没有表现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推翻。操纵着整个局势的袁世凯，在革命方面作出重大妥协让步的条件下，迫使清皇朝自动宣布退位。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早在汉口开会的时候，已经提出了“推倒满洲政府”而“礼遇旧皇室”的原则。以后在伍廷芳和唐绍仪的谈判中，具体谈到了在清朝退位后如何“礼遇”皇室的问题。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袁世凯又就这问题同伍廷芳进行洽商。终于，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袁世凯提出的方案决定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其内容主要是，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并仍住在宫廷内；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而且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特别加以保护。此外，还规定了对皇族的待遇，他们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他们的私产一律得到保护。

由于这种荒谬的条件，清朝的统治虽然结束了，但在紫禁城里，仍然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小朝廷，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以皇帝的名义封官授爵，受着一小撮怀抱着复辟清朝的愿望的旧官僚的拥戴。后来，在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把这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后，这个小朝廷还继续存在于天津日本租界内。长期间，它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野心家制造中国变乱的一个工具。1932年，日本帝国



主义把溥仪搬到了长春，建立了所谓“满洲国”。

袁世凯所依靠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是本国的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必须使他们相信，虽然他表示赞成共和，但他是清皇朝的继承者，而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所以他要如此“好心”地为清朝皇帝和皇族争取到这种优待条件。南方的革命阵营既然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推翻清皇朝而要借助于袁世凯，他们就不能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

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伍廷芳、黎元洪之流都极力拥戴袁世凯，他们完全赞成优待清室的条件。黎元洪为此致电伍廷芳说：“优待清室条件，于共和主义，毫无妨碍，敝处极表同情。即令各省反对，亦不过外交之后劲，非与公为难也”^①。由于这种优待条件明显地同革命宗旨相违背，当时有不少反对的呼声。在黎元洪看来，这些呼声并不是真反对，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对于各省的当权派所发出的反对呼声，确是可以这样看的。

革命阵营的妥协、让步，还不只是对清室的优待。更大的妥协、让步，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愿在取消清皇朝以后也取消了南京政府。

前面说过，袁世凯在开始胁迫清皇朝退位的时候，已经通过伍廷芳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在清帝退位后，立即解散的要求。对于这种要求，只有孙中山进行了抗拒。在弥漫着妥协空气的革命阵营中，孙中山处于孤立的地位，因而他的抗拒极为软弱无力。南京政府毕竟还是解散了，不过总算不是像袁世凯所要求的那样立即解散。它在清帝退位后还维持了五十多天。

孙中山在1月18日到20日间，连续有几个电报给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方面提出如下三点：“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314页。



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①在这以前，孙中山表示过，在袁世凯使清帝退位后，他立即辞职，那么为什么这时又提出这三条呢？他向伍廷芳解释说，“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能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日举袁。嗣后就历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组织一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自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之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②

孙中山的三条是针对袁世凯而设的防线，但他的防线多么不中用！既然革命阵营是要依靠袁世凯的力量来结束清皇朝，那么，怎么能指望袁世凯不从清皇朝手里取得政权呢？又有什么办法使袁世凯不在北方成立与南京相对立的政权呢？孙中山为了保证南京政府成为统一全国的政权，所能设想的一着棋，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他重申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诺言，但他把自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时候推迟到“各国承认”民国政府之后。他以为，一旦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南京政府是统一全国的政权，袁世凯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来当民国的大总统而不能再有什么别的打算了。

袁世凯和北方、南方一切拥护他的人们，都没有把孙中山的三条放在眼里。

以清朝皇太后、皇帝名义发布的退位诏书，是袁世凯委托在上

① 孙中山1912年1月20日致伍廷芳电。见《总理全集》，文电，第10页。

② 孙中山1912年1月22日致伍廷芳电。见《总理全集》，文电，第11页。



海的张謇起草的。这个文件中说：“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①。袁世凯立即以这个退位诏书为根据宣布自己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将他的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脑。他发出布告说：“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②

这显然完全违反了孙中山提出上述三条的前二个条件。恰恰是清帝退位时把政权“私授”给袁世凯，恰恰是在北京出现了一个继承清政府并且企图吞并南京政府的“临时政府”。孙中山只好委婉地向袁世凯提出异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③袁世凯答辩说，他在北方“维持秩序”，并不是因为清帝的委托，“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无足再论”^④。这是说，如果接受清帝的委托不算合法，那么还有北方各省军队的推戴，我袁世凯当大总统并不一定要靠南京的选举。

在革命阵营中的袁世凯的朋友们响起了一片歌颂袁世凯的噪音，似乎靠了这个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革命才终于取得了胜利。

① 尚秉和纂辑《辛壬春秋》第一上，《辛壬政纪》，第16页。又见《中国革命记》第二十七册。

②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187—188页。

③ 《总理全集》，文电，第28页。

④ 袁世凯2月15日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电。《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第292页。



他们所制造出来的空气迫使孙中山实践立即辞职让位的诺言。汪精卫是伍廷芳进行和议的一个主要助手。他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是舍不得总统吗？”他邀约了一些同盟会会员发表宣言提出所谓“五不”主义，“五不”的第一条就是“不做官”，借以攻击孙中山：如果孙中山不立即辞职，那就是贪恋做官^①！

2月14日，孙中山为形势所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又被推为副总统。参议院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②。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两次呼吁帝国主义列强予以“承认”，列强都置之不理。孙中山不得不放弃了他曾提出过的要等各国承认南京政府以后才辞职的主张，但他在2月14日辞职时申明了三条办法：“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③。按照这三条办法，孙中山把他的“辞职”和“解职”分成两件事。虽然他辞职了，但是并没有“解职”，在新选出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还没有到南京就职以前，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存在着。

袁世凯在南京的参议院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在对内对外文告中自称“新举临时大总统”，并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筹备处。南京政府虽然宣布举行南北统一的庆祝，但是事实上，南京

① 吴玉章、李书城的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18、200页。

② 《辛壬春秋》第一下，第3页。

③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七号。见《近代史资料》总二十五号，第132页。



和北京各自存在着一个临时政府，南京政府并没有统一全国。而且就实际情形说，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中，南京政府也不能统一行使政权。孙中山虽然还没有“解职”，却已是辞了职的临时大总统，他的政府在等待着袁世凯来接受。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皇朝的政权，北方各省的军队在他控制之下，一方面又为革命阵营推戴为临时大总统。全部优势到了袁世凯手里。

按照孙中山辞职时的三个附带条件，民国的首都应该设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以为调虎离山，使袁世凯脱离北方的实力根据地，就不至于为害于民国了。他显然过高估计了选择首都所在地的意义。当革命力量不断地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妥协的时候，中央政府无论设在哪里，其实都改变不了形势。但是这样的条件，袁世凯也不接受。他拒绝到南京来做临时大总统。

南京专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组成代表团到北京。他们又让了一大步，不谈首都问题，而只是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盛大地欢迎专使，“愚谈”南下问题，一面密令他的亲信曹錕的部队在北京哗变，劫掠商民，造成混乱，借以证明非由他坐镇北京不足以稳定北方局势。天津、保定也接着发生兵变。外国帝国主义者立刻配合行动，京津一带列强驻军纷纷出动，日本军队且在秦皇岛登陆，形势好像只要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内忧外患”马上会接踵到来。

革命阵营中的袁世凯的朋友们齐声为袁世凯帮腔。黎元洪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时曾主张南京政府和袁世凯“各派代表到鄂，共同组织正式共和政府”^①，这实际上是主张南京政府和清皇朝同

^① 《黎副总统致伍廷芳电》，见《中国革命记》第二十七册《记事》栏，第14页。



时消灭，并乘机抬高他自己的地位。他的这种意见既未得到南京方面的同意，也不为袁世凯所欣赏。孙中山辞职后，他不再想以武昌做中心，而完全唱袁世凯要他唱的调子了。他在首都应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胜于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① 这就是说，如果在首都问题上南京政府不迁就袁世凯的主张，中国一定会亡国！

南京政府再一次让步，承认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6日，南京方面提出的办法是，袁世凯致电南京参议院宣誓就职，并且把拟派的国务总理和国务员的名单电告参议院征求同意，然后由国务总理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这时孙中山就解职。对于这种办法，袁世凯当然不反对。

袁世凯身上穿的大总统的礼服，应该由南京政府授予，而不应该由退位的清朝皇帝赐给他。——南京政府所争取到的不过是这一点。

2月14日孙中山辞职时所说三条办法中第三条提到“临时政府约法”，说得很含糊，因为那时约法尚未制定。到了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同毛泽东所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② 这个约法被认为是在正式宪法制定以前的临时性的宪法。孙中山以为有了这一纸约法，就

①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第1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8页。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8页。



能控制住袁世凯，保证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又是一个空想。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须得到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的同意。3月13日袁世凯任命他的老朋友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唐绍仪到南京提出了各部总长后，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大总统之职。

从革命中产生的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它的三个月的短促生命。在这三个月中，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的对立。4月2日，参议院按照袁世凯的意愿决定迁往北京。这就最后在形式上也表明了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袁世凯。

（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

在南京的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解职，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辛亥革命就宣告结束了。帝制的中国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是，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十二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的教训说：“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



其致失败，又何待言！”^①

站在袁世凯背后的是帝国主义。向袁世凯谋妥协也就是向帝国主义谋妥协，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1月5日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对外的文告，其中说：“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这以下历举了八条，前三条是：“（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则否。（二）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这个文告最后说：“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政府未之能用者也。”^②

这个文件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主观上是想使中国独立，能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他们的革命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但是他们却无条件地把帝国主义者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卖身契一律承认了下来。对于刚成立的革命政府说来，立即做到废除这一切固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以为，既然他们保证不损害帝国主义在中国

^① 《孙中山选集》，第587页。

^② 《总理全集》，文电，第18—19页。亦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第22—23页。



的一切既得权益，帝国主义列强就会来支持他们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个幻想。这种幻想迅速地在事实面前破灭了。南京政府不但没有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他们所企望得到的承认，而且经常感受到列强武装干涉的阴影。

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是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妥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南北和谈过程中，袁世凯系统的各地军阀官僚，左一个电报、右一个宣言，都说国事危急，外国干涉的危险迫在眼前，以此来胁迫南方让步。革命阵营中的许多人也竭力渲染这种恐怖。例如由伍廷芳、张謇等和一些同盟会员组成的共和统一会发表的意见书说：“今日列国之对于（革命）军兴，尚未干涉也，固也。今不干涉之果否可恃，可否持久，智者能测而知之。……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① 南京政府派到北京请袁世凯南下的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受到了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恐吓，电告南京政府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将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② 这就是说：如果一定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难免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因此只能向袁世凯妥协。

南京政府不是靠自己在国内站稳脚跟来使得外国不能不承认，而是想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来提高自己在同北方政府谈判中的地位。凭这种姿态，它不可能得到它所渴望得到的承认。在武昌起义后，列强虽然一般地停止了对清朝政府的贷款，但仍应清朝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第78页。

^②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第240页。



政府的要求而给以少量的贷款。同时，南京政府想要向外国借款来解决它的财政困难，却遭到了各国的拒绝。南京政府不能依靠广大人民自力更生，结果帝国主义就能够用不承认的政策来把它扼杀。

在清皇朝宣布退位，袁世凯接收了北京政府以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开始同北京政府进行数额巨大的借款谈判，并且在总的协议没有达成以前，先行垫支部分的款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之所以能并吞南京政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各国承认，袁世凯的政府得到了。1913年5月2日，美国首先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到了这一年10月6日，国会正式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时候，其他列强也宣布承认。他们不愿意承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而只愿意承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用意是很明显的。

俄国、日本、英国在承认袁世凯政府时，都附有意在分裂中国领土、加强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势力的条件。

利用辛亥革命的形势，沙皇俄国唆使外蒙古的封建领主脱离中国宣告独立。1912年到1913年间，俄国政府同外蒙古擅自订立了一系列的条约，实际上使外蒙古完全落到俄国控制下。对于这种公然分裂中国的行动，袁世凯政府不得不提出抗议。俄国政府拒绝废除它同外蒙古订立的条约。它虽然表示承认外蒙古是中国完整领土的一部分，但要求袁世凯承认外蒙古“自治”。这实际上是俄国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交换条件。

日本利用时机和俄国协力共同加强它们在东北三省的地位，并且和俄国划分在内外蒙古的势力范围。1912年7月日俄密约中规定日本在内蒙古的东部有特殊利益。1913年10月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权”的要求，这五条铁路中



有三条铁路都是以伸展势力到内蒙古东部为目的。袁世凯政府为了取得日本的承认，立即接受了这个要求。

英国在辛亥革命时，正在阴谋控制中国的西藏。1912年8月间，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实际上是使西藏逐步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要求，并且说，中英间应为此订立协定，“然后英国始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①。袁世凯政府既不敢公开发弃对西藏的主权，又不敢得罪英国，对这问题只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②。

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时所发宣言书中说：“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③

袁世凯以这种姿态表明了他的“民国政府”是清朝政府的卖国传统的继承者，帝国主义列强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应该指出，在辛亥革命时，帝国主义列强不要孙中山而要袁世凯，这点是值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为骄傲的。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力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因而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虽然他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归根到底，他们所想使中国走的路是和帝国主义者愿望相反的。

①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第101页。

② 后来在1913年10月—1914年6月，袁世凯政府派人同英国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

③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新中国图书局1914年版，第8页。



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虽然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却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通过辛亥革命这一场剧烈的阵痛，没有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是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地度过了。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①。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具有他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弱点的原故，是由于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和坚强的领导，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原故。人民，首先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失败中受到了教育。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667页。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 反袁世凯的斗争

(一) 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所篡夺,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的。

在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有些表面现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信自己并没有失败:第一,袁世凯不得不表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的权力主要不在总统手里而在内阁手里。第二,袁世凯任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一个多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僚,他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唐绍仪的内阁的十个部长中有四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在由南京搬到北京去的临时参议院(按照临时约法,它具有议会的性质)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一百三十个议员



中,同盟会议员有四十多人)。此外,当时在经过革命风浪的各省中,当权的实力派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

这些表面现象似乎可以表明,袁世凯当大总统无碍于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他解职后不久,1912年4月间发表演讲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①他又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②。孙中山当时认为,他此后的任务是从事社会事业,振兴实业。

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袁世凯正在一步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临时约法”、“责任内阁”、“临时参议院”都不能对他起什么限制作用。在参议院议员和各省的当权派中的同盟会会员,有许多其实并不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同盟会会员主管的司法、农林、工商、教育这四个部,在当时说来,都不过是闲散衙门,重要的关键性的部,如外交、内务、陆军、海军等部则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中。而且唐绍仪的内阁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迫下台了。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加入同盟会也是袁世凯所同意的,但是因为他要求行使责任内阁的权力,不为袁世凯所容。在他辞职时,同盟会的四个阁员也同时辞职。6月底,袁世凯任命他所更信得过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到了9月里,内阁总理又改由原任内务总长的赵秉钧(他是袁世凯的心腹)担任。对

① 《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5页。

② 《兴发实业为救贫良药》(孙中山民国元年四月十七日在上海实业联合会欢迎会演讲大意);见《总理全集》,演讲乙,第1页。



于内阁的这种变动，同盟会的领袖们仍没有感到不安。

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宋教仁，特别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他主张改组同盟会，扩大其组织，以求能在将要成立的正式国会中占多数议席，从而能自己组成内阁。他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助。1912年8月间，同盟会改组成为国民党。国民党仍奉孙中山为领袖，但以宋教仁为核心人物。

当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席位数和同盟会大体相等的一个党叫做共和党。它以黎元洪为领袖，它的骨干分子是张謇、程德全等人。这是个拥护袁世凯而反对同盟会的党。此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和其他名义的一些政团，其组成分子也大多是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时，把统一共和党和几个小政团拉了进来。吴玉章的回忆录中指出：宋教仁“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①。关于当时国民党滥收党员的情形，一个回忆录作者说：“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②。袁世凯的赵秉钧内阁的阁员中，除陆军、海军、外交三总长外，都挂

①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98页。

②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88页。



名于国民党，因而这个内阁竟被称为“国民党内阁”。这样，同盟会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得到成功时，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倒退为以争取议会席位为唯一宗旨的、无原则的政党。

由于当时正处于革命热潮之后，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拉拢孙中山和黄兴这样有声望的革命领袖来给自己装点门面。1912年8月下旬，他先把孙中山请到北京，待以上宾之礼，共商国家大计。经过会谈，袁世凯使孙中山完全相信他可以做很好的民国元首，并且完全同意他所提出的八条“内政大纲”，那其实一点也没有民主气息，完全是为建立袁家天下打算的。孙中山表示希望袁做十年总统，而他自己则将全力从事铁路建设。袁世凯给孙中山以全国铁路总办的名义。黄兴也被邀请到北京。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黄兴负责南京留守府，这个机构的任务主要是处理集合在南京一带的十几万各省军队。袁世凯利用他遣散了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他到北京主要是谈了建立政党内阁的主张。孙中山、黄兴在和袁世凯会谈后都仍回到上海。袁世凯表面上对孙、黄十分推崇，暗中却派人编造孙、黄的所谓“阴私”，印成小册子，在各处散发，对他们进行造谣诋毁^①。孙中山在到北京前以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为号召，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袁世凯派人在北京也成立了个铁路协会相对抗。不久，北京的铁路协会竟要求解散上海的铁道协会，并终于以两个协会合并的名义来取消了铁道协会^②。

孙中山的这个对手是在军阀官僚专制统治集团中翻过好些斤斗而爬上来的角色。这个集团虽然极端腐朽落后，但是它积累下了狡诈、狠毒，耍阴谋、弄权术的丰富经验，用来对付本身具有很大弱

①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89页。

②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同上书，第165页。



点而且很少政治经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时还能奏效。读一下孙中山当时在同袁世凯会见后的言论，可见他是多么深地落进了袁世凯设立的陷阱。他在北京演讲说：“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划者非他，即建筑铁路问题是也。”^①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演讲中更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就是袁世凯——引者），并不谬误”^②。

对于国民党的知名人物，可以收买的，袁世凯就进行收买。汪精卫就是一贯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特别费”的。被“软化”的还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如刘揆一。刘早在华兴会时是黄兴的得力助手，又是同盟会总部在东京时的重要干部。在陆征祥和赵秉钧的内阁中他都担任工商部总长^③。赵秉钧内阁被称为国民党内阁，其实并不是袁世凯的人投靠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人被袁世凯拉过去了。

袁世凯对于他所收买不了而又容不下的人，采取卑鄙的暴力来对付。1912年底，各省开始进行正式国会的议员的选举。经过用各种方法竞争，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这时在湖南参

① 孙中山民国元年九月二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乙，第4页。

② 孙中山民国元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讲。同上书，演讲丙，第3页。

③ 刘揆一（1878—1950）在1913年7月失去袁世凯政府的职位，转而采取反袁的立场，但也没有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34年他发表文章，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致为国民党当局不满。从此他隐居湖南乡间。全国解放后，他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



加竞选的宋教仁非常得意，他认为大局已定，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的内阁。他从湖南转道上海、南京回北京，一路上宣传他的政党内阁的主张。1913年3月20日他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重伤致死。这个三十二岁的有才干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由于迷信议会选举死于袁世凯的毒手。虽然很快就发现了确实证据，证明暗杀的主使人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但是整个国民党已笼罩在妥协的空气下，只是采取“静待法律解决”的办法。孙中山毕竟是个敢于和反动势力相对抗的革命家，宋教仁被杀事件立即使他开始清醒过来，他主张组织兵力，声讨袁世凯。黄兴和其他领袖们不赞成这个主张。

各省当权的实力派虽然有不少在名义上和同盟会、国民党有关系，但他们的统治和旧军阀、旧官僚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不少人还为袁世凯所收买，例如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翔^①都已跟着袁世凯走了。南方的有几个省中，还有些不是完全顺从袁世凯的国民党的武力。在刺杀宋教仁的同时，袁世凯正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团进行大借款谈判。1913年4月间，大借款成立。袁世凯有了财政上的后盾，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军事上也作好了布置，于是在6月间，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和安徽的柏文蔚），并且出动军队南下。只是到了这时，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

^① 张凤翔(1881—1958)，他在1914年为袁世凯调离陕西，到北京后仍依附于袁世凯。1916年袁死后，他多年间没有参与军阀政治，并有过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活动。他的后半生表现进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并在1946—1949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全国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国民党人所说的“二次革命”。

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反袁军事行动，以江西和南京为中心，所以又称为“赣宁之役”。7月12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炮台宣告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虽都有国民党的力量表示响应，但多半是虚张声势。在袁世凯的南下军队压力下，江西、南京的反袁武力迅速瓦解，响应的各省也自动收场。不到两个月，赣宁之役就以袁世凯的全胜而结束了。袁世凯派他的亲信部队进驻南京、湖北、广东，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原来在国民党军人和其他派系控制下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

经过辛亥革命后一年半的时间，国民党已经使自己的形象褪去了革命的色彩。这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罪恶尚未被全国人民所认识。因此，赣宁之役不过是少数国民党人的单纯军事行动，没有能成为一次群众性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是一系列的反袁世凯的斗争的开始，就这点说，它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袁世凯露出他的真面目来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了。5月下旬他已经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①7月间他又发出布告说：“暴徒擅自宣布独立，破坏民国统一。政府依约法上之统治权，有以兵力平定变乱责任”^②。原来是想用来束缚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现在却成了他用以镇压革命的合法依据。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成为被通缉的“暴徒”。他们不得不离开了由他们的革命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

① 《时报》民国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载。据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页。

② 马震东，《袁氏当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28页。



再一次出国流亡。当时的一个流亡者在许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说：“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以求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①

在赣宁之役发生时，国会已经开幕。留在北京的国民党的议员们向袁世凯表示，孙中山、黄兴等不过是国民党的名义上的领袖，这次江西、南京的发难，是他们个人的行动，“与本党无关”^②。袁世凯又用收买分化的方法使不少国民党议员退出国民党，另组小党派，这样，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也就失去了。

7月底，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内阁总理。这个内阁中外交、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几个部仍由袁世凯的亲信把持，其余几个部的总长都是进步党人，其中有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也是进步党人。

所谓进步党，是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为了压倒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在1913年5月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个党合并而成的。共和党，前面已经说过，是在临时参议会中和同盟会对抗的一个党。统一党是由共和党分裂出来，以章太炎为领袖的一个小党。而民主党则是梁启超在1912年10月从日本回国后，纠合一些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组成的。

梁启超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坚持反对革命，但在辛亥革命推翻

^①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95—496页。

^② 《袁氏当国史》，第234页。



了清皇朝后，他回到国内，却自认为有权同革命派分庭抗礼。他说：“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①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是从戊戌变法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结果，因此，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未尝不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极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固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有关，而立宪派在“参加”革命中所起的坏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点，梁启超是不愿意承认的。

梁启超的回国使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们有了个带头的人。在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中很活跃的汤化龙、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等人就推选他为领袖组成了民主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统一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中，民主党人占据重要的位置。

以梁启超为政治代表人物的上层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既不愿意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也没有能力独立取得政权。他们宁愿依附于袁世凯，以为这是他们爬上政权的捷径。果然，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物被认为暴民、叛党而流亡出国的时候，梁启超、熊希龄等人被袁世凯邀请入内阁，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但是袁世凯所要建立的是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代表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独裁政治。他不但需要“激烈”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需要“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赣宁之役以后不久，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的指挥棒下，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

^①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第4—5页。



这个国会中还有一部分议员不愿意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写票，因此，在一天中连续进行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得到了法定当选的票数。黎元洪仍被选为副总统。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国会并不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既然它已经使他“合法”地成为正式的大总统，它的作用已经完毕了。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把隶属于国民党的议员资格全部取消，以至国会无法召开会议。熊希龄的内阁接着也就只好下台（1914年2月12日）。进步党的梁启超等人在被袁世凯利用了一下以后终于也遭到了排斥。

（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袁世凯所解散的国会，是根据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在既已解散这个国会之后，袁世凯就来着手废除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原来被一些人认为具有“紧箍咒”的作用，是能够用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的。

在解散国会以前，袁世凯已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咨询机关”。按照他的意旨，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法会议”来制定一个合于他需要的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成果的一个标志，为了把它废除，袁世凯采取了看起来似乎很郑重的手续。

袁世凯在1914年3月召开了他的约法会议，并且为这个会议规定了“约法增修大纲”七条^①，这七条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大权绝对归于大总统”，“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也都属于大总统，都不需要经过议会，而且大总统有权不经过议会“发布与法律

^① 《袁氏当国史》，第354—355页。



同等效力之政令”，有权“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这就是取消了议会制；不设国务总理，而使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这就是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关于人民的权利，其褫夺恢复等，得由大总统自由行之”，这就是根本否定了民主的概念。按照这些原则制定的约法在1914年5月公布。这个约法赋予袁世凯的个人独裁以“合法性”，只不过还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名义罢了。

袁世凯的约法规定要成立一个类似议会的“立法院”（但它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和一个叫做“参议院”的咨询机关。实际上他只成立了参议院，其组成人员是些原来清朝的官员和各地的地主绅士，也有一些进步党人和变节的国民党人。这个参议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制定了一个“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月1日公布）^①。按照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任。选举大总统是由参议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来进行，而且参议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再有一项奇特的规定是，继任大总统的候选名单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匱石室”中；到选举时，打开石室，取出金简，人们只能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就认为，袁世凯不但有了终身任总统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因而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到这时候，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和皇帝同样的权力，所差的只是个名义。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还伪造了全国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民意”。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像历代皇帝颁布年号一样，规定次年

^① 《袁氏当国史》，第384—387页。



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政权，在国内依靠的是封建主义的旧势力，加上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彰德一带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他手下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等人都是占地数万亩的大地主。他的官员的班底是原来清朝的官僚。其中主要又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老官僚派，他们在清朝做过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一类大官。徐世昌是这一派系的代表，此人曾当过军机大臣、协办总理大臣，在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朝，不做民国的官，但到了1914年临时约法被废除后，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另一派系被称为新官僚派，他们在清朝时的官职较低，入民国后渐据显要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梁士诒，清末是邮传部的官员，由袁世凯任为总统府秘书长，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参与铁道事务，因而同外国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他是称为“交通系”的财阀的头子。比起老官僚派，新官僚派更多带有买办性。

袁世凯力求以武力实现全国的统一。以北洋六镇为基础，大肆扩充他的嫡系力量。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各省落到了北洋军人手里。对于南方的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袁世凯通过收买和武力威胁，使他们表示服从和效忠。这样，在形式上他好像已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不仅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而且他的嫡系将领们在各自占得一块地盘后，也互相倾轧，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袁世凯统治下，开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的统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设想，经过革命，建立民国后，资本主义就能发展起来，国家就能走上富裕的道路。事实恰恰相反，在袁世凯和其他大小军阀统治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显出了萎缩的



趋势。1914年张謇任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提出“棉铁政策”，主张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袁世凯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主要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和清朝相比，有过之无不及。1912年4月参议院首次在北京开会，他发表宣言说：“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①。到了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向各国公使外交团致词说：“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②。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唯一基础”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因此，不仅遵守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成例”，不仅已办的事全部承认，而且未办的事也要快办。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巨额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经过一些周折。日本、俄国参加了进来，美国则中途退出，所以达成借款时，四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这笔借款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规定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六千七百万英镑。借款合同规定，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并监督贷款之使用。这完全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袁世凯实际得到的数目是借款总数的84%，即二千一百万英镑，其中一半以上用以支付各国到期的借款、赔款，还要以二百万英镑作为“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的赔偿”，剩下的约八百万英镑，袁政府用来做军费和行政费用。靠了这笔借款，袁世凯才能在1913年以压倒优势战胜国民党势力。

1914年欧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36年上海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义列强分成了两个营垒，互相厮杀，这使袁世凯政府感到很为难。8月6日它宣告中立。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而同英国有关盟关系的日本随时可能参加战争，乘机夺取胶州湾。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国内舆论界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协商，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以免为日本夺去。德国由于无力顾及远东，也曾表示可以这样做。但是日本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而站到德国一边。在这种威胁下，袁政府不敢采取任何行动。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日军从相距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以二万多人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把沿途的城镇和邮电机关全部占领，征发物资，役使人民，如同进入敌国一样。袁世凯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却自行宣布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把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地区”。日军行动甚至超过了这个所谓交战地区。11月7日，日军才打败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占领青岛；在这以前，日军已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等处，并沿铁路线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要从德国手里夺取胶州湾，而且是要控制胶济铁路全线以至整个山东省。

袁世凯一向主要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密切。由于西方列强都卷入欧洲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好机会。它在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后，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这些要求当面交给袁世凯。这些要求列为二十一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四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部分七条，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部分两条，要把已有日本资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



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部分一条，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部分七条，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等等。

对于日本方面无端提出的类似于对战败国的条件，袁世凯政府竟派出代表同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它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曹汝霖向参议院报告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惟苦请日使速行开议而已。”^①在谈判中，袁世凯方面做了许多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这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有第五部分中的有几条除外，但也承认“容日后协商”）。

袁世凯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说明他的屈服是无可奈何的，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对于商、学、工各界中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袁世凯严令禁止。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使中国更加陷于贫弱和混乱。他在山东问题上，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他的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接受了二十一条后，他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而且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也不怕国内有人出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及其党

^① 《袁氏当国史》，第465页。



羽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的潮流,也过低估计了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在中国人民中形成的爱国情绪和憎恶卖国贼的情绪。公然宣布实行帝制,不但不能增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三)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人在 1913 年反袁世凯斗争失败,流亡出国时,已有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经验。这次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的大胜利,却在袁世凯手下遭到了惨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决定下一步怎样做,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

在流亡的国民党人中,思想是很混乱的。当时的情形是:“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①后来,孙中山还追述说,那时亡命于日本的人,“大都垂头丧气”,“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彼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已是成功,据有十几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②

黄兴是领导者中对革命表示沮丧的一个人。孙中山这时在给黄兴的信上批评他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际,正我辈

① 《中华革命党宣言》(1914年7月)。《总理全集》,宣言,第18页。

②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的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丙,第32页。



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①

孙中山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情绪。当时他“再三苦劝各同志说：……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家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家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②

本着他的革命信念，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开成立会）。从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方案中，可以看到，他是认真考虑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变为国民党一败涂地的这段经验，企图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利于再次兴起反袁世凯的斗争。但是究竟如何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却不能认为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的问题。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一个通告向党员们说明“国民党失败之真相，新党再造之苦心”，其中说：“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指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引者）以来，即伏阴毒。份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赵秉钧亦入国民党），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③。为了改变国

① 孙中山1914年3月致黄兴书。《总理全集》，函札，第148页。

②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的演讲。同上书，演讲丙，第32—33页。

③ 中华革命党的《第四号通告》。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272页。



民党这种面貌，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中说：“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指辛亥革命——引者）异党入据，以伪乱真。”^①

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②。这是把是否愿意立誓服从孙中山看做是真假革命党人的唯一标准。孙中山对此申述理由说：“不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人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党员之用，无所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③

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说：这个新成立的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④。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时人们是完全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理解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政党就是要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席位，以求在取得多数席位时组织内阁。按照这种理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是革命党而不是“政党”，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就是改组成了政党。既然经验证明，在成为政党后，发生了党员“浮滥”，“良莠不齐”，以及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等等弊病，所以孙中山认为必须确认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与政党性质不

① 《总理全集》，宣言，第19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159页。

③ 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见上书，第265页。

④ 《总理全集》，宣言，第19页。



同”。而且也不说这个党是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这显然是因为感到同盟会的分子过于复杂，并不服从一个人的原故。这样，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性质就被确定为一个“秘密团体”。

辛亥革命中发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这在当时人看来，纵然不是理所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有了革命军，有了新政府，那末，以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要变成争选票的政党了。鉴于革命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蜕化变质，国家政权为旧势力篡夺的教训，孙中山在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提出了划分“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时期的说法^①。《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等到“地方自治完备之后”，才创制和颁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总章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此以前，都叫作“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总章中又把党员分为三等，明确规定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权利。在革命军未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他们在革命时期都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那就只享有选举权利了。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②

孙中山提出这一套办法主观上是为了使下一次革命不致重蹈

①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这三个时期的说法，但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说法不尽相同。

② 《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理全集》，方略，第119—120页。



辛亥革命的覆辙，防止在革命军起和革命政府成立时，革命成果为投机分子和旧势力所篡夺。他以为，推迟宪法的颁布，而把“革命时期”的全部政权掌握在革命军兴以前就宣誓效忠于他的一小批“首义党员”，至多再加上那些“协助党员”的手里，就可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却没有想到，如果真是按照这样做法，将只是使那些“首义党员”和“协助党员”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使他的党和所要进行的革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中华革命党总章说：“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后三年的经验使人痛感到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丝毫不能起遏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的作用。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思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他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办法使他走向了民主的反面：他所建立的党以是否绝对服从领袖个人作为党员之唯一标准，并且预约给予最早宣誓服从的党员以“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他所设想的革命时期成了少数“首义党员”和“协助党员”统治全体连公民资格都没有的人民的政治！

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时，以孙中山为总理，并要黄兴担任协理。黄兴表示不赞成以“附和孙先生革命”为誓词，拒绝参加。不少知识分子和军界的旧党员也对接手模宣誓的方式表示反感，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欧洲战争爆发后，一些在日本的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其中多数是军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它虽然用研究会的名义，其实是中华革命党以外别树一帜的政治派别。他们和黄兴一样，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急进”的革命手段，而主张“缓进”。

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1915年2月间，黄兴和欧



事研究会的若干主要成员联名发表通电，认为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应该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由于黄兴和列名通电的另一一些人（如柏文蔚、李烈钧）是1913年赣宁之役的重要人物，所以他们的看法颇有影响。对于这种看法，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他在一封为这问题答复北京学生的信中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他把袁世凯比做已经升堂入室的大盗，“大盗在室，乃如取如携。祸本不清，遑言捍外？……而乃望以一致为国，相去万里，何止迳庭！”^①孙中山认为，对甘心卖国的袁世凯，必须坚决斗争，谈不到合作一致对外。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它不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较大的影响。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够站在领导地位。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西南几省的地方军阀，充分利用了袁世凯由于对帝国主义屈服和实行帝制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形势，为自己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

在熊希龄的内阁时期，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党人是支持袁世凯的。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在国会中同国民党相对抗的进步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进步党中的主要活动分子，仍然可以视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大体上就是清末的君主立宪派分子。梁启

^① 《总理全集》，函札，第165页。



超仍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他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第一篇文章中自称为“立宪党”，虽然这样的党的组织是没有的。

国会解散，熊希龄内阁下台以后，虽然袁世凯日益明显地实行独裁政治，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进步党人仍然不反对袁世凯。在袁世凯为制定他的“大总统选举法”而设的参议院中，梁启超和其他几个进步党人受聘为参政员，他们对选举法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的亲信们改行帝制的呼声已经公开喧嚷起来，梁启超观察形势，感到继续支持袁世凯是不聪明的事。这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梁启超所说他为什么要反袁的理由，是值得看一下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①首先声明：“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他把主张民主共和的人讥诮为“新进耳食者”，自命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谈国体问题。共和与君主，就是他所谈的国体问题。他又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他的意思是说，国体只能维持现状。在辛亥革命前，因为现状是君主国体，所以他反对鼓吹共和；而现在很不幸的（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已经经过革命而成了共和国体，也就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可再加以改变。他说，如果硬要改变现行国体，那就是革命，而革命是他从来反对的，所以他过去反对“共和革命”，现在反对“君主革命”。——袁世凯实行帝制，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而梁启超把它说成是一种“革命”。这固然是他有意糟蹋革命这个字眼，同时还有深一层的意思。

^①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收在其所著《盾鼻集》中。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85—98页。



他的文章中说，他其实是很希望能使共和“复返于帝政”的，不过“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恢复”，而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行“君主革命”，后果是很危险的。“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也就是可能导致真正的革命，这是他所最害怕的。

梁启超的文章又说：“吾侪立宪党之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照这样说，他似乎是既反对改变既存的共和国体，又主张在共和的国体下实行立宪的政体。按当时人的用语，共和立宪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却又表明，他并不真正要求袁世凯实行民主共和。相反的，他认为，在共和的招牌下实行专制是可以容许的。他说：“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人所共谅”，但如果公然废弃共和，那就难免遭天下人之反对了。所以他的文章为袁世凯设想说，既然已经能够当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使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那就应该满足于这种状况，“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何必一定要废弃共和而当皇帝呢？梁启超在举起反袁的旗帜时，对于袁世凯自己丢掉共和的招牌是深表惋惜的。

附带说一下，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是有分歧的。康有为也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他认为用帝制代替共和是必要的，不过袁世凯不配当皇帝，只应该让清朝复辟。梁启超和他的老师不同，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慨叹共和对中国是多么有害，但他认为，在反对袁世凯时必须以维护共和的战士的姿态出现。

梁启超还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经验，如果抢先抓起反袁的旗帜，是对于自己一派最有利的。他在给南京的进步党人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



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

靠什么力量来反对袁世凯呢？梁启超找到的力量是西南几个省的地方势力：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

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是他的密切的合作者。蔡锷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成为云南都督，1913年离开云南。由于他在军界中的声望，袁世凯授予他以各种荣誉职位，把他羁留在北京。原是蔡锷部下的唐继尧被袁世凯从贵州调到云南，受封为将军^②。1915年11月，蔡锷根据梁启超和他商定的行动计划，设法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离开北京，先到日本，然后回到云南。差不多同时回到云南的还有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都属于欧事研究会）。他们都主张在云南宣布反对袁世凯。唐继尧起先因为自己的力量对抗不了北洋军力，对于是否和蔡锷等人共同行动是动摇的。由于蔡锷在他部下的中下级军官中威信很高，许多人赞成反袁，又由于蔡锷等人说服了他，使他看到整个形势对袁世凯不利，他终于下了决心。12月25日以唐继尧为首向全国发布声讨袁世凯的通电，云南宣告独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云南的军队组成三个军，号称护国军。由蔡锷率领一个军进兵四川。

贵州的军阀刘显世本来是地方豪绅，在辛亥革命期间乘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争的时机掌握了省的军权。他也曾向袁世凯效忠，但这时追随云南，在1916年1月间宣布贵州独立。

争取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响应是梁启超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步。陆荣廷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广西的统治者，

^① 梁启超，《致蒋亮侪等书》（1915年11月18日）。《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

^② 袁世凯在准备行帝制时对各省的军事长官封为不同名目的将军。



袁世凯也授予将军的封号。他时常担心受到北洋军人的排挤，但是对于是否参加反袁行列还很踌躇。为了促成他行动，梁启超接受他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下，避开袁世凯在各地密布的暗探，由上海经过香港、越南潜入广西。1916年3月15日以陆荣廷、梁启超的名义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为广西都督。

由蔡锷率领的进入四川的护国军的力量是很小的。唐继尧为了使颇得人望的蔡锷离开云南，以免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愿意分给一部分兵力，但并不给以充分的后勤支援。因此，蔡锷在川南虽曾打败四川本省一些军队，占领叙州（今宜宾）、泸州、綦江等地，但是在袁世凯从外省调进了一些北洋军队后，蔡锷在作战中受到了挫折。袁世凯派驻四川的将军陈宦，虽受到袁世凯的信任，但并不是北洋嫡系。他不愿意战争扩大，因为如果北洋军队更多地进入四川，他的地位就会动摇。在陈宦和蔡锷双方默契下，四川的战事成为僵持的局面。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迷梦。因为云南用护国军的名称，这次反袁斗争被称为“护国运动”。护国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企图彻底埋葬辛亥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的反抗，但在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梁启超为自己一伙人夺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的意愿是达到了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注定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规模远不如辛亥革命，其结局也不可能高过辛亥革命。

（五）袁世凯的覆灭

袁世凯虽然在1915年12月已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是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却没有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



推延,终于在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袁世凯及其党羽也知道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但他们确以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能够博得众多“愚民”的膜拜,因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奇迹没有出现。

利用社会各阶层中反对卖国独裁,憎恶帝制复活的情绪,西南几个省宣布独立,这对于袁世凯固然是严重打击,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袁世凯由于称帝而陷入困境,不愿意继续支持帝制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也表面化了,这就更是袁世凯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酝酿时,他所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① 美国博士的这种议论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个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也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在实行任何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时,总是要首先看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由于欧战尚在进行,日本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态度如何更是袁世凯所顾虑的。日本政府通过有贺长雄和其他渠道使袁世凯相信,他接受了“二十一条”就可以换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因此,袁世凯当时认为他实行帝制,在外交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赞助的。

^① 古德诺的全文见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62—174页。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袁世凯采取的是两面三刀的态度。由于袁世凯和英、美的关系较深,日本并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统治稳定。相反的,它宁愿由于实行帝制而在中国造成混乱的局面,以便于扩充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并且培植完全能为日本所用的代理人。梁启超的反袁活动之所以能得到日本的帮助就是这个原故。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以前,1915年12月15日,日本已经联合英、法、俄、意共五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表示担心实行帝制能否维持国内治安。到了1916年1月间,日本更明显地表示不信任袁政府能够平息云南、贵州的局面。此外,日本还资助一些清朝的贵族和遗老,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总之,袁世凯逐渐发现,日本是在捣他的乱,而不是为他撑台。

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的分裂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身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在准备实行帝制时,1915年8月,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这个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感到段有自己的野心。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实行帝制,采取冷淡的态度,并且同反袁的立宪党人和西南军阀暗中来往。在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后,他愈来愈表现出反对帝制的态度。他是看到袁世凯的大厦有倒坍的危险,意图以自己为中心来维护北洋军的传统势力。他的这种意图特别得到江西、湖北等省的北洋军阀的声援。北洋军内部分裂的表面化使袁世凯更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长江流域这几个军阀的动向又是英国态度的反映。

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撤销帝制的,他还企图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4月21日他向段祺瑞让步,请段出任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他想借段祺瑞的力量来渡过难关,而后者却企图利用这机会从袁世凯手里接管政权,如同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接管清



朝政权一样。这时，不但西南独立各省认为袁世凯已无权继续担任大总统，而且冯国璋也电告袁世凯还是自动退位为好。4月、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原来效忠袁世凯的地方军阀也相继响应云南的护国运动，宣告独立。四川的陈宦在3月底和蔡锷商量停战，到了5月间，陈宦宣告四川独立。接着湖南将军汤芑铭也宣告独立。陈宦和汤芑铭是袁世凯所信任的人，他们的倒戈使袁世凯特别感到众叛亲离，他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在云南护国运动以前已经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但在整个斗争中没有能起主导作用。

中华革命党所能运用的力量主要还是旧式的帮会组织。陈其美是和上海的这种组织有很多联系的，他在1914年就企图以上海为中心，在江苏、浙江发动起义，但是没有成为事实。1915年11月（云南护国运动开始前一个月）陈其美派人暗杀了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为消灭了这个人就易于在上海起事。12月初，陈其美组织了停泊在上海的肇和军舰的起义。他的部下虽然得到舰上官兵的响应占领了这只兵舰，但是其他两艘兵舰没有按预计配合，反而炮轰肇和舰。在陆上以手枪、炸弹武装起来的“决死队”也没有能占领警察局、电话局、电灯厂。这次起义只两天就失败了。在护国运动起来以后，中华革命党人在各处还发动了若干次勇敢的行动。1916年2月，杨王鹏（辛亥革命前在武昌担任过振武学社社长）等四十多人在长沙用手枪、炸弹突袭湖南将军汤芑铭的衙门，全部牺牲，被捕的杨王鹏遭到剖腹挖心的惨刑。4、5月在江苏、山东、广东各地也有中华革命党人的类似起义。比较有成绩的是在山东，以居正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组成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度占领潍县、高密等地。

孙中山于1916年4月底从日本回上海，5月9日发表讨袁宣



言。他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①。要为真正保持民国着想，而不能以去掉袁世凯一个人为满足，这是孙中山针对以梁启超为政治灵魂的护国运动说的话。但是他的呼声当时得不到反响。

梁启超明确认定，斗争的目的只是在于推翻袁世凯一个人。按照他的设计，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个“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独立各省的军阀都取得军务院抚军的名义，他们推云南的唐继尧为抚军长，而以在肇庆的岑春煊为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任军务院的政务委员长。岑春煊是清朝的老官僚，他在1900年任甘肃省的布政司，因带兵护卫逃出北京的朝廷而为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因官场上的倾轧而与袁世凯不相容。入民国后，他参加过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欧事研究会的军人们曾想拥戴他为领袖。他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有联系，又和两广的军人有老关系，因此能成为军务院的头头。军务院表示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资格，而认为应该“依法”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岑春煊宣布北伐的《出师布告》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苟可以去袁氏而无借于用兵，其道何由，固无所择。”又说：“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任，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②。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袁世凯退位，决不超越这个范围，为达此目的，采取军事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是可以的。岑春煊和

① 《讨袁二次宣言》。《总理全集》，宣言，第22页。

② 《军务院考实》，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作战方略》，第12页。



梁启超一方面以出兵北伐造成声势，一方面和段祺瑞、冯国璋进行联络，希望他们劝说袁世凯自动退位。段、冯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只牺牲袁世凯一个人而保持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势力。可是，袁世凯仍然不愿意退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因病死去。手无兵权的黎元洪在段祺瑞同意下就大总统职，而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不久后，冯国璋任副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7月14日，广东的军务院自动宣布撤销，但北京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控制下，只是没有了袁世凯。

中国虽然有二千年帝制传统，但辛亥革命打破了这种传统，从此民主共和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梁启超在发动护国运动后说得好：“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响共和乎为趋响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以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①。袁世凯违抗这种表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潮流，他的失败是不可免的。但是在护国运动结束时，梁启超实际上是以为，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由于保持共和的形式就能“安立”，那还是错误地估计了“民情”。

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是为了进行一场反袁世凯的革命。袁世凯虽然失败了，但是预期的革命并没有出现。梁启超一派人之所以发动反袁是为了防止反袁斗争变成一场民主革命，他们之所以力求迅速结束这场斗争，为的是不致在继续动乱中出现革命的危机。

孙中山虽然认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真正保持民国，他提出来的只是尊重民元约法一点。在

^① 梁启超，《辟复辟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18页。



北京政府已经算是恢复了民元约法的时候，中华革命党不能为自己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孙中山宣布仍恢复国民党的名义^①，和许多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②重新合成一个党。

-
- ①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中说：“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第287页）。但又说：“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第390页）事实上是，1916年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不过，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活动很少，到了1919年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
- ② 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黄兴1916年7月由美国回到上海，孙中山曾和他会谈恢复合作。10月底他在上海病故。



第二十七章

五四运动

(一) 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被袁废除的临时约法算是恢复了，被袁解散的国会也重新召集了，但这并不表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胜利，而且这两个作为辛亥革命遗迹的东西，不久又被废弃了。

重新召开的国会中有国民党的议员，也有进步党的议员。但这时他们已不自称为国民党和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组成为“宪政商榷会”，并没有明确的纲领，又分裂成许多小的派别。进步党人组成为“宪法研究会”，由此这一派人被称为研究系，梁启超仍然是他们中的主要领袖人物。研究系拥护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如同过去进步党拥护袁世凯一样。国会重开后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在国会议员们为宪法条文进行着无穷无尽的争执的过程中，国会又一次被解散。

国会这一次被解散是在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排挤的情况下发生的。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军系统的两个大头目，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掌握着北京政权；冯国璋在1916年10月由国会选为副总统，但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地位，



仍留任江苏督军^①而不到北京。黎元洪看到北洋军中冯国璋一派和段祺瑞一派之间的裂痕,以为可以利用冯国璋来排除段祺瑞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1917年,发生了要不要参加欧洲战争的争执。段祺瑞在研究系议员们的支持下主张参战,黎元洪在研究系以外的多数议员支持下反对参战,南京的冯国璋也表示不赞成参战。5月里,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段祺瑞立即唆使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八省军阀宣告“独立”,并且自己到了天津,组成各省总参谋处,进行反黎元洪的活动。以冯国璋为首的江苏、江西、湖北三省的军阀虽然不附和段祺瑞的行动,却也没有积极支持黎元洪的表示。处境危险的黎元洪,求助于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张勋不是北洋军嫡系,他一向主张清皇朝复辟,这时认为他的机会来了,便以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停为名带兵入京。他的军队到北京后,他宣称,必须立即解散国会,否则无法进行调停。这样,黎元洪在6月12日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张勋并不想当黎元洪的保护神,而是打算实现复辟。抱着同样主张的康有为这时从上海到北京,成为张勋的密切合作者。许多清朝的遗老旧臣也簇拥到张勋的周围来。7月1日他们请出了住在故宫中的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

张勋进京路过天津时,曾与段祺瑞会谈,后者完全知道张勋的谋划,并不表示反对。他是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并把黎元洪赶下台,然后自己来享受一切成果。所以当北京城内的复辟丑剧上演时,段祺瑞立即在马厂(在天津、沧州间的铁路线上)宣布讨伐张勋。张勋的兵力不多,无法抵抗出于他预料之外的这种压力。7月

^① 这时各省的军事长官改称为“督军”。



12日段祺瑞的军队进入北京，张勋、康有为等复辟派纷纷逃窜。不到半个月，这幕复辟丑剧结束。段祺瑞就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黎元洪只能宣告辞大总统职。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资格继任大总统，8月1日进京。段祺瑞仍为内阁总理。

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这时一个成了张勋复辟的同谋者，一个则是段祺瑞出兵讨伐张勋的谋士。在段祺瑞重新组织的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司法、农商、教育各部都由研究系的政客担任，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研究系还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不再恢复由黎元洪又一次解散了的国会，而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为加强北洋军阀在全国的统治造成更有利的条件。

历史学家李剑农这样评论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梁氏相信国家要有一种中坚实力来维持，北洋派的武力有可以成为中坚实力的资格，很想和他们结合去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不成功；现在想改良冯、段……”^①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并不想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所想望的是依托北洋军阀的武力，实行梁启超历来所说的“开明专制”或“共和国体下之专制”，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国家稳定的局面，其实这种局面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无论怎样“改良”，是不可能稳定的。

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倾轧，并由于南方几个省的地方军阀和北洋军阀的矛盾，段祺瑞的包括研究系人物的内阁只存在了四个月就下台了。虽然到了1918年3月段祺瑞重整旗鼓，再任内阁总理，但这回的内阁中研究系已没有份。段祺瑞以他所更加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并在1918年8月制造了一个国会。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俱乐部的成员占多数，被称为“安福国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425页。



会”。受段祺瑞的逼迫，大总统冯国璋辞职退位。安福国会另选了个前清老官僚（也是袁世凯的老伙伴）徐世昌为大总统。这样，在北洋军阀系统内部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段是安徽人）和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是直隶人）^①的对立越来越剧烈，以至后来在1920年发生了两系军阀大火并（直皖战争）。

在皖系和直系的后面有外国帝国主义做后台。段祺瑞是一心一意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冯国璋从1913年底起盘踞江苏，和英、美帝国主义关系较深。当欧洲列强都卷入世界战争时，在远东还能同日本抗衡的只有美国。1917年2月美国参加世界战争，开始曾想把中国拉进战争。英、法、俄、意四国这时与日本秘密成立谅解，承认日本在战后可以占有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又给段祺瑞政府一亿日元的贷款，段政府答应将三个兵工厂交给日本代为整理，并请日本军官来练兵。美国看到段政府将由于参战而更深地陷入日本控制下，便转而主张中国暂不参战。这是冯国璋和黎元洪反对参战的国际背景。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8月14日，宣布参加对德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段祺瑞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求在国内实现武力统一；日本则企图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并且把中国军队用做进行反苏战争的附庸军。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这年5月间段祺瑞和日本政府订立秘密的“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②，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

^① 冯国璋在1919年病死，曹錕成了直系军阀的领袖，曹錕也是直隶人。

^② 包括陆军和海军两个协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365—1369页。



有关军队。1917年到1918年之间，段祺瑞从日本得到了一笔笔巨额贷款，总数在五万万日元以上，这些贷款都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当时日本的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在下台后曾自夸说，日本从这种巨额投资中所得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1918年，欧洲战争结束，英、美重新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皖系势力有矛盾的直系军阀，就成为英、美所利用的工具。

在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时，又有南方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起而与北洋军阀抗衡。他们主要是在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陆荣廷和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的势力这时已伸张到广东，他部下的一个师长陈炳焜当了广东督军。云南的唐继尧不仅控制贵州，还有军队插手四川。所以他们是南方两个重要的实力派。张勋复辟时，他们宣布反对，但是段祺瑞捷足先登，他们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张勋复辟被推翻以后，段祺瑞企图用武力统一南方，使南方实力派感到受威胁。于是陆荣廷、唐继尧联合谴责北洋军阀解散民元国会，破坏民元约法，他们表示否认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也宣布反对北洋军阀的政府。他在1917年7月从上海到广州。海军总司令程璧光这时率领海军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表示追随孙中山。南方的小军阀也愿意借用孙中山的威望。所以程璧光的海军和陆荣廷、唐继尧的地方实力成为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孙中山在到广州时发表演讲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能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在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鄙人密察大势，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无以贯彻其救国



救民之宗旨。”^①

总结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后形势发展的经验，孙中山提出了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实现真共和呢？在反袁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以“秘密团体”来搞革命，没有什么成效；进步党人依靠地方军阀力量占了先着。这时，孙中山实际上沿用了梁启超用过的办法。陆荣廷、唐继尧也正是梁启超两年前反袁世凯所依托的力量。

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护法”，就是维护继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又加以废弃了的民元约法。在他号召下，原国会的一部分议员来到广东，8月25日开始集会，因为人数不足，叫做“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军政府的首脑，称为大元帅，而以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通电否认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这回的护法运动形式上是孙中山领导的，但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不到一年，1918年5月，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为此，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回到上海。辞职通电中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瘖口啞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②不久后，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在广东任大元帅职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讎所快，终至解

^① 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的演讲。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第三篇，第1072页。

^② 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电。同上书，第1085页。



职以去。”^①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之所以失败，因为，第一，护法运动虽是反对篡窃民国的北洋军阀，但所提出的具体口号不过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元国会，而且还表示承认黎元洪是合法总统，要求他复位，这些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号召力的。第二，军政府所依靠的是南方的军阀势力。这些地方军阀所想的只是如何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对他们不过是个幌子。北洋势力中，段祺瑞倾向于用武力对付南方，冯国璋则倾向于同南方军阀讲条件，谋调和。唐继尧和陆荣廷一面表示赞成北伐，一面同北洋势力暗中往来，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妥协。正因此，孙中山不得不慨叹：“南与北一丘之貉”。

梁启超和孙中山虽然先后与西南军阀合作，但前者是通过反袁世凯而投身到段祺瑞门下，后者却在“孤立无助”中失败。陈独秀在1917年已曾这样评论进步党和国民党说：“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段祺瑞为把持北京政权而组织的各省军阀，当时称为督军团——引者）。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② 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不过进步党的“成功”只是暂时的、形式的成功）。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又一次失败，虽然表明他这时找不到革命的出路，但这是由于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而失败，是他的荣誉而不是他的耻辱。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后，广东的护法军政府改行七总裁合议制，

^① 孙中山致港商陈廉如函。见《总理全集》，函札，第176页。

^② 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四号。



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懌七人为总裁，而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①。孙中山没有就职，并在不久后辞去总裁这个空名。岑春煊既与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关系密切，又为国民党中称为政学系的一派人所拥戴。国民党这时四分五裂，政学系是其中的右翼，由曾参与欧事研究会的一部分政客所组成，他们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同北方的研究系差不多。以岑春煊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政客所支配。

以后，到了1920年，由于陈炯明的军队把桂系力量赶出广东，孙中山又回到广东，仍然在护法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的武力是孙中山1918年任大元帅时为对抗桂系力量而培植起来的。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不久，陈炯明又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发动政变，使孙中山再一次无法在广州立足，护法运动遭到彻底失败。

吴玉章（他在护法运动期间作为民主革命家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工作）的回忆录说：“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

^① 七总裁中，伍廷芳和唐绍仪没有兵权，是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旧官僚。林葆懌是海军的首脑（程璧光已于1918年2月被人暗杀）。岑春煊是反袁的护国运动中的军务院的首脑，已见前。



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①

这些是当时孙中山和其他有志于改造国家命运的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

（二）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由于战争，西方各国不可能继续以大量商品输入中国。虽然日本货的进口并不受到影响，反而更增加些，但进口货的总额减少是显著的。1912年（民国元年）进口额为四亿七千三百万两，1913年增加到五亿七千万两。到了1914年，欧战爆发的一年，是五亿五千七百万两，比前一年已减少了一些。以后几年，直到1918年，即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每年进口额都比1913年少，最少的一年是1915年，降到四亿五千四百万两，比1913年减少一亿一千多万两。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出口额一般的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战争中的各国需要从中国输入农产品、原料和面粉等等的原故。所以，在战前几年，中国每年入超数字达一亿两至二亿两，而在战时的1915年到1918年，入超降到二千六百万两至八千三百万两。

有些原来由于受外国货排挤，营业不振，甚至连年亏损，无法维持的私人资本企业，到了欧战期间，一变而为取得厚利。以纱厂

^①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页。



来说，“1909年所建的无锡振新纱厂，经营七八年，并无重要发展，惟到了1919—1920年，股东红利曾高达六分之多。又同年所建的宁波和丰纱厂，战前本难于维持的，但在1919年该厂竟以九十万元的资本获净利达一百二十五万元。江阴利用纱厂，一向出租出去，1915年始由原股东收回自办，其后六年内以七十二万两的资本，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枚纱锭，获利达三百余万元之多。……总之，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全能获得意外的厚利。”^①别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华侨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6年创办于香港，十万元的资金曾亏蚀殆尽。1915—1916年间，公司业务大为发展，1918年它的总公司移到上海，除在上海设厂外，又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厂。1919年公开招股，成为一千五百万的大公司^②。

这时期抵制日货的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了各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情。有人以牙粉和伞为例，说明抵制日货的效果：“从前中国人惯用舶来之牙粉，如日本之金刚石牙粉到处风行。其后无敌牌出而应世，外货势力遂削。”无敌牌牙粉是上海的一个笔名为天虚我生的文人陈栩园在1918年创办的家庭工业社的出品。“以前我国用伞多来自日本”，1918年，杭州的旧式作坊孙源兴“改良纸伞，减轻重量，制造弯伞柄”，由此杭州的制伞工场逐渐增多，所制丝伞、布伞在市场上渐次代替了进口的日本伞^③。

在欧战期间，发展得最快的是棉纺织业。这可以从下列关于华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186页。

②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03—1005页；参看龚骏编《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6—227页。

③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98页。



商棉纺织厂的统计数字看出来^①：

年份	厂数	纱锭(枚)	布机(台)
1915	22	544,010	2,254
1919	29	659,721	2,650
1920	37	856,894	4,540
1921	51	1,238,902	6,650
1922	64	1,593,034	7,817

1919—1922 已是战后时期。因为筹组新厂和从外国购置机器需要时间，所以由战时有利条件激起来的建厂潮流到了 1921—1922 年才达到顶点。在战前由经营面粉业发家的荣宗敬，1916 年和 1919 年在上海办了两个纱厂，1921 年又在无锡和汉口办了两个纱厂^②，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由于他的两个老厂在 1915—1916 年获利甚丰，就定了新建九个厂的大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1921 年他在江苏海门办了个新厂，以后在 1924 年还办了个新厂。从上表中可以看到，1915 年到 1922 年八年间，私人资本的纱厂，厂数和纱锭都增加了近二倍，布机增加且不止二倍，除了棉纺织业外，缫丝、丝织、针织等业这一时期都有显著发展。因此，这几年被认为是民族纺织业的“黄金时代”。

面粉在战前有少量出口，但进口是大量的。1913 年和 1914 年的入超都在二百万担以上。1915 年起的六年间一变而为出超，1918 年到 1921 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在这期间，各地纷纷创办面粉工厂。战前全国面粉工厂只有四十多家，到了 1920

① 《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 1948 年编印。原注：“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

② 这四个厂即申新一厂到四厂，以后荣家还在 1925—1928 年续办了申新五厂到七厂。



年、1921年间,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包括少数外国资本的工厂)。面粉工业也是在欧洲战争期间民族资本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

除了纺织业、面粉业以外,火柴、水泥、卷烟、榨油、造纸、制糖、制皂、制烛等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间也有些发展。总之,利用这时机发展的主要是轻工业,是日用品制造业。民族的私人资本也只有力量发展这种较易于兴办,能较快取得利润的轻工业。

当时的军阀政府并不利用这种时机兴办工业。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从外国得来的大量借款都用于军政费用,特别是用以扩充军队。当权的大小军阀、官僚手中积累的财富,或用于购置田产,或用以从事商业投机和高利贷剥削,或存于外国银行。他们一般地对于办工业是没有兴趣的。但是社会上仍有相当数量的游资在寻求出路。有个作者这样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内则军阀干政,干戈迭寻,外则列强环伺,压迫有加。实业供其腹削,民生坠于涂炭。建设事由,无由发皇。民间资金苦无出路,壅塞于外国银行。在外商银行全盛时期,国人存款,多数无息,且有收取保管费者。”^①这些“苦无出路”的“民间资金”的拥有者大多是卸任失势的官僚军阀和较大的商人。在看到办工业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转而投资于工业。此外,有许多中小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也乘机经营新式的工业,他们所能办的当然只能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他们以及某些中小地主也成为较大企业吸收股金的对象。

民族工业繁荣的好景不长。1918年世界战争结束。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迅即上升到超过战前的水平。1919年的进口额为六亿四千六百万两,已高于战前1913年的五亿五千七百万两,但因这

^① 洪大里,《民元来我国之工业》。见银行周报社编印的《民国经济史》,第237页。



一年出口额还较多,所以入超只有一千六百万两。1920年进口额增为七亿六千二百万两,出口额却有所减少,这一年入超高达二亿二千万两,打破了战前的纪录。1921年进口额剧增为九亿两有余,入超高达三亿两。与外国商品的进口剧增同时,外国资本也大举重新侵入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期繁荣既然只是利用了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间隙,所以当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民族工业向上发展的趋势立刻就被打断了。受到打击最明显的也就是曾经发展最盛的棉纺织和面粉业。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而致产品销路呆滞,资金周转不灵,有的只能停产歇业,有的被外国资本兼并或因举借外债而受人操纵。

经济史研究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中国棉纺织业的繁荣景象,维持到1922年而完全消逝,接着就是长期的慢性萧条”^①。另一作者说:“惜我国工业基础未固而欧战即已告终。民国九年(1920年),中国国外贸易为先前未有之巨额,然查其进出口货,进口增六分之一,出口反减少六分之一。外货又来,经济压迫又来,经济压迫之幕又开。国人居此恶劣环境之下,不知振刷精神,亟谋补救,反于此时争设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等投机事业,想谋意外之财,置本业于不顾,结果皆遭惨败。停厂者有之,杀生破家者有之,遂酿成民国十年(1921年)之经济恐慌”^②。这所说争作投机事业的现象,是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下没有出路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统制工业资本的落后本质”^③的表现。许多工厂经营者特别在遇到困难时,就转而从商业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02页。

②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32页。

③ 《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0页。



投机中找出路,这种情形反过来更增加了工业的危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繁荣景象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繁荣景象的暂时出现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中国的国民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当时有些人因为看到政治黑暗无望而提倡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但是在军阀统治下根本谈不到发展教育。实业救国也同样只是一种空想。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思想界处于很混乱的状态。

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梁启超在1915年这样写道:“我国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① 梁启超这段话透露了他一向抱有的对民主革命的反感,但是确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面对辛亥革命后混乱局势的悲观情绪。

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的思想。

^①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第80页。



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康有为不但参加他们的行列，而且是最重要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交织起来，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而仅仅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网罗。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冲决这种精神网罗的斗争。《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名为《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起的半年内连续出版了六期。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从此它在青年群众中的影响，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扩大。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文化思想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开始于1919年前三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随着五四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

《新青年》创刊时表示这个杂志的宗旨不是“批评时政”。但杂志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思想工作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当时的政治问题，而要追求政治的一种根本改革。但他们也有些文章直接议论政治问题。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在1918年撰文痛驳康有为对共和



的攻讦。康有为把民国成立后六年来的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现象都归罪于共和,也就是归罪于辛亥革命。为反驳这种说法,陈独秀指出:“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并不是“共和本身之罪”,而是由于受到“阻力”;“武人”像“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学者”像“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就是最强的阻力。“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亦古今中外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因此陈独秀指出:如果来讨论酿成“反动时代之黑暗”的原因,“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① 陈独秀和《新青年》其他作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就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们在反动势力的攻击面前,以坚定态度为辛亥革命作勇敢的辩护人。

初期《新青年》^②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这样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个虚假的形式。他们就来着手从这方面做起。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

①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议》。《新青年》第4卷,第三号。

② 《新青年》杂志一直出版到1926年。它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开始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这里所说的初期《新青年》是指直到1919年的《新青年》。



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新青年》的作者们针对着当时正在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根据历史和现实生活，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这些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的话。戊戌时期维新派在中国近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新思想进行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冲击，但是正如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一样，他们的思想其实是半新半旧的。他们抬出孔子作招牌，并没有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传统表示否定。他们推翻了两千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也就使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发生动摇。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妥协也反映为对封建思想的妥协。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运动是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性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

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且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功绩。《新青年》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文体的这种改革和文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三号。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一号。



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新青年》的作者们说,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这虽然表现了他们还只能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库藏中寻找武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想武器是发挥了战斗作用的。从个人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他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也贯彻了这种精神,主张写文章不应摹仿古人,写“八股文”,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这些呼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他们的共鸣,激起他们的斗争的热情。

《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向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来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比孙中山的国民党当时所进行的护法运动强大得多的生命力。

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更使这个运动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



中国的知识界接触到社会主义并不始于五四时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人们已经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己的“弊病”而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已经谈论社会主义,有些刊物上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但是那时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不过是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由于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越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免下一步引起更“可怕”的社会主义革命。梁启超有的文章中表示他赞成社会主义,所指的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不必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采取某些措施,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把某种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看成就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反对发展资本主义,惟恐因此损伤小生产者的利益,因而主张建立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这其实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人大体是这种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还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一般地只能发出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除了接触到无政府主义以外,还接触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这种“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同某些知识分子很能投合,因此也有人接受了这种思潮^①。

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

^①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专号,其中有的文章表示赞成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激动,尤其是先进分子由此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辛亥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爱国志士们的救中国的目的究竟为什么达不到?为这些问题苦恼的先进分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解答。《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开始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在1918年到1920年间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他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时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于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四) 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

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老官僚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



走狗段祺瑞，他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退出后，由以岑春煊为首的军阀官僚所把持。南北两个政府1918年底宣布停战，并且在1919年2月开始举行议和的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也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提出了“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并且表示，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利用这机会争得中国在上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反映人民的愿望，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和在战争期间得利最大的日本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尤其强烈地表现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中虽然有亲日派，但多数是亲美派。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特别使日本感到不利的要求，也同美国的恣愚有关系。但是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由此而导致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害以至失掉。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



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方面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还提出了由五国共管的主张。这个主张受到日本的反对，也无益于中国。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①。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②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

① 《每周评论》的这篇发刊词署名“只眼”，即陈独秀。

② 见《每周评论》第二十期的《随感录》，也是陈独秀写的。



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輿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①。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游行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②。

① 章宗祥在“五四”时任北京政府驻日本公使。陆宗輿也曾任驻日本公使,“五四”时是币制局总裁,又是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的总裁。

② 许德珩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在北京》。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然杂陈于青年面前。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跃。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社团组织。其中有出版《国民杂志》的国民社(上述的学生救国会的成员所组织),出版《新潮杂志》的新潮社,在城乡居民中进行通俗爱国宣传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一些由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的社团。这些社团是五四游行示威中的骨干。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和赵家楼的示威虽然带有群众自发性,但是整个行动比较有组织,而且在这一天行动以后能够坚持下去,就因为有一些这些社团的原故。这些社团和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他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外,还和许多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参加了学联合会的工作,并且组织学校教职员支持学生的运动。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游行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



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了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



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渡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荡。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



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五四”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仅仅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之多。这些社团和刊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除了明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也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议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议论马克思主义。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上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续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①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众起了先锋作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卷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特出的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① 《关于五四运动》。《孙中山选集》,第482页。



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二年,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



人名索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每条所记数字是页码。)

A

- 阿伯丁 Aberdeen 70
阿布拉特 374、376
阿古柏 Ycoob Beg 374、375、377、381
— 386、395
阿利国 Alcock R. 81、303
阿列克塞也夫 Alexeiev Admiral 624
阿美思德 Amherst 23
阿思本 Osborn S. 293、294、295
艾声 580
安德洛德 Androde Simon 15
安德森 Andersen A. 54
安邨 Garniea F. 279、398
奥尔尼 Olney Richard 491

B

- 巴布科夫 Babkov J. F. 370—373、
376
巴德诺 Patenotre M. 403、405
巴尔苏科夫 159

- 巴甫洛夫 Pavlov M. Paul 433—435、
445、565
巴富尔 Balfour G. 83
巴弩 Porker P. 149、150
巴夏礼 Parkes Harry S. 173、186、
225、226、228、229
白含章 51
白蕉 865、869、897、916
白齐文 Burgevine H. A. 245、261
白彦虎 385、386
柏贵 157、158
柏文蔚 896、911
伯恩斯坦 940
伯尔考维茨 289
伯克胡里 Unli Beg 385、386
伯朗 Browne H. A. 378
包令 Bowring J. 143—148、150、151
包世臣 78
鲍超 212、213
鲍鹏(亚聪) 51、80、81
鲍人琼 81



鲍人珩 81
宝海 Bouree M. 400,401
贝雷斯福德 Beresford 564,569
贝青乔 57
贝斯福 Beresford C. 564,569
本明和尚 573,577
彼得大帝 Peter I. 522,525,532
彼罗夫斯基 Perovski 164
闭黎(美国商人)81
毕盛 Pichon M. 445
边沁 Bentham J. 519
卞宝第 77
波波夫 Popoff B. N. 472
布尔布隆 De Bourboulon A. 136、
214
布加卑(法国军官)761
布鲁斯 Bruce F. W. A. 214、227、
235、294
布士尔克 374

C

蔡锷 824—826、833、914、915、918
蔡大辅 790
蔡和森 941
蔡济民 790
蔡绍南 720、722、724
蔡希绅 566
蔡元培 671、672、684、869、882、886
曹福田 599
曹锟 851、882、925
曹汝霖 905、944、945、947
曹亚伯 792、802、811、864

曹志清 468
查顿 Jardine William 38
岑春冀 724、739、740
岑春煊 674、849、919、929、942
岑毓英 280、400
长庚 850、863
长顺 623
陈宝箴 325、458、509、535、536、563
陈炳焜 926
陈伯平 732
陈炽 342、343、368、369、395
陈春生 723
陈得才 191、211、260、262、265
陈独秀 928、936—938、941、943
陈黼宸 748
陈复光 626、644
陈恭禄 817
陈恒安 825
陈宏诰 790
陈宦 915、918
陈辉燎 397
陈锦涛 869
陈炯明 777、837、838、929
陈开 206、207
陈夔龙 561、562
陈立 526
陈其美 836、853、854、918
陈启源 340
陈千秋 499
陈强 741
陈秋菊 426
陈虬 342、470



陈少白 660, 663, 665
陈天华(思黄) 657, 676—678, 680、
683, 699, 713, 716, 717, 738
陈文辅 15
陈孝芬 783
陈栩园(天虚我生) 931
陈学棻 594
陈亚癸 111
陈玉成 182—188, 192, 194, 196, 255、
258, 260
陈沅湘 476
陈作新 741, 815—818
程璧光 926, 929
程德全 756, 759, 839, 848, 853, 854、
869, 871, 874, 893
程颢 497
程家桎 747
程霁采 63
程颐 497
程宗裕 473
慈安太后 239, 305
慈禧太后 239—241, 305, 306, 309、
332, 363, 394, 399, 402, 403, 405、
414, 417, 457, 467, 504, 533, 534、
536, 537, 545, 546, 548—558, 561
—567, 578, 584—586, 588—593、
595—597, 600, 602, 603, 605, 606、
617, 621, 630, 631, 637, 651—655、
658, 680, 681, 686, 701, 702, 704、
705, 733, 747, 750, 751, 779, 919
崇厚 298, 310, 312, 313, 359, 386—
390, 392

崇礼 104, 551
崇祯皇帝(朱由检) 8
褚辅成 827

D

达尔文 Darwin C. 519
达赖十三世 380, 646
大隈重信 916
戴德曼 257
戴鹿芝 352
戴戡 819
戴执礼 767
道光皇帝(旻宁) 22, 32, 36, 38, 39、
41, 43—46, 53, 71, 74, 90, 92
丹尼特 Dennett 64
德庇时 Davis J. F. 70
德瑞琳 Detring G. 393, 402, 414
德尔智 Dorjiev 380
德克碑 D'Aiguebelle P. A. 312
德寿 613, 640, 735
德兴阿 182
邓世昌 410
邓廷桢 31—33, 35, 39, 40, 43, 45
邓荫南 662
邓玉麟 790
邓中夏 941
邓子瑜 727
涤浮道人 128
颠地 Dent L. 51, 81
丁宝楨 340, 401
丁吉昌 215
丁名楠 64, 174



- 丁日昌 273、314、330、335、350、360、
362、363
- 丁汝昌 409、410、412
- 丁世峰 748
- 董福祥 283、551、554、557、585、591、
596、597、605、606
- 董脩武 831
- 董煖 815
- 董宗远 87
- 窦纳乐 Macdonald C. 446、447、452、
552、564、565、586
- 窦以珏 840
- 堵布益 Dupuis J. 398
- 杜白蕾 Dupré 397
- 杜文秀 210、211、279、280、378
- 杜锡钧 792、794
- 端方 611、703、704、724、725、764、773
—775、785、829、830、840
- 端华(郑亲王)239—241
- 段祺瑞 751、797、865、902、917、920、
922—928、933、942、944、947
- 多隆阿 281
- E**
- 额尔金 Elgin 152—154、168、171、
216、220、225
- 恩格斯 Engles F. 18、23、151、165、
327、328、478、479
- 恩铭 732
- F**
- 法尔思德 Forrester E. 234
- 樊国梁 Favier Mgr. A. 582
- 樊文涛 847
- 范文澜 465、469、620、627
- 范亚音 207
- 方瀚颐 337
- 费葛 Vinck 444、445
- 费玉成 201
- 丰大业 Fontanier M. 358、359
- 丰升阿 409
- 冯桂芬 249、250
- 冯国璋 797、798、806、809、852、861、
865、867、868、902、917、918、920、
922—925、927、928
- 冯汝骥 838
- 冯特民 863
- 冯玉祥 863、877
- 冯云山 100、103、104、106—108、132、
248
- 冯赞勋 30
- 冯子材 404、406
- 冯自由 638、663、670、672、682、695、
727、730
- 弗赛斯 Forsyth 381
- 福科森 455、491
- 福济 242
- 福祿诺 Fournier E. 402
- 福润 275
- G**
- 刚毅 467、510、551、584、588、591、
592、595、596
- 高平小太郎 755



高尚志 790
高燮曾 531
戈登 Gordon C. G. 245, 247, 262
葛福 Goffe H. 809
葛罗 Gros J. B. L. 152—154, 168,
171
耿精忠 8
龚宝铨 684, 687
龚春台 720, 722—724
龚得树 191
龚骏 931
龚自珍 33, 526
官慕久 83
古德诺 Goodnow F. J. 916
古纳 Goodnow 17, 611
顾观光 248
顾深 248
顾宪成 12
顾炎武 13
辜仁发 809
官文 226, 261, 748
关仁甫 728, 729
关天培 35, 39, 43, 44
光绪皇帝(载湫 305) 417, 458, 501—
503, 510, 528, 531—538, 540—
556, 558—566, 589, 591, 592, 594,
595, 603, 606, 630, 637, 638, 651,
652, 655—658, 680, 704, 705, 733,
747, 750, 768, 779, 862
广福 863
桂良 156, 165, 166, 171, 172, 307
郭重光 821, 822

郭沫若 768, 830, 831
郭人漳 727—729, 776
郭松林 265, 329
郭嵩焘 286, 337, 338, 340, 350, 384,
385, 389, 392, 395, 396
郭廷以 15, 16, 60, 203, 235, 257
郭希仁 748, 834
郭孝成 793, 816, 818, 835, 839, 840,
841, 857, 886

H

哈里曼 Harriman E. H. 754, 755
海古拉 Hac Kuli Beg 385
海靖 Hayking Van 432
韩山文 Hamburg Theodore 102, 196
韩信 807
韩以礼 599
汉纳根 Hanneken 331
豪伊特 Howitt W. 18
浩威 Howie
何伯 Hope J. 168, 225—227, 229,
233, 234, 236, 246, 251
何冠英 352
何桂清 154, 169—171, 213, 214, 222,
246
何海鸣 766, 791, 806
何宽 662
何禄 207
何乃莹 584
何启 396, 640, 660, 663
何遂 893, 894, 898
何穗田 542



- 何信义 200
何有书 69,71
何震 773
和春 182,183,184
和珅 3
赫德 Hart Robert 287,293,302,303、
330,349,390,393—395,403,405、
436,437,439,440,450,453,462、
469,470,568,610,615,627
赫胥黎 Huxley, T. B. 519
赫政 Hart James 393
亨利·乔治 George Henry 698
恒福 171
洪大里 933
洪良品 190
洪全福(春魁) 682,683
洪仁达 255
洪仁发 255
洪仁玕 101,194,196—200,217,248、
252,255,257,258,264
洪天贵福 264
洪秀全 100—104,106,107,114,129、
131—133,136,138,186,196—
199,216,217,226,234,248,253—
258,260,262,264,518,660,682
故鄂公 800
胡滨 440
胡汉民 210,280,281,283,694,699、
729,774,775,837,838,896
胡景伊 832
胡林翼 118,181,183,185,186,212、
213,238,544
胡文忠 183,186
胡思敬 505,511,552
胡以晔 258
胡瑛 780
胡燏芬 545,547
胡有禄 205,207
胡祖舜 794,806
花沙纳 156
华尔 Ward F. T. 215,218,232—
236,243—245
华盛顿 Washington G. 705,800、
803,881
华翼伦 201
怀塔布 551,553,557
黄得美 207
黄鼎凤 207
黄恩彤 90,190
黄复生 774
黄桂壘 510
黄鸿寿 563,564
黄花探 406
黄济舟 822
黄金荣 836
黄爵滋 31,32,33
黄钧宰 49,189
黄侃(运璧) 735
黄明堂 728,729
黄荣邦 425
黄思永 488
黄文金 258,260,261
黄文英 258,259
黄兴(克强) 683,684,686,687,690、



720、725、728、729、734、735、771、
772、774、775—778、784、798、800、
806—809、834、839、854、855、860、
869、870、873—875、893—898、
906、907、910、921

黄藻 642

黄泽霖 820、822

黄忠浩 815、816

黄中模 30

黄毓瑛 869

黄宗汉 158、179

黄宗羲 13

黄遵宪 458

霍尔康 Holcormbe 19

J

吉尔杭阿 147、148

吉庆元 195

吉文元 114

加勒·顾盛 Cushing Caleb 63

简大狮 426

简精华 425

简又文 104、227

姜绍祖 425

姜守且 723、724、818

江忠义 240

江忠源 118

蒋介石 774、819、835、836

蒋楷 573—576

蒋维乔 671

蒋翊武 780、783、784、787—789、793、
794、809—811

蒋益澧 207

蒋赞臣 366、474

焦达峰 814—818、827

焦佑瀛 177、178

金登干 Cambell James Duncan 405

金执尔 Gingell W. R. 187

经元善 542

景淳 161

景廷宾 635

井上清 407

井勿幕 834

敬信 552

居正 793、807、918

K

康达初 497

康裕 Conger E. H. 456、568、578

康广仁 506、534、557

康国器 497

康熙皇帝(玄烨)10

康有为 420、421、470、477、478、494、
495、497—508、510—514、517—
519、521、522、525、526—546、548、
554—557、561、562、564—569、637
—639、641、654、657、660、661、
664、665、668、679—681、694、701、
704—706、714、715、799、913、923、
924、936、937、940

康赞修 497

科罗斯托维茨 616、624、625

科士达 Foster J. W. 19、20、415

柯铁 426



克拉兰顿 Clorendon 392
克勒拉得恩 145
克里门梭 Clemenceau G. E. B. 942
克林德 Ketteler 596, 597
孔子 102, 103, 119, 368, 497, 499,
500, 504, 505, 517, 526—528, 938
奎昌 376
奎俊 611, 612, 613
昆冈 614, 615

L

刺萼尼 Lagrene T. 64, 65
莱恩普尔 S. Lane—Poole 144
赖文光 191, 260, 262, 265, 267
蓝大顺 211
蓝天蔚 863
蓝蔚雯 149
劳崇光 158, 279
劳乃宜 575, 577
琅威理 Lang P. W. 331
勒伯勒东 Le Brethon 236
雷以诚 254
黎世清 259
黎天才 848, 849
黎元洪 779—781, 785, 787—791, 793
—795, 799, 805—813, 817, 834,
838, 852—855, 857, 860, 862, 864,
866, 869, 871—874, 878, 881—
893, 900, 919, 920, 922—925, 928
李秉衡 469, 473, 605
李春萱 783, 789
李大钊 941, 943, 945

李德立 Little E. S. 864
李杕 580
李璠 293, 338
李凤苞 330, 332
李福明 339
李圭 271
李瀚章 278, 528
李鸿祥 826
李鸿藻 417
李鸿章 233, 234, 237, 240, 242—247,
250, 253, 260—267, 270, 271, 275,
276, 278, 295, 297, 306, 308—322,
324—326, 328—332, 334, 335,
338, 345, 350, 353, 354, 357, 378,
379, 383, 384, 392, 393, 400—405,
407—418, 421, 423, 430, 432, 434,
435, 437, 440, 442, 444, 445, 448,
450, 453, 457—462, 480, 486, 503,
504, 518, 524, 531, 549, 550, 552,
559, 561, 565, 588, 592, 595, 598,
608—616, 618—621, 624—626,
632, 640, 641, 649, 652, 655, 661,
662, 665, 750, 789
李纪堂 682, 683
李剑农 474, 832, 886, 924
李金奇 721
李金秋 616
李经方 416, 424
李经羲 752, 825
李开芳 115
李立亭 474
李廉方 790



- 李烈钧 896、897、911、914
李能通 182
李平书(鍾珏)475、476、836
李如松 362
李盛铎 506
李世贤 230、257、259、260、261、263、
264
李侍尧 22
李书城 800、874、881
李泰国 Lay, H. N. 287、293、294
李提摩太 Richard Timothy 556
李希圣 592
李维业 Rivi'ere H. 400
李文炳 200、201、202
李文茂 206、207
李文学 209、278
李文治 3、4、77
李香阁 722、724
李星沅 107
李秀成 182—188、192、196、197、200
—202、215—218、230、231、234、
255、257、258、260—262、264
李续宾(迪庵)183
李续宜 240
李学东 209、278
李亚东 791
李英家 193
李永和 211
李裕元 460
李昭寿 183、192、194、260、262
李准 735、777
李自成 7、684
李作栋 809
李作梅 201
立山 207、553、588
联元 588
梁阿发 101
梁宝常 68
良弼 867
梁鼎芬 504
梁培友 206、207
梁启超 497、499、504—506、509、513、
514、517、519—521、523、531—
533、536、539、541、548、552、553、
555—560、627、637、639、640、665、
679—681、701、704、706—720、
749、758、799、801、819、824、825、
832、898—900、911—915、917、
919、920、922、924、927、928、935、
940
梁善济 835、899
梁士诒 902
梁鍾汉 792
廖平 499
廖叔保 722
列宁 Lenin 442、449、459、697、698、
941
列威廉 Reed William B. 152、154
林葆懌 929
林大北 426
林凤 16、114、115
林凤祥 114、115
林觉民 778
林俊 207、208



- 林启容 182
林绍璋 230
林述庆 848、849
林旭 535、537、553、554、557
林义成 425
林翼支 792
林永升 410
林则徐 30—45、51、53、54、57—59、
61、79、80、88、107、306、307、419、
456、457
吟喇 Reed William B. 143、217、226
刘邦 526、807
刘秉璋 329、472
刘步蟾 410
刘长佑 207、240
刘承恩 799
刘春仁 843
刘道衡 280
刘道一 720、722、725
刘恩溥 600、601
刘逢禄 526
刘公 412、784、788、789、793、795、809
—812
刘光第 535—537、553、554、557、563
刘鸿翱 90
刘杰 359
刘锦棠 283、285、535
刘静庵 779
刘揆一 683、684、686、687、720、735、
772、895
刘琨 700
刘坤一 297、308、355、366、367、412、
413、418、419、466、473、481、492、
503、542、552、589、592、609—614、
626、637、654、655、750
刘丽川 140、143
刘孟扬 600
刘铭传 266、403、422
刘蓉 265
刘瑞芬 322
刘师复 735、736
刘师培(韦斋)719、773
刘思裕 727、728
刘松山 282
刘锡鸿 314、332、335、336
刘显世 821、914
刘祥兴 471
刘星楠 853
刘浔 70
刘彦 453
刘燕宾 663
刘尧激 781、784
刘尧汉 279
刘英 792
刘永福 398—403、406、423、425、426
刘韵珂 46、48、52、57、62
刘肇钧 251
刘镇华 844
刘之洁 848
龙鸣剑 770、771
隆文 44
隆裕太后 862
龙泽厚 542
卢梭 Rousseau J. J. 519、675



卢永祥 851
鲁叔容 258
鲁迅 462、463、772、827、742
陆奥宗光 415
陆皓东 661—664
陆九渊 497
陆荣廷 840、874、914、915、926—929
陆亚发 670、727
陆征祥 892、895、942
陆鍾琦 834、835
陆宗輿 944、946、947
吕海寰 671
罗拔诺夫 Robanov R. 430、431
罗惇衍 178—180
罗大纲 110、136
罗尔纲 254
罗家伦 60
罗纶 767、768、770、831
罗曼诺夫 432
罗荣光 590
罗淑亚 Rachechouart 354
罗素 Russell John. 37
罗特 Rort Elihu 755、758
罗孝全 Roberts I. J. 104、138
罗应旒 339
罗邕 254
罗泽南 118
罗振玉 511
骆秉章 80、153、158、195、211
骆国忠 202、262

M

玛地臣 Matheson 38

马福益 686、687、720
马复初 210
马格里 Macartney S. M. 311、392
马格禄 McClure 412
马桂源 282
马化龙 281—283
马夏尔尼 Macartney Earl of 23
马加里 Margary A. P. 378、379、389
马建忠 394
马科雷 Macauley C. 380
马克思 Marx K. 18、23、151、165、
327、328、479、695、711、937、939—
941、945、947、948
马良 321
马如龙 210、279、280、398
马神甫(马奥斯定)Chapdelai A. 152
马士 Morse Hosea Ballou 37、70、81、
145、146、150、152、294、302、354、
439、462、467、469、470、569、598、
607、611、612、616、632
马寿 282
马文禄 282、283
马歇尔 Marshall H. 136、141
马新贻 736
马玉崑 409、600、605
马毓宝 838、839
马震东 897
马宗汉 732
麦莲 McLane R. M. 136、137、139、
142、143、146—148
麦孟华 481、504、507
麦仲华 534



- 毛泽东 2、5、76、79、93—95、98、113、
267、343、344、347、487、493、494、
518、526、710、883、889、941
- 卯得兴 211
- 梅殿华(英国传教士)473
- 梅启照 334
- 梅馨 818
- 蒙得恩 196、226、255、258
- 蒙时雍 226、230、255
-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C. 519、675
- 孟继善 476
- 孟子 119、518
- 米赫斯 Medhurst Rev. Dr. 138
- 米琪尔 78
- 宓汝成 762
- 密妥士 Meadows, A. T. 312、313
- 苗沛霖 191、193、194、260
- 明道 372、373
- 明治天皇 522、532、561
- 摩尔 J. B. Moore 63
- 牟鸿勋 790
- 穆克德纳 157
- 穆拉维夫 Mouraviev 433
- 穆拉维约夫 Mouraviev-Amurskii N.
N. 159—164
- 慕维廉 Muirhead William 251
- 牧野义智 644
- 穆荫 172
- 穆彰阿 32
- N
- 拿破仑 Napoleon B. 800
- 拿破仑第三 Napoleon III 225、359、
397
- 南大定 843、844
- 内田良平 760
- 倪嗣冲 849、850、902
- 倪映典 775
- 尼古拉第二 Nicholas II 430、432、433
- 尼古拉第一 Nicholas I 159
- 聂缉燾 486
- 聂士成 408、412、551、554、556、583、
584、600、605
- 牛鑑 46、47、53
- 诺克斯 Knox P. C. 756、759、760
- O
- 欧格纳 O'Conor N. 450
- 欧栗甲 511、516
- P
- 帕麦斯顿 Palmerston H. J. T. 40、
41、151、152
- 潘鼎新 404
- 潘康时 780
- 潘仕成 90
- 裴荫森 313
- 彭程万 839
- 彭楚藩 785
- 彭家珍 867
- 彭若瑟(法国传教士)365
- 彭寿松 836、837
- 彭毓橘 265
- 彭泽益 6、78、292



平冈浩太郎 760
朴鼎查 Pottinger H. 45, 47
朴满
朴寿 836
蒲安臣 Burlingame, Anson 294, 390,
391, 392, 672
蒲殿俊 748, 767, 768, 770, 829—831,
833, 899
普提雅廷 Poutiatin E. V. 154, 162,
163, 166
普烈热瓦斯基 Prejevalsky 380
溥儁 591, 651
溥伦 594
溥伟 867

Q

琦善 40—44, 48, 49, 51, 56, 80, 81
齐思和 31
耆英 46, 47, 51, 53, 54, 63—65, 68—
73, 90, 91, 156, 220, 222
祁埏 67, 68
祁嵩藻 237
祁龙威 845, 846
钱桂仁 201—203, 262
钱江 68, 253, 254
乾隆皇帝(弘历) 3, 13, 23
强汝询 276, 338
乔松年 222
秦桧 365
秦日纲 131, 132, 136, 258
卿汝楫 63, 137, 139, 142, 150, 367,
472, 568

邱步琼 351
秋瑾 730—734, 826
丘逢甲 424, 425, 708
丘四 664
渠本翘 668
瞿鸿禨 645

R

冉老五 353
任化邦 265, 267
任可澄 819, 820
日意格 Giguel P. 312, 313, 392
日置意
容闳(纯甫) 252, 253, 556, 637, 638,
683
荣禄 531, 536, 545, 551, 553—557,
561, 567, 584, 594, 596, 597, 605,
606, 613
荣全 376, 377
荣文忠 584
荣宗敬 932
茹尔·费里 Ferry Jules. 399, 401,
404
阮元 29
瑞澂 766, 785, 787, 791
瑞麟 350

S

僧格林沁 169, 171—173, 177, 192,
265, 266
杉山彬 585
山县有朋 407



- 善耆 774、800
尚秉和 867、880
尚可喜 8
尚之信 8
邵循正 617
邵友濂 415、420、423
邵正笏 24
少正卯 528
神尾光臣 458、524
沈葆楨 240、300、308、310、329、356、
535
沈秉坤 840、874、875
沈瑜庆 819
沈梓 204
沈祖基 254
升泰 380、393
升允 850
胜保 192、193
盛宣怀 320—322、325、437、444、445、
448、461、447、461、488、610—612、
653、721、762、763、766、768、798
施阿兰 Gérard A. 437、446
施达格 Steiger 568
石达开 106、129、131、132、136、181、
182、185、186、194—196、207—
209、211、248、251、254、258
石山伊 788
石言 843
史坚如 735
史履晋 758
史密斯 A. H. Smith 673
世铎(礼亲王)540
寿山 623
斯宾塞 Spencer H. 527
斯得弗力 Staveley C. W. 235、236
斯莱顿 Sladen E. B. 279、378
斯屈拉特 Straight W. D. 755、756
寺内正毅 926
松寿 836
宋教仁 683、782、817、869、882、893、
896
宋景诗 208
宋庆 413、600、605、620
宋育仁 341
苏菲亚·皮罗夫斯卡雅 Sophia Per-
ovskaya 736
苏继祖 550
苏元春 475
肃顺 239—241
孙宝琦 841、862
孙道仁 836、837、874
孙二 847
孙洪伊 899
孙家鼐 594、725、840
孙眉(德彰)659、660、662、704
孙三 847
孙天霖 824
孙天生 845、846
孙武(葆仁)783、784、788、789、793、
794、808、810—812、871
孙毓筠 725、840
孙毓棠 312、324、325、344
孙中山(文)518、640、641、658—666、
679、682、689—698、700、704、705、



- 709、723—729、734、735、745、760、
761、771、772、774—776、778、779、
819、843、855—858、860—862、
865、866、868—870、872、873、876、
878—885、887、888、892—898、906
—911、918—921、926—930、939、
940、942、948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R. 452
索焕章 373、374
- T
- 泰禄 Tyler J. 63
谭恩 Dun 414
谭继洵 535
谭人凤 793、816、817、854、857
谭绍光 263
谭嗣同 272、273、506、509、513—515、
521—525、530、534—537、548、
549、553—555、557、558、560、751
谭廷襄 155
谭延懃 708、748、765、815—819、823、
832、874
谭振德 835
谭鍾麟 474、477、708
汤化龙 708、748、788—791、793、794、
800、807、809、819、832、871、899
汤寿潜(震) 674、708、733、752、763、
826、827、833、853、854、869、871、
874
汤萝铭 918
汤志钧 537、548、637
唐才常 509、524、560、637—639、784
- 唐国华 311
唐继尧 822、825、826、833、852、914、
915、919、926—929
唐景崧 401、423—426、460、566
唐炯 400
唐绍仪 755、853—855、857—859、864
—866、873、877、884、891、892、929
唐廷枢 320
唐栖支 792
唐甄 13
陶成章 684、687、731—733、772、836、
940
陶煦 274
特利古 Tricou M. 401
梯也尔 Thiers L. A. 389
田贝 Denby C. 367、414、455、472、
491
田芳 110
田四浪 209、278
田兴恕 352、363
铁良 735、751
铁忠 787
廷雍 619
同治皇帝(载淳) 239、305、394、591
头山满 760
屠仁守 506、515
土尔克 Turgue 397
托浑布 81
妥明 373—375
- W
- 榎川重太郎 524



- 瓦德西 Waldersee A. Von. 616 —
619, 621, 627
- 万福华 735
- 万诺夫斯基 Wonnovski 431
- 汪大燮 898
- 汪东(寄生)699, 700, 716
- 汪海洋 264
- 汪铨 15
- 汪精卫 692, 694, 700, 713, 718, 734,
736, 774, 800, 858, 871, 880, 882,
895
- 汪敬虞 489, 491 — 493, 651, 656, 667,
669, 931
- 汪康年 536, 674
- 汪彭年 864
- 王崇武 259
- 王宠惠 869
- 王德成 600
- 王夫之 13
- 王干臣 515
- 王汉 735
- 王和顺 670, 727 — 729
- 王家璧 335, 336, 362
- 王金宝 687
- 王金发 827
- 王金铭 863
- 王金镛 741
- 王茂荫 155
- 王培佑 562
- 王勤培 646
- 王庆云 849
- 王庆庄 50
- 王人文 767
- 王忍之 490, 641, 676 — 678, 685, 693
— 695, 699, 700, 702, 711, 713 —
719, 735, 739, 773
- 王泰阶 209
- 王韬(黄畹)250 — 252, 661
- 王弼夫 364, 365, 388, 435, 445, 446,
450 — 452, 460, 473, 645
- 王天杰 771
- 王天培 840
- 王天纵 843, 844, 850
- 王维周 143, 217
- 王文杰 358, 741, 472
- 王文锦 790
- 王文韶 545, 563, 588
- 王五 258, 558
- 王先谦 320, 365, 687
- 王宪章 780, 781, 790
- 王阳明 497
- 王有龄 223
- 王芸生 416, 418, 607, 759
- 王照 549, 553
- 王之春 475, 670, 735
- 王芝祥 874
- 威代尔 Weddell J. 18
- 威尔逊 Wilson W. 942, 943
- 威廉第二 William II 432, 433, 617,
753
- 威廉姆斯 F. W. Williams 390, 392
- 威司利 Wolseley G. L. 227
- 威妥玛 Wade Thomas 224, 228, 236,
302, 303, 378, 379, 384



- 维特 Witte S. Y. 431、437、439
韦昌辉 106、129、131—134、136、181、
254
韦老忠 476
魏光焘 613、708
魏兰 687
卫汝贵 409
魏源 33、88、89、306、677
魏元旷 462
魏忠铨 721
温楚珩 806
文翰 Bonham S. G. 78、136—138
文惠廉 Boone William J. 85
文梯 518
文廷式 418、503、504
文祥 306、307、325、329、330、736
翁斌存 507
翁同龢 417、432、452、503、504、507、
531、545、546、548、551
翁同书 193
倭仁 333、334
吴沧洲 843
吴大澂 412、413、418
吴健彰 135、141、142、149
吴杰 323
吴介璋 838、839
吴凌云 206、207
吴禄贞 851
吴彭年 425
吴如孝 136
吴三桂 8
吴世璠 8
吴汤兴 425
吴醒汉 790
吴煦(晓帆) 213、215、218、225、233、
243、244、246
吴亚忠 207、399
吴玉章 771、870、871、881、893、929、
930
吴樾 702、735
吴云 213、250
吴兆麟 786—789、792、794
吴稚晖 661、774
吴重熹 724
伍廷芳 448、854、855、858、859、864—
866、868、869、871、873、874、877—
880、882、886、929
X
西华德 Seward W. H. 391、392
西门·安得洛德 Andrade Siman De
15
西摩尔 Seymour E. H. 587、598、599
锡良 729、756、759、766
席宝田 278
夏寿康 788
夏燮 29、351
夏正寅 210
夏之时 828、832
咸丰皇帝(奕訢) 166、167、170、172—
174、178、220、239、241
向荣 100、107、108、116、117、131、
136、182、557
肖朝贵 106、107、109、110



肖德扬 265
肖克昌 721、724
小山宏健 427
谢日昌 682
谢汝翼 826
谢石钦 790
谢纘泰 663、682、683
辛普生 Putnam Weale 597、618
熊秉坤 786、792
熊成基 733、734
熊克武 914
熊万荃 201—204
熊希龄 898—900、911、912
徐邦道 411
徐宝山 846
徐承祖 276
徐达明 790
徐广缙 73、74、90、91
徐继畲 49、88、89
徐勤 420、665
徐润 320
徐少蓬 201、202
徐绍桢 848、849
徐世昌 755、797、861、902、925、941
徐桐 588、594
徐蔚南 322
徐锡麟 730—734、826
徐襄 425、426
徐学功 382
徐义生 441
徐延旭 400、404
徐用仪 588

徐有壬 213
徐之铭 210
徐致靖 545、546、548、554
许德珩 945
许国信 427
许景澄 588
许珏 741
许乃济 31、32
许乃钊 141、147
许同莘 563
许祥光 73、74
许雪秋 726、727、772
许瑶光 261
许应骥 553、557、611、613
续桐溪 851
宣统皇帝(溥仪) 747、861、877、878、
923
薛福成 189、301、340、394、395
薛焕 171、213、222—225、232、246、
298、300
薛之元 183、192

Y

亚当·斯密 Smith Adam 519
亚历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736
严复 506、514、518—521、527、530、
558—560、637、738、739
严树森 240
严中平 289、443、488、931、934
严作霖 542
阎锡山 835、851、896
颜楷 769、770



- 颜咏经 396
晏玛太 Yates M. T. 141
杨崇伊 504、557
杨笃生(毓麟)685
杨笃新 John Griffith 217、257
杨度 711
杨芳 44
杨坊 214、215、233、243—246
杨福同 582
杨辅清 260、261
杨鹤龄 660
杨宏胜 785
杨辉 407
杨荃诚 820、822
杨开甲 794
杨慕时 583
杨衢云 663—665、682
杨儒 633、634
杨锐 535、536、553、554、557、563
杨深秀 545、546、557
杨诗浩 455
杨世骥 741
杨泗洪 425
杨泰 208
杨王鹏 780、918
杨文定 135
杨锡绂 3、4
杨玺章 794
杨莘友 831
杨秀清 106、107、109、114、129—133、
136、254、257、581
杨依平 843
杨毓秀 281
杨卓林 725
杨紫云 425
杨宗瀚 492
杨宗濂 492
姚文甫 678
姚新昌 207
姚雨平 777
叶昌炽 618
叶德辉 528
叶瀚 368
叶名琛 74、143—147、149、151、153、
154、157、206
叶志超 408、409
伊格那替业幅 Ignatiev N. P. 169、
174
伊克唐阿
伊里布 42、44、46、47、51、53、54、62
伊罗 398
伊藤博文 407、415、416、556
怡良 141、142、147、149、150
奕经 46、49、50、57
奕劻(庆亲王) 332、414、540、550、
561、595、613、615、620、621、625、
632、645、652、656、750、762、797、
799、851、861
奕山 44、45、50、56、59、61、163、164、
165
奕訢(恭亲王) 173、174、220、221、
228、239—242、306、307、325、358、
414、415、457、531、561
奕譞(醇亲王) 305、324、331、357、



358、362、550
懿律 Elliot George 40—43
义律 Elliot Charles 34—36、40、42—
45
易顺鼎 426
荫昌 796、797、851
殷德泰 57
尹昌衡 831—833
尹耕之 266
尤烈 660
有贺长雄 916
有泰 646
余保纯 56、59
余诚格 815、816
余丑 726
余栋臣 366、474、475
余晋珊 528
余联沅 611
俞廉三 732
于凌辰 334、335、336
宇都宫太郎 458、524
雨果 Hugo Victor 173、174
与之 31、45、128、155、170、172、173、
187、224、225、244、329、337、368、
385、418、450、455、458、711、719、
758
禹之谟 725
裕禄 551、581—583、585、587、588、
590、599、600、605、619
裕谦 46、52、57
喻培伦 778
毓贤 573、575—579、582、612

袁昶 588、589
袁大化 863
袁甲三 192、193、201、224、275
袁克定 800
袁世凯 275、503、551、554—579、582、
589、612、613、645、649、655、656、
674、701、745、750—752、755、775、
794、796—801、804—807、809—
812、817、835、841、843—845、848
—855、857—869、871—875、877—
888、891—907、910—922、924—
929、933、936、942、944
袁树勋 775
袁玉麟 31
袁忠清 201
袁竹一 396
约翰·顾盛 Cushing John 63、64
约翰逊 W. F. Johnson 64
约瑟夫 440、452、454、455
恽代英 941
恽毓鼎 557、594

Z

载沣 747、751、774、797、861
载瀾(辅国公)588
载涛 861
载勋(庄王)588、596
载漪(端王)588、591、595、596、606、
630、651
载垣(怡亲王)172、239—241
载泽 703、867
载振 656



- 曾广钧 507
- 曾国藩 116—119、127、183、185—188、190—192、212、213、223、225、234、237、238—240、242—246、248、250—253、255、259—262、264—267、270—272、275、294、304、306、308、310、326、334、360—362、383、387、486、507、544、549、637、752
- 曾国荃 240、245、260、261、265、271、275、308、403
- 曾纪泽 387、388、392、396、402
- 曾廉 516
- 曾毓瑜 282
- 曾铸 674、708
- 增祺 591、623—625、633
- 增韞 826
- 詹阿瑞 426
- 詹秉忠 824
- 詹大悲 765、766、781、791、798、806
- 詹大吉 351
- 张百麟 819—822
- 张彪 779、781、785、787、791
- 张伯桢 458、522
- 张德成 599
- 张德坚 121、130
- 张鼎华 498
- 张飏 844、850
- 张凤翔 834、835、850、896
- 张国淦 797、799、853、878
- 张国梁(嘉祥) 184、406
- 张国溶 788
- 张汇滔 849、850
- 张集馨 281
- 张继 131、459、773
- 张继庚 131
- 张季子 479、489、492
- 张睿 489、492、493、667、674、708、748、749、752、801、858、869、871、875、879、886、893、898、902、932
- 张景良 798
- 张静江 774
- 张澜 769、770
- 张洛行 189—193
- 张鸣岐 777、837
- 张枬 490、641、676—678、685、693—695、699、700、702、711、713—719、735、739、773
- 张难先 779、780、793、806、810、853
- 张培爵 828、832
- 张彭年 819
- 张权 507
- 张人骏 848、849
- 张汝梅 572、575、576
- 张善继 208
- 张绍曾 851
- 张盛藻 333、334
- 张树珊 265
- 章士钊 642
- 章太炎(炳麟) 527、561、678—680、684、694、695、704、771、772、871、872、898、940
- 张廷辅 790、792
- 张文光 824—826



- 张文祥 736
张翼若 834、894
张献忠 684
张孝若 752
张行志 850
张秀眉 208、278
张勋 848、849、866、923—927、936、
937
张雁深 37、38
张曜 382
张翼 649
张荫桓 415、420、435、457
张钊 110、111
张振武 794、811、871
张之洞 292、314、315、318、319、322—
325、334、418、419、444、445、448—
450、458、469、480、481、488、490、
492、503—505、507、509、512—
516、518、524、536—538、542、545、
547—550、552、559、561、563、564、
567、588、592、609—613、626、637
—639、641、654—656、669、670、
679、708、721、750、751、759、765、
778、789
张之万 177
张鍾端 862
章宗祥 944、946、947
张忠绂 888
张宗禹(总愚)265—267
招子庸 81
赵秉钧 892、893、895、896、907
赵德全 820、822
赵尔丰 770、771、828—831
赵烈文 272
赵声(伯先)728、776—778
赵舒翘 584
赵倜 850
贞松 511
郑炳麟 582、602
郑成功 7、17
郑观应 291、342、661
郑汝成 918
郑士良 660、665、735
郑孝胥 708
郑祖荫 83
志锐 418
鍾良相 203
鍾麟同 825
周恩来 941
周馥 674
周树年 846
周天宝 847
周星誉 460
周五 200
朱次琦 497
朱尔典 Jordan J. 751、762、802、805、
809、864、888
朱贵全 664
朱红灯 573、574、577
朱洪英 205、207
朱家宝 840
朱彭寿 314
朱其昂 320
朱庆澜 829、830



朱瑞 827、828、833、848

朱瑞亭 472

朱熹 497

朱元璋 2

朱执信(悬解)694、695、719

铸铁 765

庄庚良 740

庄蕴宽 874

子虚子 816

邹鲁 663、690、778、872、873、907、
908、921

邹容 490、678—680、684

左宝贵 409

左学谦 815

左宗棠 240、245、260、263、265、266、
271、282—284、306、310、312、315、
334、377、381—387、392、497、518



事 项 索 引

(本索引只列比较重大的事项,但已见于目录的项目不列入;
因已有人名索引,可通过人名直接查找的项目一般也不列入。
索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每条所记数字是页码。)

A

爱国学社 671、672、678、679
璦琿条约 164、165、174、430
安福国会 924、925
奥匈帝国 298、587、590、604、615、
620、632、942

B

巴黎和会 941—943、947
八旗兵 9、10、14、596、605
巴塘教案 737
白莲教 13、14、51、58、117、189、208、
211、471、570、571、574、575
拜上帝会 103—106、110、111、196、
571
保国会 496、506—508、510、518、531、
536、537、548、668
保皇党 637、704、710、937
保皇会 680、704—706

保路运动 625、767—770、785、828—
831
保卫台湾斗争 422—427
北京政变(1861年,亦称祺祥政变)
239—241
北京条约 165、166、174—176、213、
219、220、222、224、288、307、370—
373
北洋军 554、583、600、612、750、752、
797、798、806—810、835、862、863、
866、884、896、902、914—917、920、
922—929、941
北洋水师 331、519、789

C

“常捷军”236、263
“常胜军”228、233—235、243、245、
247、261、262
潮州反进城事件 349—351
成都教案 471



重庆教案 365

慈禧太后的新政和反新政斗争 651—
658、739、741—744、745、751

D

大冶铁厂 315

大足教案 365

德国 208、285、295、313、315、325、
326、329—331、393、395、402、405、
410、414、415、418、429、430、432—
434、436—438、443、444、446、447、
450—455、457、459、473、477、506、
523、524、572、578、586、587、590、
596、604、607、611、615、617—620、
626、628—630、632、633、647—
650、689、702、721、753、756、802、
803、859、864、875、887、903、904、
937、939、942、943

抵制日货运动 905、931

滇越铁路 451、648

东南保护约款 611

东清铁路 432、443、622、648、649、754

E

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 625

俄国 16、17、149、150、154—156、159
—166、169、174、175、222—235、
247、250、284、285、296—298、300、
301、307、331、333、359、360、362、
370—377、379—388、392、393、
395、407、408、414、418、429—440、
443—446、449—455、457—460、

472、522、524、525、532、552、556、
559、565、581、586、587、598、599、
601—604、607、615—618、622—
626、628、630、632—634、644—
646、648—671、683、702、736、753
—757、759、760、784、802—804、
839、859、864、887、903、917、925、
941、948

二次革命(赣宁之役) 897—899、902、
911

二十一条 904、905、910、916、926、
931、942、944、946

F

法国 18、23、24、38、62—68、83、85、
135—137、139—150、152—158、
160、162、163、165、168—178、213
—225、228—236、239、241、244、
245、250、263、279、280、287、288、
296—298、301、312、313、326、327、
331、333、347、351—354、358—
361、365、372、380、389、390、392、
393、395、397—406、414、429、430、
436—440、443—446、450—455、
457、459、460、472、475、524、530、
540、541、552、567、582、586、587、
590、599、601、604、607、611、615、
617—620、622、626、628、630、632、
633、647、648、655、661、670、675、
684、689、700、702、703、714、715、
728、729、737、740、753、754、756、
757、759、761、765、773、774、779、



794、802、803、857、859、864、875、
887、892、903、917、924、925、941、
942、947

反美华工禁约运动 672—675

非常国会 927、929

废除科举制 547、652、655、656、676、
751

焚掠圆明园 173、245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633

福建红钱会起义 207—208

福建双刀会起义 207

辅仁文社 663

G

改良主义 251、343、368、369、394、
395、478、495、497—500、509—

511、523、525、527、529、530、557、

560、567、659、662、664、666、676、

681、682、695、701、870、940、945

哥老会 94、98、365—369、420、571、

572、574、637、638、640、685、686、

720—724、729、814、818—821、

834、850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852

庚子赔款 631、657

公车上书 477、500、538、541、548

共和党 893、898、899

共进会 772、773、781—785、787、789、

790、792—795、806、810、811、815

“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925

古田教案 471—472

关东都督府 754

官督商办企业 315—318、324、338、

339、342、444、480—483、649、765

光复会 683、684、687、688、690、730—

732、771、772、826、827、836、871

广西会党起义 670

广州起义(1895年)663—664

广州湾租借条约 451

贵州苗民起义 208、209、211、278

国民社 945

“国民会议”865、866

国民党 60、443、661、663、690、691、

721、773、774、778、835、872、873、

884、891、893—898、900、901、903、

906—908、910、911、914、919、921、

922、927—929、939、948

H

海关 28、42、64、77、141、142、176、

243、287—289、293、302、311、389、

390、393—395、412、413、419、433、

436、438—440、442、450、452—

454、462、465、491、552、618、620、

621、631、632、750、751、875

海军 40、135、140、143、144、160、168、

169、186、224、225、229、233、246、

251、252、306、308、324、326、328、

331、332、384、397、402—404、409

—415、423、426、431、451、512、

533、569、587、598、610、753、789、

796、836、869、892、893、898、925、

926、929

海兰泡惨案 623



汉阳铁厂 315、322—325、480、904
杭嘉湖抗纳漕粮暴动 739
合浦教案 737
合作政策 296、297、302、391
黑龙会 760
黑旗军 208、398—401、403、404、406、
423、425
洪江会 720—723
洪莲会 737
洪门 98、660、663、730
洪宪帝制 901
湖北军政府 789、790、793—795、852、
853
护国运动 915、918—920、926、929
护国军 914、915
虎门销烟 34
虑门条约 61—62、83
华俄道胜银行 439、446、486
华兴会 683—688、690、720、778、895
淮军 233、234、237、242、244、246、
247、250、260、262、265、266、271、
275、329、412
黄埔条约 60、64—66、145
汇丰银行 286、321、437、438、616
惠州三洲田起义 665
火烧夷楼事件 67—68

J

教案问题 348、352—354、357—365、
367、368、389、471—473、490、737
—739
江北大营 115—117、182、183、192、

254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623
江南大营 115—117、131、182—185、
197、200、213、216、239、260
江南制造局 310—314、345、346、836
胶澳租界条约 453、457
胶济铁路 572、648、862、904
交收东三省条约 634、644
交通系 218、902
进步党 898—901、911—913、922、
927、928
金陵制造局 310
京师大学堂 533、652、656、670
九龙租借条约 453
拒法拒俄运动 670—672、678、683
军务部 794、808、811

K

开放 20、23、35、38、54、61、64、75、76、
82、138、148、159、175、226、229、
289、303、349、379、380、417、446、
455、625、627—630、632、634、643、
644、754、759
开平矿务局 315、346、442、649
孔教会 936

L

厘捐、厘金制度 254、465、541、543、
544、547
立宪运动 701、709、826、899
立宪派 701、709—712、714—720、
733、738、748、750、752、758、768、



769、771、789—791、794、797、799、
801、807、809—811、814、815、818
—833、835、841、852—854、858、
869—871、893、898、899、911、914

廉州教案 738

芦汉铁路 443—446、552

绿营 8、10、14、117—119、183、207、
238、239、326、409、533、656、775、
785、845

出洋留学 306、326、518、533、637、
641、652、654、656、665、670、675、
676、678—680、682—684、686、689
—691、706、708、720、725、730、
755、774、814、818、825、828、840、
849、858、944

轮船招商局 315、320、338

M

马厂督师 923

马关条约 416—418、420、422—424、
429、430、436、470、471、477、481、
663

马尾造船局 310、313、403

麦加利银行 286

满蒙五路换文 887

美国 15、19、23、24、28、29、34、35、37、
63—66、81、83、85、104、135—150、
152、154—156、162、163、168、169、
213、215、217、218、223、225、232、
233、235、245、250、252、253、285—
287、291、294、296—298、302、311、
312、320、321、327、359、364—367、

379、389—393、395、405、407、412、
414、415、417、420、430、436、437、
443、444、448—450、455—457、
460、471、472、491、522、524、556、
568、578、586、587、599、601、604、
607、611、615、617、622、625、627—
630、632—634、637、643—645、
647、650、656、659、660、664—666、
669、672—674、683、689、691、694、
702、705、709、710、737、739—742、
754—757、759—761、774—776、
803—805、849、856、858、864、869、
875、887、903、904、916、917、921、
925、926、941—943、945

“门户开放”政策 64、625—630、632、
634、643、644、754、759、760

民国大借款 857、875、886、887、896、
903、933

民社 872、945

民主党 898、899

民族资产阶级 79、340、343、344、346、
419、464、484、485、490、491、493、
494、496、497、537、538、541、640、
659、668、669、674、675、691、695、
711、714、762、764、946

明定国是诏 532、546、549

N

南昌教案 351、738

南京条约 47、53、60—64、67—69、72、
75、76、81、87、90、137、139、145、
146、231、470



南满铁路 435、443、622、648、649、
754、755
南通大生纱厂 483、489、492、493、
667、932
南学会 509、510、523、524、535
捻军 182、183、189—194、208、224、
265—267、277、281、282、307

P

平民教育讲演团 945
葡萄牙 15—18、20、22、23、63、218、
298、590

Q

强学会 495、502—505、507、509、537、
548
青帮 94、98、836
清皇退位 877
群治学社 779—781、785

R

日本 81、89、156、247、290、321、324、
325、327—331、393、406—410、412
—420、422—427、429—432、436、
450—452、455、457—460、465、
470、473、480、487、494、522、524、
525、532、533、556—559、561、567、
572、578、585、587、590、598—601、
604、607、608、611、615、617、625—
628、630、632—634、637、638、641、
643—650、656、657、663—666、
669、670、675—680、683、684、686、

689—691、699、702、704、706—
711、720、725、730、732、739、740、
751、753—761、771—774、783—
785、788、789、802—804、814、819、
824—826、828、831、834、835、840、
849、851、859、864、875、877、882、
886、887、898、903—907、910、914
—918、925、926、930、931、941—
944、946、947

日俄战争 643—646、672、752—754、
904

日俄协定(1907年)753、754、756、757

日法协定(1907年)753、757、758

日知会 688、778—781、785、786、790
—792

S

三国干涉还辽 429—432、450

三合会 94、98、205、206、571、640、
660、662—664、682、685、726

三民主义 692—700、945

山海关牛庄铁路中立化协议 454、455

上海小刀会起义 140—144、205

上海机器织布局 315、317、321

收回利权运动 679、762

守旧派 333—337、341、357、358、361
—363、510、512、514—516、528、
550、562、565、589、590、595、609、
655、710

“四大寇”660

四国银行团 756、757、766、856、857、
875、887、896、903



苏报案 672

T

塔城会议 370—373

太古公司 286、320、647

天朝田亩制度 120—129、198、199

天地会 97—100、104、105、107、110—

112、116、130、140、143、144、182、

194、205—207、211、365、367、369、

398、474、475、571、660、726

天津条约 156、158、165—171、175、

176、179、216、224、286、288、296、

391、405

同盟会 658、689—703、706、710、720、

723—730、734—736、741、760、

761、770—777、779、781、782、784

—787、793、802、811、814、817、

819、824、825、828、831、834—838、

840—844、847、849、851、854、857、

858、862、863、867、869、871—873、

880、886、891—896、898、907—

909、919

通商行船续约 647

同文馆 333、334、420、512

统一党 871、898、899

统一共和党 893

团练 57—59、67、117、119、155、173、

177、178、180、191、193、201、208、

422、424、475、476、582

通商 16—18、20—23、44、53、54、60—

65、68、69、75—79、81—84、88、90、

135、138、152、155、156、159、165、

167、172、175、176、197、214、216、

221、224、226、229、232、234、236、

244、246、253、285、287、292、293、

298、301、303、307—310、338、339、

342、344、346、351、355、359、367、

379—381、383、388、405、417、420、

433、453、456、457、461、491、523、

541—544、558、647、738

W

外蒙古独立 887

皖系 925、926

望厦条约 60、63—64、145

维新派 478、494—496、502—506、508

—526、528、530、531、533、534、536

—540、543、545—551、555、556、

558—566、656、708、710、750、938

文学社 778、780—787、789、790、792、

806、809—812

五大臣出洋 701—703

芜湖教案 366

五口通商 60—62、75—84、135、165

戊戌变法 537—557

戊戌政变 549—566

无政府主义者 773、774

X

西北回民起义 280—284

西伯利亚铁路 431、451

宪法信条十九条 800、801

宪政筹备会 708、765

宪政公会 708



- 宪政商榷会 922
- 湘军 116—119, 181—183, 185—188, 207, 211, 212, 234, 237, 238, 240, 242, 245, 246, 260—263, 265, 270—273, 275, 278, 282, 413
- 湘潭教案 351
- 小站练兵 578
- 协定关税制度 61, 63, 288
- 新潮社 945
- 辛丑条约 625, 630—634, 643, 646, 647, 651, 655, 657, 659
- 新建陆军(新军) 503, 533, 547, 578, 656, 657, 733, 734, 741, 751, 775—779, 781, 782, 785—787, 790—794, 796, 815, 816, 818, 820, 824—831, 834—836, 838, 842, 843, 846, 848, 851, 856, 863
- 新式学堂 533, 545, 652, 654—657, 671, 676, 683, 702, 708, 720, 731, 733, 742—744, 748, 775, 779, 784, 786, 789, 814, 820, 828, 838, 839, 843
- 兴中会 640, 662—665, 682, 683, 690, 691, 704, 735
- Y
- 亚罗号事件 150
- 鸦片 28—30, 33, 35—37, 39—42, 99, 137, 146, 151, 192, 259, 285, 290, 291, 364, 356, 484
- 洋枪队 215
- 洋务派 306—309, 315—320, 333—337, 340—343, 357, 358, 362, 363, 368, 403, 414, 442, 448—450, 452, 456, 457, 459, 461, 462, 480, 481, 495, 501, 503—505, 507—509, 511—514, 516, 535—538, 541—543, 545, 547—550, 554, 560—565, 588, 589, 591, 609, 614, 654, 655, 670, 710
- 扬州教案 354
- 意大利 298, 359, 573, 578, 587, 590, 586, 604, 615, 619, 620, 628, 632, 633, 741, 917, 925, 941
- 怡和公司 286, 320
- 怡和洋行 286, 320, 442, 647, 740, 762
- “以夷制夷” 456, 457, 459—463
- 彝族起义 209—210, 278—280
- 研究系 922—924, 929
- 延平教案 364
- 烟台条约 379, 380
- 英俄条约(1907年) 753
- 英国 1, 17, 18, 20, 22—24, 27—29, 32, 34—38, 40—47, 51, 53—56, 60—70, 72—75, 78, 80, 81, 83—86, 88—91, 135—158, 160, 162—187, 205, 207, 213, 214, 216—218, 221—236, 239, 241—246, 250—252, 257, 259, 262, 279, 280, 284—289, 293—298, 300—303, 307, 311—313, 320—323, 325, 327, 329—331, 333, 345, 349—351, 354, 359, 362, 365, 374, 375, 377—385, 387—390, 392, 393, 395—397, 403,



- 405、407、408、412、414、417、418、
420、425、426、430、436—444、446
—460、467、469、471—473、487、
491、518、519、524、525、552、556、
557、559、564、565、567—569、572、
578、585—587、589、590、598、599、
601、604、607、610—612、615—
620、622、625—630、632—634、
640、641、643、644、646—651、655、
659、660、663、664、668、670、674、
682—684、689、700、702、739—
741、751、753—757、760、765、802
—805、809、810、853—859、864、
866、875、887、888、903、904、917、
925、926、941、947
- 英日同盟条约 643、753、757
庸俗进化论 5 25、526、527
酉阳教案 345、365
预备立宪 658、701、703、706、707、750
预备立宪公会 708、733、749
约法会议 900
粤汉铁路 443、444、447—449、456、
669、756、765、815
云南回民起义 210—211、279
- Z**
- 高教 471
招商局 286、316—318、321、325、512、
647、648
昭信股票 466、467
振武学社 779—781、785、918
振兴工艺给奖章规 481
- 政闻社 707—709、717、819
政学系 929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679
直系 925、926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401—402
中国教育会 671、672、679、684
中华民国成立 860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政府)852—854、856、857、860
—862、865—870、874—876、872—
888、891、894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852、
854、869、870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883、891、892、
897、900、902、920、922
中华民国联合会 871
中华革命党 906—911、914、918—
921、927
中美续增条约 390—391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646
中英修改税则会议 166
资产阶级改良派 535、640
资产阶级革命派 490、517、535、561、
640、657、659、666、671、681、683、
691、692、694、695、698、700、701、
705、706、709—720、734、736、738、
739、745、762、772、775、778、791、
799、800、802、807、810—819、821
—828、830—838、840、842、844、
845、851、852、860、863、869—871、
885、888、891、892、895、897—899、
902、911、914、938、940



- 自立会 637、638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总署、译署) 77、220、228、232、235、236、240、241、247、288、293、294、297—299、302—304、306—308、312、319、325—330、333、334、338、350—353、359、360、372、373、375—380、384、390、393、394、414、424、432—435、437—440、443、445—448、451—453、455、457、458、460、469、472、481、512、513、531、532、539—543、552、556、563、578、581、586、595、613、653、750
- 租界 62、82—86、140—143、213、214、234、301、394、423、432、453、456、457、460、475、569、587、598—600、611、629、633、638、670—672、680、784、802、803、835、836、852—854、877、942、946、947
- 尊孔读经 497、876、936、9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绳全书 第六卷/胡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

ISBN 7-01-002639-4

I. 胡…

I. 胡…

Ⅱ. ①胡绳-全集

②社会科学-文集

Ⅳ. C52

胡 绳 全 书

HU SHENG QUAN SHU

第 六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32

字数:739千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01-002639-4/Z·89 定价(上下):53.00元